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9年4月15日第9期 总第253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53期

纪念李锐专辑

目 录

【专稿】

李南央 声明（2019年2月16日 美国西海岸时间）

李南央 李锐绝唱（2019年2月27日）

【访谈】

李南央 李锐的告别仪式

法广/李南央 李锐的日记是一部共产党党史

北明/李 锐 宅中对谈录——探底毛泽东

【怀人】

杜导正 脊梁骨李锐与《炎黄春秋》

阎 淮 李锐对我恩重如山

崔武年 李锐和“第三梯队”建设

吴 思 李锐是谁？

章立凡 告别李锐——中共民主派的谢幕

韦弦佩 述往思来寻史迹

【诗词】

李 乾 只为神州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明天

王晓林 素描：2019年2月20日

【李锐著述】

李锐文集目录（第一卷至第十九卷）

【本刊声明】

【专稿】

李南央声明

我不是从家人和“组织”，而是从一位朋友那里知道了张玉珍和中组部在北京时间16日晚间商定，将于下周三早晨8:30在八宝山按正部级待遇为李锐举行告别仪式。我又看到了一位朋友转来的在微信圈中传的一段文字：“有消息说李南央已经先后得到李锐老病危和病故的消息，但她表示不想回来。不知此消息是否属实？李锐老人身后一定会有一场隆重的告别仪式。坊间盛传：李南央以祖父李积芳和父亲李锐的精神传人自诩，身为李锐长女的李南央若不回来尽孝，不出席此仪式，世人会怎样看呢？”

我将凭借记忆找出的父亲在日记中有关后事的记述录在这里（并附原件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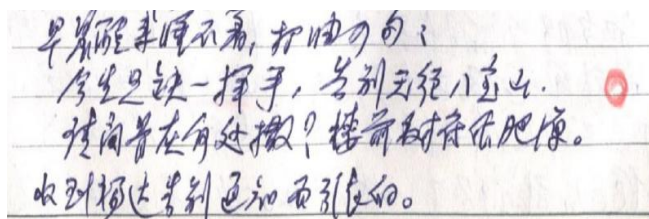
1996年3月14日（星期四）晴

早晨醒来睡不着，打油四句：

今生只缺一挥手，告别无须八宝山。

请问骨灰何处撒？楼前树底作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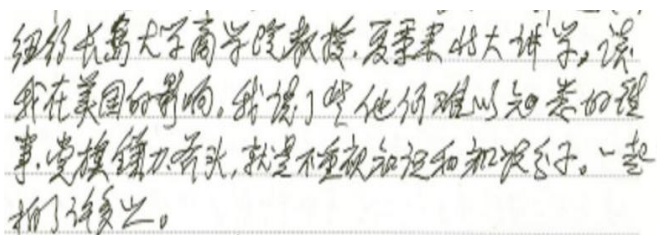
收到杨达告别通知而引起的。



早晨醒来睡不着，打油四句：
今生只缺一挥手，告别无须八宝山。
请问骨灰何处撒？楼前树底作肥源。
收到杨达告别通知而引起的。

2011年7月9日（星期六）晴

纽约长岛大学商学院教授，夏季来北大讲学，谈我在美国的影响。我谈了些他们难以知悉的往事。党旗镰刀、斧头，就是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一起拍了许多照。




纽约长岛大学商学院教授，夏季来北大讲学，谈我在美国的影响。我谈了些他们难以知悉的往事。党旗镰刀斧头，就是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一起拍了许多照。

我不需要顾及世人怎样看我，但是我需要能够面对父亲，面对自己。我知道父亲绝对不能接受将他定位于一个共产党的正部级干部进行追悼，我相信父亲在天有灵，一定会对那面盖着染满无辜者鲜血的党旗下的李锐恸哭长啸。

李锐是个在共产党的铁腕统治下保持了独立的头脑，宣讲常识的，有着真性情的人。这在自由世界里很容易作到，但是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作到，父亲李锐生前做到了。作为女儿，我要保护他的人格尊严，我不参加

中组部安排的李锐追悼仪式，以此告诉世人父亲的真实意愿：“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因为他的挚友黎澍说过：“那些躺在八宝山里的人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父亲说：“我跟黎澍一样。”因为父亲跟我说过：“如果追悼会上说李锐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吗！”因为李锐自诩为独立思考的知识份子，那面镰刀、斧头的党旗上没有他的位置。

谨此声明，告知于世，李锐的自诩、李锐的遗愿！

【专稿】

李锐绝唱

李南央 2019年2月27日

在党的钳制下讲常识

父亲李锐离世已经十多天了，官方举办的追悼会也已经如期举行。李锐是2018年3月30日住进北京医院的，我在自己为父亲发出的讣告中说，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反复书写的是同样的内容：人生在世都要受时代、知识、思想能力和个人品德的四种限制，前三种是恩格斯说的，最后一种是他加上去的。

其实，每一个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还有一种摆脱不掉的东西，那就是党的钳制。这种钳制所采用的手段的卑劣，绝对不止于造访的“卧底”客人。

父亲说过的绝大多数话，写过的绝大多数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在民主国家都是常识。有那么多的人敬重李锐、爱戴李锐，是因为他在党的钳制下讲述常识。这需要勇气，更需要突破深入他近旁的钳制的智慧。

中组部按照共产党的丧事制度，以“正部级待遇”在八宝山举办了李锐的遗体告别，在他身上盖上了红色的党旗。根据我跟父亲的交流和对他的理解，这完全违背了父亲的真实意愿。

实际情况也根本不是正部级待遇。那天，参加了遗体告别的朋友告诉我，追悼会才进行了半小时，不明身份的人就拦住了队尾，掐断了进入大厅的告别队伍。而经审查获批准，可以在厅内告别李锐的亲属们被“请”进休息室，在前来告别的最高首长——中组部部长陈希到达之前，不得进入停放李锐遗体的大厅。大厅门梁上没有条幅，不允许拍照。亲属中的一位拍到了一张大厅的照片，立即被不

明身份的人追逼，强迫交出手机进行了删除，不允许李锐的后人留下一张他的仪容像以为纪念。

感谢纽约时报中文网同意摘录发表父亲最后的日子我守在病床边写下的日记。相信读者会从这些白描里了解李锐最后的时光和背后的那些事儿。

2018年4月3日

下午二时左右，飞机提前落地在北京。过关、乘机场摆渡车到行李大厅找到所乘航班的转盘，我们的箱子正从吐口滚落下来。

出关口排着长蛇般的队伍，每个入境旅客的每件行李都要经过扫描机的检查。我的大行李箱底铺着满满一层的《争鸣》，那是杂志社托我转给大陆作者的，其中的2017年10月号，刊发了父亲为杂志创刊四十周年所写贺词。

我提起从扫描机传送带上稳稳送出的箱子，放在行李推车上向海关出口走去。一个小伙子从屏幕后追了出来，脸上挂着友善的微笑：“阿姨，您箱子里是不是有好多书？”

我说：“是啊。”

小伙子问：“都是什么书啊？”

我说：“杂志。”

小伙子转身跑回去了，用后背身跟我说“Bye-bye!”

走出海关，心中祈祷：但愿这是个好兆头，父亲尚无大碍。

三天前的3月31日，我和丈夫巴悌忠正在美国东海岸的女儿家，是为了小外孙女的四岁生日从西海岸飞过去的。半夜连接住在父亲楼上朋友的长途电话、朋友居住在美国的哥哥的手机短信、悌忠弟弟的来电、表弟女儿的电邮，转达了同一个信息：“3月30日你爸住院，情况不好。”

我们原计划是4月8日回国为父亲过生日。急忙唤醒已经入睡的女儿，告诉她我们必须立即改签机票，明天一早飞旧金山，然后回大陆。

4月1日一大早，女儿一家送我们到机场，飞机正点，傍晚十分到家。匆匆收拾了行李，确认机票……忙完了已是午夜。第二天飞机提前从旧金山机场起飞，北京机场海关小伙子温馨“迎接”，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

我们从首都机场打的直接到了北京医院。正在西门排队办理探视手续，父亲

的车开到了门口，司机满起（也是继母的女婿）招呼我们上车，不用办了。门口的警卫看到车前风挡玻璃内的“通行证”，打开铁栅栏，满起又用他的乘电梯卡将我们送上了八楼。找到815A，穿过会客间进入病房。继母张玉珍坐在靠着阳台玻璃隔屏一面的沙发椅上，二表哥力丰的妻子进进也在，老头子在昏睡。

向张阿姨询问情况，她说：3月27日早上八点半了，你爸还没有起床。强把他叫醒吃早饭，坐在客厅沙发里一会儿又睡了。3月30日逼着他来医院看病，就被留住院了。一直不好，总是昏睡。

说话间，我发现父亲艰难地动了一下，像是要翻身，眼睛也微微地眨了一下。我急忙俯下身去在他耳边唤了一声：“爸爸。”父亲张开眼，很茫然地看着我，又闭上，右眼角滚出一颗大大的泪珠。

他开始说胡话：“一步，一步；两步、两步；三步，我走了第四步就明朗了，但是对方不理解，我走了第四步，就明确了，但对方不能理解……”反反复复，约三十分钟之后渐渐地苏醒了，认出我，清楚地发问：“哦，小妹呵。你回来了。这次呆多长时间呵？”

我附在他耳边说：“二十多天。”

父亲笑了：“好，好。”随即又问：“这次呆多长时间呵？”我担心他是有点糊涂了。

我说：“很长，一时不会走，你放心。”

父亲点点头。我将悌忠让到床边，老头子立即认出了：“悌忠呵！”又看到立在床尾的进进，问：“力丰也来了？”

从进进联系到力丰，看来脑子没问题，我稍稍松了口气。

父亲又开始喃喃地念叨着什么，约十五分钟后沉睡过去。

我们和进进一起离开医院。进进在瑞典的老年护理院工作，她说：“舅舅的情况现在看起来问题不大，还算稳定，会慢慢好转的。”

2018年4月4日

一早，乘满起的车到了医院。非探视时间，只能利用他的“通行证”进入那座高于住院大楼。走进病房，只见父亲双眼明亮地躺在床上，头微微地侧向门口。见我进来了，让小余（在父亲家做了十几年的保姆）把床摇起来。

我刚刚在床边的椅子上坐定，老头儿便开口了：“你跟我说说，外界这次对习近平如何看呵？全票通过不是笑话嘛。”显然指的是刚刚通过的废除国家主席任期两届的宪法修正草案。“普京当选 76%赞成票，2/3 得票率，这还像点话嘛。”又说：“你们那个总统家伙乱来，一塌糊涂。”跟昨天真是判若两人——还是我熟悉的父亲呵！

我笑着回答他：“可是很多人喜欢川普。”

父亲“哦”了一声。

10 点 40 分左右，组织部秘书长、老干局正副局长连同司机一行四人，带一篮水果来看望。我唤醒了父亲，秘书薛京告诉他：“部里来人看你了。”

父亲看清了来人，满脸堆笑地伸出手一一相握、致谢。秘书长、正局长坐下来，副局长，司机退到外间恭候。我和薛京不约而同地拿出手机，拍照、录像。局长立即紧张地从坐椅上立起：“薛秘书，大姐，咱们说好，就在这儿照，不外传，一定不能外传！”又加上手势重复说：“一定不能外传，一定！”

我觉得有些搞笑，但也不想难为他：“你放心吧。我答应你，说话算话。”他这才又坐回去，继续“代表组织问候李老”。

组织部的人走了，父亲仍然很精神，让我坐过去聊天。说他给老家平江县写了一首关于彭德怀的诗。我说：“看到了，网上有”。就从手机上找到一位在胡佛研究所工作的朋友发给我的照片，送到他眼前：“这是网上传的你的字的照片。”老头儿一下子高兴了。我又在手机上翻出网上传的他的十九大书面发言，他兴奋了：“网这个玩意儿厉害呀，手机厉害呀！现在是网络时代，拦不住了！”

午睡过后，张阿姨的女儿小玲、女婿满起，儿子胜利来了。两点半，护士进来招呼我们去会议室开会。大家走在去会议室的路上，胜利说：“我听说插管后可以活好几年，好好的，没事儿。”我说：“那是植物人，不是真正意义的人。对我爸不是‘好好的，没事儿’。”

会议室里，组织部上午来过的那位老干局副局长、两名干部还有秘书薛京已经到了，他们坐在会议桌靠门一侧的左边，把正中间的位置留给老太太，小玲、胜利依次挨着老太太的右边坐下，空给我哥一个位置，然后是我和满起。

一位副主任医生，一位神经科医生，一位内科医生随后进来在桌子的另一侧坐下。副主任先谈，没有客套，直奔主题：李老这次入院是因肺部感染，心脏也出现问题，经药物控制，目前情况已经稳定。但连日大便均带血，可以肯定有癌

症，但是没有必要确诊，因为确诊后也无法进行任何治疗，而且这不会是李老的致命病症，最后威胁生命的会是心肺衰竭。鉴于李老的年龄和心脏、肺部的情况，随时会出现突变。今天请你们来谈的目的，是希望家属对是否做心脏体外复苏和切喉管上呼吸机抢救作出决定。因为这些属于非治疗手段，做还是不做，医院不能决定，要由家属决定。这个会本来早该开的，因为说要等美国的女儿回来，拖到今天。现在大家都在，明天开始清明放假，今天需要有个决定。

老头子有癌症，这让张阿姨很意外：“怎么好好的，得了癌症呢？怎么会呢……”没有人打断。

但是我看出医生们有些不耐烦了，只好先开口：“我表个态吧。李锐是有尊严的人，有尊严地活；走，也要有尊严地走。一切不属于治疗的抢救手段都不上。”

正在这时，我哥进来了。我简短地向他说了医院召集这个会的目的和我刚表示了的态度，他立即说：“我看得多了。不抢救。”

张阿姨有些不高兴：“你看什么多了？”

哥哥怔楞了一下，说：“我妈妈最后住院时，我看到其他病房的很多老人插着管，就那么躺着。应该让爸爸有尊严地走。”

我转向对面的医生们：“我们这一边孩子的态度很明确了，但是老太太的意见是第一位的，要以她的为准。”

张阿姨说：“得给我几天的时间想想，我现在脑子乱了、糊涂了，做不了决定。”

副主任温和、但是非常坚定地说：“对不起，这个决定必须今天做。明天就开始清明假期，病房只有值班医生。李老万一出现情况，医生需要根据家属的意见进行处理。”又说：“我们还有别的事情，不能等了，我们先走，你们家属自己商量吧。”

老干局副局长和两个干部也站起身来，对秘书薛京说：“我们还有事，先走了。”

我有点着急了：“这个意见书上得有单位的签字呵，你们走了，今天不就签不成了吗？医院等着决定呢。”

副局长说：“家属不做决定，我们怎么签呢？”

我说：“你们就签：同意家属意见。”

副局长拿起笔立即签了。

张阿姨还在自语着：“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得了癌症。我接受不了……”

进来了一位医生，冲着众人说：“对不起，下面我们还要用这个会议室开另一个会。要不，您们到病房继续商量？”

小玲扶起老太太，大家一起回到病房。父亲依旧睡着，张阿姨颓丧地跌坐在沙发内喋喋自语：“癌症，怎么会是癌症……”。渐渐逼近下班时间，我无可奈何地对胜利说：“跟你妈妈说说清楚吧，五点之前怎么也得有个决定。”老太太终于在两份表上签了字：不做体外心脏复苏，不做切管上呼吸机。我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父亲可以不受罪了。

2018年4月5日

下午一点半到医院，父亲一直在昏睡。我拧了一个毛巾替他擦脸，老头子有了感觉，睁开眼冲我笑了一下，又闭上。过了很久，老头子醒了，朝我比划着：“拿来、拿来。”见我不明白他要什么，着急了，提高声音焦躁地说：“你那个东西，你带来的那个东西……”我试探着将昨天上午放在床头柜上的终刊《争鸣》拿给他，翻到有他的贺词的那一页，老头子安静了下来。

父亲是这样写的：

今年10月是香港《争鸣》杂志创刊40周年，这是一件非常不易之事。虽然邓小平当年向香港人民做过“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

生活在大陆保持了独立思想的人，去年丧失了最后一块可以发出声音的阵地——《炎黄春秋》。我今年已经101岁了，该说的话早就说够了，该写的意见也



看终刊《争鸣》上自己写的贺词

早就写了，不过头脑还是难平静，因为宪政何时大开张呢？（这是我晚年写的一本书的书名）我还在思考，还要不断地从比我年轻的人的文章中汲取营养，活到老、学到老。因此衷心地祝愿《争鸣》越办越好，继续为用自己头脑思考的人们提供一块交流和争鸣的阵地。

父亲题写贺词时当然不会想到，这一期竟成了《争鸣》的谢幕之作。创刊于1977年11月的香港杂志《争鸣》在2017年10月停刊。老头子就那么攥着、看着自己的贺词，久久不放，也不知看明白没有。

半天，父亲举起右手冲我比划，嘴里“呜呜”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看他的手势，我猜大概是要喷雾剂，便递到他的手中换下了《争鸣》。他将小小的喷雾器拿在手里颠来倒去，就是握不正。我把住他的手，将喷口对好，帮着按了几下，老头儿点点头，闭上嘴深吸气。须臾，又索要，我又帮他喷了一次。还要，我没有再给。父亲用手在空中划拉、划拉……最后放弃了，渐渐入睡。

张阿姨陪住的床是放在用落地玻璃与病房隔开的大阳台内的，这时午睡起来，见我坐在老头子的床边，就在另一边坐下，问我：“你爸跟你说过回平江的事吗？”

我明白，她这是在跟我谈父亲后事的安排了。便说：“说过不开追悼会、不盖党旗、不进八宝山，回平江”

张阿姨说：“你爸跟我说过‘你不回平江，我也不回，我们一起回。’可是回平江是个大事儿，自己办不了，要组织出面。那个地方也不好，路不好走，人也到不了。”

我没有再说什么。

2018年4月6日

下午两点钟左右到医院。病房里的电视开着，音量很大。我惊喜地发现父亲睁眼躺在床上，精神甚好。听到声响，偏过头来。见是我，就说：“胡德华一会儿来，我要坐起来。”我把床摇起来，老头儿闭目养神。

德华和夫人三点过后到了，老头子高兴地跟他们握手，底气十足地说：“我难受的事儿，国家这么多年搞成这个样子，三件事要弄清楚（老头子晚年见人就讲：要搞清楚历史是怎么回事、党是个什么玩意儿、主义是个什么东西）。中国就是没有民主、科学，后来又出了个主义，一个共产党，怎么办呵？五四本来出现转机，又出了马克思、共产党、毛泽东，只有中国才能产生。”

德华应和着：“只能专制才能出共产党。”

老头子说：“中国改朝换代靠农民战争，干掉一个皇帝，又出一个皇帝。他（毛泽东）第一篇原稿我看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外国留学回来的，大学教授，大官统统是反革命。出现了习近平是你们的责任，你们要把他搞清楚。就是没文化？毛就是没文化，数学打零分。习文化很低。我很伤心，他爸爸多好，痛心得很，搞出这么个儿子。”

德华说：“习仲勋除了在（斗争胡耀邦的）生活会上说‘你们这是逼宫’，他还说过：‘你们批判胡耀邦的那些事情，也有我一份’。”

老头子叹气：“仲勋和耀邦是我最好的朋友。习近平我简直想不通，后来才知道没文化。你们有责任搞清楚。你爸爸多好，我每年去深圳都去看他。”

父亲去深圳看的是习仲勋，把他说成德华的爸爸，显然是累了，有些理不清了。就跟德华说：“不聊了吧，让老头子休息。”

父亲指着我问德华：“我这个女儿怎么样？”

德华说：“我们早就认识。”

父亲说：“她硬是把她那个妈妈写出来了。”父亲非常看重我写的《我有一个母亲》那篇文章，他一直跟我说：应该把你那个妈妈写出来，太典型了。但是他没想到我真地写了。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反对的人认为违反了中国的传统道德。

德华说：“李叔叔，您休息吧，我们再来看您。”

老头子点点头，随即疲倦地闭上眼睛。

2018年4月7日

下午，约一点十分到医院。小玲正在外间穿衣服准备回家，跟我说：“老头子一上午不肯睡觉，说昨天胡德华和李南央来了，今天李南央还要来，我要等她。”

走进病房，老头子醒着，见我进来，向阳台方向看去，老太太在午睡，招招手，示意我坐近些，压低声音问：“上次美国大使要来看我，她说是你搞的。是吗？”

2011年4月，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离任前想以私人身份拜访李锐，大使馆的朋友请我帮助询问父亲是否愿意见。父亲非常高兴，同意了。还说见了洪博培他要请他向美国总统转达意见：美国过去对中国一直非常友好，用庚子赔款创办了清华大学，还帮助中国创办了协和医学院同湘雅医学院，抗战中又帮助中国。而现在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战争不解决问题，用自己优秀的文化影响对方才是最好的方式。张阿姨当着我的面也表示了同意。但是我走后，让秘书薛京向组织部汇报此事。部里回话，说洪博培要见李锐需通过外交部申请。我对父亲说：洪博培是卸任大使，作为一名普通美国人拜访你李锐——一个中国公民，

要求他向中国政府请求批准，他不会做这种自取其辱的事的。你为什么要这样自觉地让孙子辈管着，自取其辱呢？（“现在是孙子管爷爷”是父亲常挂在嘴边对“当今”表示不满的话。）

我乐了：“我哪有那个本事，能认识大使？”

老头子冲阳台抬抬下巴：“她认为是你搞的名堂，你跟她解释一下。”

我说：“没用，她不会相信我的，不解释了。”

父亲没再说什么，开始聊习近平没文化，又回忆2006年在浙江请他吃饭的事儿，我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我那天跟习近平说，你现在可以打擦边球。习近平说，你可以，我哪里敢呵。”

又说：“玉珍说习近平那天没讲那样的话。不对嘛，习讲了、绝对讲了，我也绝对地讲了那个话，我已经写在书里了（按：指《李锐口述往事》）。”又聊毛泽东讨厌知识分子，还说：你在美国有个任务，就是要把中国的问题搞清楚。

我见他脑子很清楚，精神也不错，张阿姨又不在近旁，就贴在他的耳边一字一顿地问：“大家都关心：你要不要开追悼会？要不要盖党旗？要不要进八宝山？”

父亲问：“哦，就是说我去世了……”

我说：“对。”

老头子望着天花板，半天、半天，足足有半分多钟才开口，倒着从最后一个问题回答我：“问题是平江人会怎么样。玉珍很可能会愿意，我们两个人火葬后回平江，放在父母亲那里（墓地）一起。”

我问：“你自己也愿意吗？”

父亲说：“那样对我父亲也好，我父亲是好人，另外玉珍愿意。留在北京有什么意思呵！放在哪里？它给你放在哪里？你说吧，有人愿意吗？那就留在我现在住的房子里，那倒是可以。再不呢，平江了，那是我愿意的，我自己也愿意。平江是个旅游区，特别是彭德怀也在那里。”

对我“要不要进八宝山”的问题，父亲虽然没有正面回答，但是明确说出了“（回）平江那是我愿意的”，算是有了答案，便转到第二个问题，问：“盖不盖党旗啊？”

父亲还是绕着说：“共产党没有科学知识啊，也（体现）在这里：这个红颜色是破坏眼睛的，你知道吧？绿颜色是保护眼睛的。共产党一革命就是红旗，到

现在还是喜欢红颜色。那个电视台搞活动，都是红颜色多，唉！所以这个人类的发展啊，这个二十世纪呀，是一个特殊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苏联，搞了，垮了；中国，搞了，还没有垮，但是它 xxx（作者按：隐去国骂），死那么多人，中国共产党的可怕是饿死人呵！杨继绳的父亲是饿死的。杨继绳出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两厚本书你看了没有？毛泽东这个人呐，我认为是天下最坏的人之一，能够那样死人，于心何忍？！太可怕了。”

老头子顺着毛泽东这个题目一直说下去了：“他自己的生活那么好，我不是在他家里吃过一餐饭，就是有熊掌嘛。他在延安的生活也是最好的，在延安吃什么呢？两样东西：小鸡、泥鳅。长征，就是白天抬着他睡觉，晚上起来做事情。唉呀！这个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周恩来那是对他是最讨厌的了……”

在外面阳台上午睡的张阿姨这时起了身，老头子敏感地察觉到：“噢，她起来了。”立即住了嘴。那天以后，我再没有找到机会问父亲第一个问题：“要不要开追悼会”？

张阿姨走进病房，父亲说：“美国大使来看我，不是小妹搞的。”老太太装作没有听见。

我说：“爸爸，聊了半天，累了，你睡一会儿吧。”

怎么办啊？这个党！

日前父亲李锐“正部级待遇”的葬礼，没有悼词、没有生平介绍、没有挽联、没有哀乐……就连前来告别的人们手捧的鲜花都被拦在了大厅之外。人们愤怒地说，那是一个“无声无字”的追悼会。

我是多么地为父亲骄傲。中共在李锐生前惧怕他的声音，在他死后惧怕他的遗容。一个人能够把那个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党吓到如此的地步，他在天有灵，一定会开怀大笑。

父亲在他 101 岁生日的那天，在医院的病床上发出了自己的“绝唱”。他虽然最终没能彻底摆脱共产党对他的钳制，但是他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可以笑别人生。

以下是我守在父亲病床边写下的日记。经过编辑、删减。

2018年4月8日

下午一点到医院。父亲的精神不如昨日，似睡非睡。看到我来，很高兴，说今天是9号，可以出院了。我说：“今天是8号”，他说：“不是，是9号。”我给他看手机上显示的日期。老头子叹了口气：“哦，才8号，还是出不了院。”又问：“我这次到底因为什么住在这里？”

我说：“你得了感冒，引起肺部感染。慢慢恢复，稳定后，再出院。别着急。”

父亲又说：“上午德华来过。”

我说：“德华是前天下午来的。”

父亲想了想：“哦，是前天下午。”

我说：“我明天去紫阳家鞠躬，你有什么话？我带过去。”

父亲立即说：“耀邦、紫阳救了这个党，救了这个国家。紫阳在经济上比耀邦强。”

我说：“紫阳和夫人的骨灰还放在家里，安葬不了。”

父亲说：“这是岂有此理的事情。”接着跟我谈起他第一次是怎样见到紫阳的老伴儿的，时空有些混乱；又提起阎淮的新书（《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还是有些前言不搭后语。

我问张阿姨：“薛京还没来？”

她说：“来，可能一会儿来。他每天都要向组织部汇报老头儿的情况。”

这时父亲在磨子潭的患难朋友、画家王申生到了北京站，他是特地从上海赶过来看老头子的，手机短信问我如何进住院大楼。大约三点钟，申生进到病房，老头子一眼认出来，说：“王沪宁，我们是患难之交！”

我用写字板写上“王申生”递到父亲的眼前。他笑了：“申生、申生。王沪宁是那个家伙。”“申生你多少年没来了啊。”款款地回忆起自己在磨子潭流放地跟申生相识、相交的过程，清晰、准确。

我见老头子不停地说，很激动，半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打住的意思。怕他太累，便对申生说：“就到这儿吧。”申生说：“好。”

父亲伸出手来跟他握别，对我说：“你要请他吃饭。”

我说：“当然了，你放心。”

我送申生出来，在走廊上说好晚上在国宏宾馆再见，请他吃饭。

2018年4月9日

下午约两点半在22号楼院门外上了满起的车，我问他：“老太太今天上午回家洗澡了吗？”因为张阿姨昨天说自从老头儿住院她就一直陪着，没有泡澡，身上不舒服。满起告诉我老太太昨天半夜吐的东西带血，今天上午去复兴医院看病，医生让住院检查了。现在北京医院只有小余陪着。

走进病房，父亲睡着，小余告诉了我老太太的病情。父亲一会儿醒了，看到我，说：“你跟我谈谈你跟他们开会的情况。”

我笑了，知道他是在问我这几天跟朋友们聚会大家都聊了些什么，想听听外边的消息。我告诉他上午去了赵紫阳家，见到紫阳的儿女……刚说了个开头，老头子就睡着了。

2018年4月10日

8点40分到医院，老头略睁眼，知道我来了，随即睡去。九点多翻身，又睡。手痒，用冷水敷手，方止住抓痒。

董医生来查房，我问情况，她告诉我利尿的药明天结束，排尿增加关闭尿管，每两小时放一次，恢复膀胱弹性。我问她老头子为什么总睡，她说再观察两天看看，目前各项指标正常。

小余午睡，我陪父亲。1点11分闹了一下：“小妹！解绳子！”（因为怕父亲拔管子，医生让把他的手捆在床栏杆上）我没有答话，又叫：“叫服务员来！”眼色很凶。我还是沉默着。须臾，又睡着了。3点40分左右，薛京领父亲的日本朋友及川淳子和晏乐斌进来，晏乐斌还带了文章让老头子看。

我嗔怪薛京：“你怎么净当滥好人，不是不让人来看嘛？”

及川一直鞠躬、道歉。我也不好再说什么。大概感觉到动静，老头子睁了睁眼，似乎认出及川，但也只点点头，没有说话。

我说：“你们还是走吧。”

父亲向及川和晏乐斌挥挥手，立即了睡过去

2018年4月11日

父亲一直昏睡，直到下午1点48分醒来，看见我在床边，问：“你哪天回美

国啊？”

我说：“20号。”

又问：“你住在哪儿啊？在哪儿吃饭啊？”

我告诉他还是住在国宏宾馆，宾馆里有餐厅，下楼就是，不用出门，很方便的。

老头儿释然地点点头。又问：“大妹他们（按：我大姑的孩子）来了住哪儿啊？什么时候去家里？”

我说：“他们不去家里，晚上我请他们在国宏吃饭。”

老头子转过头看着满起：“我明天下午出院。”

小余告诉我：“老头子是有东西要给你。”

果然，父亲说：“我要回家，我有东西，重要的东西要拿给你。”

我说：“你告诉满起在哪儿，让他取了交给我就成了。”

老头子摇头：“别人不知道，我自己拿给你。”

（父亲到底想给我什么，已经无法知晓。但是他的绝大部分日记原件和其他的文字原件都已经在这些年里陆陆续续地交给了我，由我按照他的意愿捐献给美国胡佛档案馆了。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得不到的就得不到了。也许哪一天会出现在北京潘家园的字摊上。）

一会儿进来一群医生查房，老头子高声说：“我女儿从美国回来，给我订好了三桌饭，我要出院！出去过生日！”

我确实是早就在国宏宾馆预订了三桌生日宴，准备在4月13日那天跟去年一样，请他的尚健在的不多的几位老哥们和夫人，以及几位老秘书、组织部的老部下和从各地特意进京的晚辈们为他祝寿。父亲看来是真盼着，要实实在在地过101岁的生日。

医生们走了，父亲跟我闲聊，说：“我这个人运气很好，一个老伴照顾生活，一个女儿让我历史留名。”又说：“你把你在美国的职业写下来，明天组织部会来人看我，我要讲给他们听。”“你明天早晨一定来，部里要来人看我。”

我答应他说：“哎，来，一定来。”

父亲盯着我看，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在美国，在女人中算一般、还是漂亮的？”

真是怪事，怎么会想出这么个问题？我逗他：“算漂亮的。”

父亲像小孩子一样地笑了，很灿烂，冲我撇撇嘴角，似乎是在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2018年4月12日

早晨八点一刻去医院。

九点，接到从长沙来的大表姐的短信，他们已经入住旅店，她和毛弟下午到医院。在电话中说好：晚上我在国宏宾馆请他们吃饭，这是父亲一再嘱咐的。

九点半，秘书薛京和组织部老干局的几位干部先到，将带来的大花篮和礼品放在病房门口。留下一人守在那里，其余的人走了，我猜是去恭候常务副部长姜信治大驾。

这一时刻，继母张玉珍自4月4日老干局的人来探望后就一直在念叨、等待：“你爸这样的级别，光是老干局的人来探望是不对的。应该是部长来，至少是常务副部长来。”“他们来了，我要跟医院提条件，要给我们用最好的药。上次你爸屁股上长了一个疖子，怎么都不好，后来用了好药，两千多块钱一贴呢。几天就好了。”

可是，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终于要来了，她却住院，见不到了。

不一会儿，守在外面的那个人走到会客室和病房的隔门处小声对薛京说：“来了，来了！”薛京急忙起身跑出去。却久久不见动静。一会儿，听得门外又是一阵：“来了，来了。”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我走到阳台上，向医院西门那边看过去。只见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和一群穿着黑夹克的人在那里扎着堆儿，薛京也在其中，都翘首往门外的大街上张望着。我进到屋里告诉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的父亲：“还没来。”父亲在护士查看输液时就醒了，这时让我把床摇起来，闭目等待。

终于，走廊那边响起了蹑蹑的脚步声，然后是更大的一片嘈杂，一群白衣、黑衣人簇拥着一位身材中等、略显消瘦，也是身穿黑色夹克的人出现在病房入口处，我知道这就是现任组织部姜常务副部长了，本能地在心里将他跟过去这一位置上的李锐作了比较，不免当了一次九斤老太太。

老干局副局长和看起来是司机和普通干部的一些人，谦卑地止步于外间会客室，几位医生则留在走廊里，只有薛京、两三位白衣人和老干局局长陪着姜副部

长进到病房。薛京在我耳边轻轻地说：“那是常务副部长姜信治，旁边的是北京医院院长。”

闭目养神中的父亲这时睁开了眼睛，目光扫过这一群人，透出我熟悉的、李锐特有的鹰一般的锐利。姜部长走过去跟老头子握手，老头子满脸是笑，示意他坐下。老干局长从我和薛京身边走过，小声叮嘱：“不要照相，不要录相！”然后坐到姜部长旁边，上身前倾着，屁股只一半贴在椅子上。

老头子开口了：“谢谢你们来看我。我明天就102岁了。”随即话锋一转，开始朗声地“大放厥词”。从曾国藩教儿谈起，重复他对家中来客讲过上百遍的故事：抗战时一位美国飞行员的飞机被打下来，迫降在曾国藩家不远处，曾家七个人在，个个都会讲英语。我们搞了些什么？一建国，就学苏联，取消英语。

我不意外——父亲心里明镜似的啊，张玉珍政委¹不在，他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姜部长的表情却是意外的，他大概对李锐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完全没有精神准备。我真是佩服他的定力，能够将开始的笑容一直凝固在脸上。

老干局局长却有些坐不住了，几次打断老头子，试图转变话题：“姜部长来看您，是给您拜寿的。”

老头子向他一摆手，那意思是：“你别插嘴！”依旧是滔滔不绝地自说自话：“现在那个人的像还挂在天安门上面，对习近平也搞个人崇拜，像什么话！”

这话一出，我都替姜部长捏把汗了：再听下去若有人汇报给习老大，可不大好解释清楚了。

姜部长确实坐不住了，站起身，伸出手给老头子：“您说了半天，累了。您休息、休息。我们告辞了。”老头子就势抓住他的手：“你别走，我还没有说完。”

老干局局长连忙上前解围，用自己的手强换下姜部长的手握住老头子：“部长忙，还有事，还有会。”然后松开，几乎是逃也一般，踩着姜部长的脚后跟离开病房。院长和医生也跟在后面向外走去。

父亲从病床上抬起上身，冲着这些人的背影大声嚷着：“你们不爱听我也要

¹ 2006年父亲在一家饭店接受德国之声和香港、日本等媒体的联合采访，其时谈到“胡锦涛是戴红领巾中长大的”，因而招致组织部办公厅上门谈话。父亲与来人发生了激烈争执，老伴儿张玉珍出面圆场，向来人保证：今后看住家中的电话，看住李锐，再不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沈跃跃任组织部副部长在李锐生日来家探望时，特意送了张玉珍一条高级丝巾，表扬她政委当得好。“政委”称呼来自李锐本人，他在2005年米寿时曾作“赠老伴玉珍”一诗，原句：“二十六春如一天，医生护士保安员”；后改为：“护士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

说，你们把我看成坏人好了，我不在乎。我就是要说……”

我是在场的唯一家属，想着应该代表父亲送送客，便也到了走廊，以为看到的会是一群离去的身影。没想到院长和姜部长还有主持父亲治疗的几位医生站定在那里，正在等我。不禁暗自称奇。

见我出来，好像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姜部长笑容满面地对我说：“你看看，你们家属有什么要求，对医院有什么意见？”

我对张阿姨真是有些佩服了，还真有这么个仪程：部长当着院长的面问家属有什么要求。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没要求，什么要求也没有。”“医生好、护士好，都好、非常好。没有任何意见。跟老百姓的条件没法比，我要是再提什么要求就太不像话了！”

看来，姜部长对我的这个回答也是没有准备，愣了一下，说：“噢，那好，那好。”

院长脸上带着诧异，但是释然地重复着：“没要求，跟老百姓比……”

中午我和小余、薛京在外屋吃饭，饭后进到内间，发现将父亲两只手绑在床栏杆上的绳子都被解开了，老头子双眼明亮地看着天花板。我们仨异口同声地发问：“你怎么搞开的？”老头儿眼中闪出童趣的星星：“这还不容易，我做给你们看。”

父亲的心情真好啊！

下午大妹、毛弟和力康、力丰来了，宋晓梦随后也来了，说是从火车站直接来的。我说：你身上有多少病菌，呆会儿可千万别跟老头子靠得太近。我们在外屋悄悄说话。老头子醒了，众人进到病房，父亲兴奋地同大家聊天，跟前几天判若两人。

2018年4月13日（李锐101岁生日）

一早，满起送我和悌忠去医院。老头子在看电视，非常精神。见我们进来就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不让出院，你订的饭怎么办啊？”

我说：“今天晚上我请大妹他们吃饭，然后请朋友们吃饭。你和你老哥们的那桌，给你留着，等你出院了再吃。”

父亲高兴了：“好！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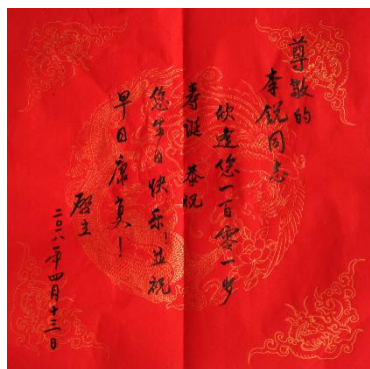
又问悌忠：“你爸爸、妈妈都好吧。多大岁数了？”

悌忠回答了，又说：“我爸爸、妈妈问您好，给您拜寿。”

悌忠坐到十点钟走了，他要提前回美国。北京的污染令他耳鼻过敏、中耳发炎，在北大医院看门诊，医生错开了抗生素，浑身起满了疹子，整整24小时没有排尿了。在美国当医生的女儿怕他肾出毛病，让他赶紧回旧金山看“真医生”。临出门，他交给小余装着钱的一个信封，小余不要，悌忠硬塞给她。父亲看着悌忠走出去的背影：“好女婿，好女婿。”一会儿又睡了。

十一点多，原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老秘书和现任秘书来了，送来胡启立在大红纸上亲笔写的生日贺词。老头子非常高兴，让我把贺词放在阳台玻璃隔屏下的台子上他可以见到的位置。

四点左右李慎之的女儿尔柔、黄万里的女儿肖路和美国之音记者叶兵及一位青年摄影师带着花篮和一幅镶在长镜框里的诗走进病房。我不认识叶兵，但是因



胡启立让秘书带给李锐的生日贺词

为看节目，对他的脸是熟悉的。肖路大约一个小时前跟我联络过，说是他们的庆生会刚刚散了，带着花篮正在来医院给老头子拜寿的路上。我说：老头子没吃上寿宴有点失落，见到你们会高兴的，来吧。可是参加他们聚会的美国之音记者也跟着一起来了却是我没有想到的，而且还进来了，真不知如何办的探视手续。

我让肖路和尔柔把花篮放在病房门口，诗的镜框靠在对着老头子床的位置上，让他能看见。

看着这些不认识或者一时认不出的来人，老头子的表情像是在问：“你们都是谁啊？”

我向他解释：“胡德华、陆德、阎淮、牟广丰、尔柔和肖路一些人刚给你过完庆生会，现在带着花儿来看你了。”

父亲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双手作揖：“谢谢！谢谢！”

叶兵走到床边自我介绍：“我是美国之音的记者。”

我观察着老头子的表情，如果他不高兴，我就客气地请叶兵离开。

老头子的眼睛一下亮了：“噢，美国记者！”我知道父亲进入了跟昨天上午相同的境况，清醒而亢奋——张玉珍政委不在，要“放肆”一搏了。

我在心里大呼：“苍天有眼啊！给了李锐绝唱的机会！！”

父亲开口了：“我已经进102岁了。101岁满了嘛，吃102岁的饭了。”头绪清晰。

叶兵说：“您对美国之音提一个希望吧。”

老头子想了一下，脸上露出顽皮的笑意：“美国之音播过我一些随便讲的厉害文字（话），有一次是习（近平）上台不久，我与一个老朋友的女儿一起闲聊，她就讲了一句什么话呢？她说现在网上有这样的话：‘毛病不改，积恶成习’，听说传到美国去了，美国把它公开了。”（笑）

“你知道吧？我有一本书，叫做《李锐口述往事》，最后一章就是写我接触过的高层人物。从毛泽东开始，最后一直到习近平……我那个时候也不晓得他的文化程度那么低。你们知道吧，他小学程度……当然那个时候我没有什么看不起他，因为他是仲勋的儿子。仲勋你们知道咯，那是了不起的，我和仲勋又是好朋友……现在（摇头），他很难讲，现在到底会怎么样。”

叶兵问：“您对他有没有什么忠告？”

父亲摇摇头、又摇摇头：“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嘞……这个人现在他能接受？不可能，不可能。”

“中国这个国家啊，没有办法。它是一个什么文化传统呢……中国这个国家本来五四已经解决了缺乏什么？就是人权同科学。五四运动已经解决了，结果又来了一个马克思，马克思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所以到中国来就很容易被接受。”

“毛泽东这个人讨厌知识分子，他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原文我看过，他怎么讲呢？……第一留学生，第二大学教授，第三大官，统统是反革命；第二、中学教员、中等官僚，半反革命；小学教员……”

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医生走到床边，俯下身：“李老，咱们不说了，休息了。”

父亲还想继续：“胡适之是第一反革命，那个时候……”

医生的态度变得十分坚决：“咱们休息、休息吧。该吃饭了（鼻饲）了。”

父亲无可奈何地停住了。向众人抱歉地摆摆手，告别。

医生说：“这里人太多了，李老今天太累了，你们最好都走吧。”

我跟众人一起离开了医院。

2018年4月14日

一早到医院，父亲一直昏睡。小余说昨天大家走了以后，老头子开始犯糊涂，折腾了很久才睡着。

下午一点一刻老头儿醒来，将我唤到身边，说：“你把你这次回来每天来的人，来的人都说了些什么记下来。还有你在外边跟人开会（老头子把聚会说成了开会），大家说的话都记下来。”

我说：“嗯，明白你的意思，我会的。”

父亲又说：“没想到胡启立也对我这样关心。我这个人还是喜欢被人吹捧的。”随即闭上眼睡过去了。

2018年4月15日离京去长沙公干，4月18日凌晨两点半回到国宏宾馆。

2018年4月18日

九点四十五分到北京医院西门，盛禹九和儿子捧了一大束鲜花已等在那里。满起让他们上了车，跟我们一起进了住院大楼。

护士正在里间给老头子换药，我们在外间会客室等候。盛禹九拿出一本《李锐期颐集》，说杜光九十岁生日，想请老头子在扉页题写几个字，将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杜光。

我说：“我爸不可能题词了，写字也困难。要不您自己拟上几句，在扉页上写好，我唸给老头子听。他若听明白了，同意，让他在下面写个落款。您看这样行不？”

盛禹九说：“好，就这么着吧。”在扉页上写下了：“贺杜光同志寿诞。欣逢鲐背，尚望期颐”。

护士出来告诉我们可以进去了。

我们走进内间病房，老头子起初认不出盛禹九，过了一会儿想起来：“噢，盛禹九。”开始跟他叙旧，条理清楚，叙述顺畅。

盛禹九拿出了那本《李锐期颐集》。我在父亲耳边一字一顿地解释，又在写字板上划，费了好大的劲儿，老头子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好、好，我签字。”

我把笔放进父亲的手里，替他拿好书，老头子握笔的手一直在抖，笔尖终于

落在纸上写了“李锐”二字，十分工整，然后写落款日期，中文同阿拉伯数字混杂一起。我伤感地想：这大概是他为人签的最后一本书了。

盛禹九父子走后，小余告诉我，我去长沙以后，她就自做主张拆开捆老头子手的绳子，老头子的情绪好多了。

我告诉父亲：他的2017年、2018年日记本我让满起拿给我了。老头子立刻急了：“你不能拿走，我还要写日记呢！”

我情知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安慰他说：“我拿回去扫描了再给你带来，你病好了再继续写。”

他这才平静下来：“好，好。”

又说：“我还有好多东西要给你，让满起拿给你。”“哦，他不知道放在哪儿！”又开始焦躁起来。

我赶紧说：“没关系，拿不到就拿不到了，你别惦记着。你的日记本都在这里了，已经很好了。其他的你就不要想了。”

2018年4月19日

早八点四十去医院。满起在车里递给我两夹子资料，说是老头子要他复印给我的。我打开看了，是一些网上的文章，收下了。我知道是他的那些能够翻墙的朋友从网上给他弄到的，但是他不至于以为我在美国看不到吧。

进病房，父亲在睡觉。大约中午十分完全清醒了，问我：“满起拿资料给你了吗？”

我说：“满起复印了，给我了，你放心。”我有意地强调了“复印”二字。

父亲说：“我要回家，我还有好多资料给你。”

我还是不知道父亲到底想给我些什么，但是不是满起拿给我的那些网上资料的复印件可以肯定了。但我怕他着急、伤心，就安慰他说：“没关系，我还会回来的，下次我回来，你出院了，再给我。”

老头子问：“你什么时候还回来啊？”

我说：“就回来，就回来。”

中午我让小余午睡，我守床，老头子一直痰咳不断。

三点钟董医生来查床，老头子醒了，用手指着我：“我的女儿，六十八岁了，

在斯坦福大学。”

董医生说：“知道、知道。”老头子咧开嘴笑了，像个小孩儿。

快五点时，离开病房，站在门口默默地看着躺在床上昏睡的父亲：爸爸，请原谅我不能守在您的床边。我自己去年七月查出患有血癌，每月需验血调整化疗药物计量。我会挺住，把您的历史资料整理注释完，您也要挺住，我们下次再见。

在地铁上，我用手机短信向朋友们作了这次回国的最后一次有关父亲病情的通报：

南央4月19日4:00pm报：我明天将返回美国，这是在北京最后一次通报大家老头子病况：体温和血压正常，心脏监测已经取消。鼻饲、导尿、静脉注射埋管仍保留，需24小时输氧。昨天和今天都作了短时间脱氧试验，血含氧量很快降到90。昨天和今天两次试图让老头子下床在椅子上坐一会儿，他自觉无力，不愿意尝试。

从现在情况看，难以出院，医院监护，如不出意外可保证老头子稳定相当一段时间。但每日睡眠时间明显增加，清醒对谈时间也在逐渐缩短。昨夜十一点一位朋友给我手机电话，一定要到医院探望，我坚持不可，仍要来。我没有应允。希望大家替老人着想，不要到医院来了。

如有意外情况医生会及时通知我，我会从美国告知各位。请大家不要相信谣传。衷心感谢这20天大家的理解和对老头子的挂念。

2018年5月-10月

5月21日我群发出“约字”短函，6月10日截稿，共收到101人，12.5万字的“送字”。6月11日制版，12日成书《敬寄李锐》，立即开车送到6月13日回大陆的一位朋友家。6月14日朋友发来电邮：顺利入境，书已由所托之人当晚取走。6月19日，得到所托朋友的致歉电邮：书没有送到李锐手中。

7月21日上午，一位来美旅游回国的朋友成功地将第二本自印《敬寄李锐》亲自送到他手中。小余告诉我，老头子拿着书说：“了不起！真厉害！”

能让父亲在生前看到有这么多的人认同他的理念，赞赏他、敬重他，这应该是所有送字人对他最真诚的探望，带给他最深切的慰藉了。我从心底感谢所有送字的作者，让这本书代我陪伴在父亲的床边。

9月24日中秋节，朋友的两个妹妹带着8月在香港正式出版的《敬寄李锐》样书到医院探望父亲，小妹妹随后发来电邮：“老头子看起来身体状况还不错，每天上呼吸机也就最多两次，早和晚，平时就是鼻子吸氧，只是脑子反应有点慢，可能跟听力相关。书拿到后不撒手，一页页地翻看。”而她的姐姐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却是：“老头子已经很糊涂了，听不明白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反复地说：‘怎么办啊？这个党！’”

9月17日，小余生病住进北京医院普通病房，9月26日出院，27日返回家乡平江休养。此期间，请了一位护工护理父亲。

2018年10月26日

10月24日我们离旧金山，25日到京。10月26日一早去医院，被拦在西门，不让探视。小余下来接我们也无济于事。从探视室内间出来一人，对外间拒绝给我们办探视手续的女士说：“没来得及告诉你，保卫处杨伟（音）有交代，有个从美国回来的女儿可以允许探视。”但是外间的女士坚持：“让进也得下午三点后探视时间进，815A家属有嘱咐。”我说：“我也是家属，不是外人。你将心比心，你若从国外回来探视父亲，怎么能够只允许你探视时间看望，而不能像护工一样全天呆在病房照顾？”悌忠上前帮着问：“哪位家属？有什么交代，怎么说的？”那位女士有些恼怒了：“我不说了，我已经说多了。”

无可奈何，悌忠只好离去。我自己绕到医院的门诊区，曲里拐弯，设法进了高干住院楼。我在外间换衣服，听到小余在里间病房对老头子说：“你看看，谁来了？”

进到病房，看到父亲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冲我艰难地笑了笑：“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顺畅而清晰。

我说：“昨天下午……”他的眼睛已经合上了。

大夫来查房，告诉我发现有尿道感染，今天发烧到38.2℃，已经上了冰毯。

表姐大妹从长沙乘火车八点到北京，中午时分满起带着她和二妹进来。我试着在父亲耳边唤了几声，他睁开眼睛，茫然地看了看，又闭上了。午饭时间，小余去打饭，父亲似乎有了意识，眼睛微微睁开，我们姊妹立在床边，摘下口罩，我依次指着：“大妹、二妹”，又指指自己：“小妹”，老头儿喉头滚出：“三……”，

似乎明白了，但是什么话也说不出。

小余告诉我，她10月19日从平江回到北京，下火车后直接来了医院换下护工。老头子看到她，立即认出来了，双手竖起大拇指给张阿姨看，表示高兴，但是说不出话。小余说，老头子情况与她住院时已经大不相同，下了一个大坎儿。护工说一直发烧，不能下床活动，她到的那天刚停抗生素。10月22日又开始发烧，现在又恢复输液了。

2018年10月27日

一早，我和悌忠坐满起车到医院。老头子看到我们，似乎认出，笑了。

十点左右，小余见老头子醒了，问他看不看报。老头子点点头。我们将床摇起，把吃饭的小桌推到他面前，拿给他看《敬寄李锐》。我一页页翻过去，唸着人名，指着照片，告诉他是谁写给他的什么话。他的手剧烈地抖动着，但是将书攥得死死的，眼睛盯着书页，听懂没听懂，猜不出来。持续了五分钟，坐不住了，我们将床放下，就一直睡过去了。

2018年10月28日

早八点，我自己绕道医院门诊部进到高干病房楼。

老头子依然发烧，安静地躺着，没有睁眼。

2018年10月29日

早九点，坐满起车到医院。小余说老头儿昨晚发烧到39℃。但人很安静，没有烦躁的表现。我走到床边轻轻呼唤：“爸爸。”唤了几次，有了反应，轻轻地哭泣，但是没有睁眼。出现大量血尿。紧急唤来护士查看，说可能是冲洗导尿管时碰到了膀胱壁，过一会儿应该能够止住。

董医生来，解释十月份以后为什么不再给我电邮告知病情，说是高干楼进行了保密教育，首长的病情属于机密信息，昨天刚刚考完两张保密试卷。我问：“那以后如果父亲病危，医院也不通知我吗？”董医生说：“不通知您。”“阿姨（小余）跟您有联系，她会告诉您的。”

我无语……

2018年10月30日

看望悌忠病中的父母，没有去医院。二老同躺在家中并排放置的两张单人床上，请了阿姨小杨照顾，悌忠弟弟也基本整日守护家中。心中感叹：高官、百姓，两重天啊！

2018年10月31日

一早，绕道门诊部进入病房。

九点左右，小芹、小玲搀扶张阿姨进到病房，满起也来了。10:30分，医院召集家属和单位开会，通报李锐病情。院方有于主任，董、李两位医生，组织部来了四人。李医生主讲，说李老目前出现了DIC（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判断是静脉埋管感染造成，情况凶险。医院当会尽力，但是如此高龄，没有把握。

2018年11月1日

早八点一刻，仍经门诊部绕进病房。

于主任和李、董二位医生来查房。我说如此高龄，这样凶险的病况，你们还能够维持，为什么不写论文呢？于主任说：“写出来外国人无法理解，百岁的老人为什么要上这些手段维持？”

护士来作吸痰，老头子连反抗、挣扎的力气都没有，只艰难地说了一句：“不要了……”

晚上在国宏正跟几位朋友一起吃饭，突接小余电话：“小妹姐，老头子不好，你快点来！”我和悌忠急忙打的赶到医院，一路小跑成功地从门诊部绕进高干住院楼，值班的恰恰是呼吸科主治医生，告知我们病情：突然缺氧，已经上了无创呼吸机。再次向我们确认不进行创伤性抢救。一个小时后，满起开车带老太太和胜利到了，张阿姨留在病房过夜。

2018年11月2日

早坐满起车，他接老太太，顺便将我带入住院楼。

张阿姨离去后，我走到父亲床边在耳边轻唤：“爸爸。”他竟然张开了眼睛，

笑了——一种孩童般的、纯净的笑。直到我走，再没有醒。除吸雾、吸痰外，全天戴无创呼吸机面罩。

2018年11月3日

一早还是经门诊部绕进病房。

十点过，摘去呼吸机面罩换上强力送氧鼻管，做吸雾。父亲大睁着双眼，直直地看着我，“呵、呵……”要跟我说什么，但是什么都说不出来。

吸雾、吸痰后又戴上面罩，睡去。

2018年11月4日

进入病房如昨。吸雾、吸痰后，老头子清醒了，竟然含混地说出了一句我能听懂的话：“你在哪里吃饭？”小余开顽笑说：“女儿来了，你就不理我了。”老头子向她撇撇眼，甩了一下手，很有力气的样子。我们都高兴：老头子还不糊涂，还有劲儿！

2018年11月5日

经门诊部绕进病房。

父亲一直昏睡。于主任、李医生来查房，告诉我：尚平稳，指标有好转。明天会输血。

2018年11月6日

经门诊部绕进病房。

父亲醒来一次，我摘下口罩，似乎认出我，笑了一下，还是那种小孩子的笑。

护士来输血。方主任、李、董医生来查房，告诉我：情况还平稳，但所有指标都在边缘状况。

2018年11月7日

经门诊部绕进病房。

父亲情况稍有好转，呼吸机屏幕显示自主呼吸次数增加。摇起床一次，给他

翻看了《敬寄李锐》。神情专注，随着我翻页、解释，盯着书看，但是无法确定是否看懂了。

护士来作吸痰。做完后，父亲清晰地说了一句：“绝对不干了。”

一直沉睡。

2018年11月8日

一早仍经门诊部绕进病房。

父亲今天退烧了。医生来查房，告诉我DIC纠正过来了，但是肺功能太差了，自主呼吸已经很难，今后不可能脱离呼吸机了。

十点做吸雾，摘下呼吸机面罩换上强力送氧，父亲说了几次话，但是太含混了，我和小余都没能听懂。猜着拿给他看《敬寄李锐》，翻了几页，还是不知道是否看懂。

做完吸痰，睡去。没上呼吸机，只用强力送氧，希望老头子能睡得舒服些。

2018年11月9日

一早进病房如昨。

父亲又发低烧。小余说：给老头子擦个身吧，体温能降下来。果然，擦身之后体温正常了。

医生查房走后，父亲醒了，清楚地认出了我，拼尽全力对我说：“我还要，我还有，我还……”嘴巴一闭一张，费力地喘着，再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我看着心酸，附在他耳边说：“我还要待几天呢，不走，你别着急，以后慢慢说。”老头子合上了眼睛。后又几次睁开，几次认出了床边的我，几次笑了一一小孩子那样的、快乐的笑。

十点摘下呼吸机罩，换强力吸氧至十一点四十五分，复上呼吸机。

2018年11月10日

进入病房如昨。

父亲今天情况不好。李医生值班查房，说汪东兴最后一天到晚讲阶级斗争，那可能是他一辈子印象最深的事儿。用下巴点了点老头子：“这个老头子不错，

说的是普通人的话。”又叹息说：“脑子可千万别坏了，那就太可惜了。”

父亲只醒过来一次，认出我，像小孩儿一样笑了。

2018年11月11日

进入病房如昨。

父亲一直在睡。又输血。

2018年11月12日

进入病房如昨。

一直睡着。10:40 吸完痰后醒过来，看着小余，清楚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又转过脸来看着我，我摘下口罩，问：“我是谁？”

父亲说：“伟大的女儿。”

我和小余都哈哈地笑了。

父亲又问：“吃过晚饭？”

我说：“我要走了。”

父亲很清楚地问：“你回哪里？”

我说：“回美国了。”

父亲说：“你吃饭……”然后拼尽全力：“哎……哎……”死死地抓住我的手一直不放，喉头含混地发出：“什么时候还回来？”——这是小余猜出的意思。

我说：“明天还会来的。”老头子点点头，闭上眼睛。

2018年11月13日

进入病房如昨。

老头儿一直昏睡，十一点多才醒来，情绪显得很烦躁。

2018年11月14日

一早，满起来国宏接我和悌忠，张阿姨已经坐在车里。我们一起到了医院。老头子一直在睡。张阿姨将她买好的寿衣、鞋袜、帽子一一拿给我看。我应着，说：“老头子平时最喜欢的衣服就好。”

李医生查房，知道我要走了，说：“老头子这次从凶险的边缘拉回来了，但是上下波动很不稳定，随时都会有变化，是否能熬过这个冬天，我们真是说不好。”

十一点多，老头子醒了，认出悌忠，拼尽全力、清清楚楚地说出：“我要讲话……”，然后拼命地张嘴、使劲地张，合上再张，但是除了喘气，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了。我俯下身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额头：“不说了、不说了。我们都知道……”父亲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我们在隔门处向老头儿摆手告别，老头子伸出双手抖着，小余说：“他让老太太跟你们握手。”我们赶紧走回去，张阿姨跟我们握手，老头子看着点点头，闭上了眼睛。还是小余懂老头子啊。小余跟父亲同是平江人，在父亲家已经做了十几年，有她照顾老头子，我心里踏实。

下午两点退了国宏的房间，五点廿分飞离北京。

结束语


回到美国后，国内的一位朋友在电子邮件中向我发问：“你知道李老这样维持一天的费用吗？”

我回复她：“我不觉得我爸每天花多少钱是个问题，问题在于这种花费是建立在级别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个人意愿之上的。”

父亲当年加入共产党，是以为这个党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躺在病床上已经什么也做不了的他，只能哀叹：“怎么办啊？这个党！”

但是去年在医院与父亲相处的最后那些日子里，他带给我最多的是他的笑——变得犹如孩童般快乐和纯真的笑。

父亲在回忆三峡论证过程的文章中说：“几十年来尤其直到上马之势已定后，我要说的话都已经反复说过，说够了，区区寸心，天人共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或者聊以自慰：‘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苍天有眼，在李锐一百零一岁的这天，给了他最后一搏的机会——美国之音的记者走进了他的病房，那一天张玉珍政委恰恰不在身旁，让他留下了绝唱：“毛病不改，积恶成习……” 

作者说明：此文增加了《纽约时报》发表时删去的部分，系《李锐绝唱》的完整版。

【访谈】

李锐的告别仪式

李南央

01

问：李锐的告别仪式在北京有很多新闻，我们先请李南央女士介绍一下情况。

李：大概是从昨天晚上的8点多钟以后，开始陆陆续续不断接到手机短信、email、还有电话，告诉我情况。总的情况是：按正常的情况，因为八宝山一共有五个厅，哪个厅是谁的道别仪式应该有很大的标志，但是这个被取消了，没有，这是不太按规矩走的。还有一个，就是里头没有哀乐。这也是很不正常的。每个人自己带的花朵或者是鲜花不允许带进去，这也是个特殊的规定。再有，进去不准拍照。通常的情况下，照片两边会有挽联的，也没有。还有就是会有生平介绍，放在那里，让大家去看去拿，也没有。还有在大家进去之前应该有一个正式的念悼词的仪式，这些也都没有。我知道正部级干部通常都会由原单位用大轿车把他生前所在单位的人在上班时间拉去撑场面，否则就怕人数不够，场面撑不起来，但是我爸爸的告别都是老百姓自发地去的。说是看得挺严的，八个人排成两排，一次就放八个人，里头的工作人员比进去的人要多得多。说是习近平和李克强送了花圈，但是出来的朋友都说没看见。到底送了还是没送？最后是由记者们多方探寻啊，问啊，不同的信息，最后确认，确实习近平、李克强是有花圈的。习近平这次表现的是特出的谦虚。他上台以来，只要在公共场合出现，他一定是老大，站在前头，所有的人跟在后头，而且一定要拉开距离。这次xxx总书记的花圈居然没有放在显赫的位置，而且现场的工作人员也表现得非常的胆大包天，他的花圈居然有一排人挡在后头不让人看见。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后面我就不说了，我只把现象告诉大家，大家自己去品。

还有一个事情，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想说一说。在追悼会之前，高瑜发了一个推，说李锐的遗孀张玉珍女士要抗议明天的追悼会，拒绝出席。我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就很激动，觉得是不是张玉珍跟女儿李南央站在一条线上了，要跟党组织较劲，不许盖党旗，就通过很多渠道去打听，最后居然得到了一个视频，就是

张玉珍在跟中组部的来人发生争执的一段视频。争执的是什么呢？是张玉珍说：你们答应我按正部级的待遇举行这次追悼会，结果你们决定出席的最高领导人是你们中组部办公厅的和老干局的，这个我不干，你们要是这么安排我就不去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昨天发生的这样一些事情。但是去的人还是非常非常多，我得到了好多好多照片，那都是民间去的，不是公家的大轿车拉去的。其中还有工人，这些人应该是生前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的。

02

问：第一个问题，你在对外发表的文字中有一段话：我希望随着他的离去，跟随旗手、拥戴领军人物的神话在中国也永远走进历史，你这一段话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第二，李锐先生的告别仪式上有“三不”之说，这个“三不”，您的说法和张玉珍的说法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方面，是不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李：我看到章立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的一个解读。记者问他怎么理解，他说主要是谈的个人崇拜。我觉得也对，但不太完全。旗手是什么意思？那些关心李锐的人，发给我的信中都有一个同样的意思，就是李锐这面旗不能倒啊，李老不能走啊，我们需要李老这个旗手啊，所以我才特别提到这个问题。我相信拥戴李锐的人跟那些拍xxx马屁的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真心的。但是这个文化是非常有害的，是有毒的。为什么？旗手你就要拥戴他，你就不能批评他，你如果批评了他，就是抹黑，就是诬蔑，甚至可以说是大逆不道。你看在美国有旗手吗？没有。只有选民的奴仆这个意识。不管是川普，不管是奥巴马，不管是哪一届，甚至是伟大的华盛顿，他都是奴仆，他不是谁谁谁的旗手。而且这种对旗手的拥戴对旗手本身也是非常危险的。你就拿我父亲做例子，人是很容易被人家捧昏的。后来居然有人把他比作曼德拉，而且把拥戴他成为曼德拉的诗写出来，我爸爸就挂在家里的墙上。余习广编了一本《李锐上书集》，在书中，居然就把李锐称作三代帝师。我就跟我爸讲：这个吹捧太过分了，太不切实际了，你怎么就能接受呢？老头子说：哎，中国文化是有这种说法的。意思就是说江泽民、胡锦涛、xxx，他都谈过话。他说，老师谈过话后来成为皇帝的，老师可以称作帝师。因此这个文化是非常有害的文化，对于旗手本人他就会忘乎所以，他就慢慢地只能听好话，不能听批评的话，而拥戴旗手的人就不允许任何人对这个旗手提不同的意见。你比如说我在《父母昨日书》出来以后接受自由亚洲之声张敏的采访的时候，说过

一句话，我说我爸爸不容易，他已经跳出了共产党的这个圈子，可以像外人一样批评这个党。但我希望他能把白手套甩到自己脸上，来审视自己跟着这个党犯了什么错误。有人就把这个话打印出来送给我爸爸，说：她这样说影响很坏，她这是为美国的敌对势力所利用，对你的影响非常的坏。那次我回国的时候，刚一进家门，我爸就把这张纸递给我说：你看看，你看看，你在外面胡说八道些什么？我当时诧异极了，说：爸，我可不跟你周围的那些人一样，胡吹乱捧你，我不干这事儿。你对的地儿你好的地儿，我说：我觉得你不对的地儿，你有缺陷的地儿，我当然可以说，我要实事求是啊！我觉得我爸爸还比较好，绝对不像x总书记。我爸当时一下子就下了台阶儿，说你那话我也没有好好看，我也没有认真地听过。这就特别地说明我为什么希望不要再拥戴旗手，这种文化太……太有毒了。

再说领军人物，什么叫领军人物？你跟着人家屁股后头跑，你自己没脑子啊？领军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你跟这个领军人的思想产生了不同，你就要自我纠正。你跟着领军人，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跟他不平等，你把他看得比你高，你比他低，你得跟着屁股后头跑，这本身就不对。第二，领军人你跟着他走，你就不质疑他。现在在民间还能形成影响的，大概就是李锐，李锐走了以后，崇尚领军人，要跟着旗手走的人，也许就会再推出一个李锐。比方这次他们讨论《炎黄春秋》的事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我提到说《炎黄春秋》这些民主派的老人，自己本身也并不是十分理解民主，因为民主是规则，每个人都在规则的制约下去做事情。就遭来一片骂声，在民主派里一片骂声。这恰恰说明了旗手和领军人物这个文化的害处。

你想啊，没有各种各样的意见的自由表达和你的宽容去听取别人的意见，这个民主怎么前进？这个国家怎么前进？我想这就是我说的这个意思，就像当年毛泽东走了以后，我爸爸一再地说，很多人都认为不会再有毛泽东了，结果你看现在出了个xxx。李锐走了，大家可能也会觉得不会再有李锐了，对不起，这个文化存在，大家还会推出另一个李锐，太有害了！这是一种有毒的文化。我想这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03

问：你和张玉珍之间关于“三不”的争论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我首先要声明，张玉珍说我爸爸生前没有这个遗嘱，这是实话。确实是，我爸爸是没有遗嘱。但是你要注意啊，外界报导的时候用的词，说李南央说的是遗愿，就是遗留下来的愿望，张玉珍说的是遗嘱。你看我的声明，我的声明书上说的是意愿，意思的“意”，愿望的“愿”。这是三个不同意思的词，遗愿和意愿还比较接近，遗嘱是另外一回事。在我自己发出的有声音的讣告中是这样讲的，李锐最后不断重复的是：人生在世都要受四种限制，时代、知识、思想能力，他自己加了一个道德品德，马恩列斯毛都不例外，我说李锐也不例外，李锐也不是神。我还要加一条，就是每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的特殊的限制——被共产党所钳制。而共产党钳制人的手段之恶劣，你比如，北京大学那个小姑娘要求公布性骚扰的历史资料，就被党组织把她妈妈请到学校，跪在女儿面前闹。就是这种钳制，不是仅仅限于冯亦代这样，到家里，访客变成坐探，而这种钳制是深入到你的家庭、用你的亲人去钳制你。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有事实证明张玉珍是共产党委托在李锐身边监视李锐的人。就是2005年之前，我父亲有一首诗叫《赠老伴张玉珍》：“二十六年如一春，医生护士兼保安”。后来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2016年德国之音的记者，还有日本的一个什么报社记者，和香港报社的记者共同在一个饭店，在饭局上采访我爸爸，席间我爸爸说，胡锦涛他们这代也是戴着红领巾长大的，这个采访现在网上也还可以看到。中组部就派办公厅的人找我爸爸谈话，说你这样说不合适。当时老头子非常气愤，跟来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个时候我的继母进来了，说：“好，好，好，我向你们保证，今后家里的电话我看住，我给你们看住李锐。”就达成了一个和解：李锐从此不接受境外记者的采访，但是留了一个口子，国内的采访还可以接受。自那以后，这首《赠老伴张玉珍》的诗，我爸爸就改成“医生护士兼政委，喜欢乱弹最担心。”这是明证。后来在李源潮当组织部部长的时候，副部长是沈跃跃，我爸爸过生日的时候，组织部给我爸爸送贺礼、生日礼物的时候，特意给张玉珍一条很高级的丝巾，表扬她说“你的政委的工作做得很好。”这个不是秘密，张玉珍作为一个荣耀，跟很多人很多人都讲过。姚监复先生就跟我讲过，张玉珍亲口夸耀自己：你看我答应组织的，把李锐看住。姚监复先生说：这不是自取其辱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去想一想，我爸爸的真实意愿怎么会有遗嘱？张玉珍这个坎儿他就过不去，不可能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没有遗嘱。四十年的夫妻心是不通的。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把共产党看透了的人——李锐。我爸爸跟我谈的遗愿，是多少年，在谈话

中慢慢慢慢地，一直在谈。他的日记里也有记述。但是遗愿总要有白纸黑字，我就凭整理我父亲日记的时候的记忆，因为时间也比较紧，只找出了两段，我觉得特别能说明问题：“今生只缺一挥手，告别无需八宝山”。这不就说得清清楚楚了吗？谈到党旗的时候，这是他跟外人谈，其中一个还是从美国去的教授。他说党旗上是镰刀斧头，什么意思啊，没有知识、没有知识分子，而李锐自诩为知识分子，党旗上没有他的地位。还有，我爸爸跟我说过不知多少次，他说，他是“一二·九”以后参加革命的，他对共产党早期的历史并不知道。他真正了解是他从中组部退下来以后，做了十几年中共组织史资料，《中央卷》11卷本是他直接负责的。他们还有提纲啊、要求啊、总则啦，下到各省各县，他才知道AB团的时候，杀掉了10万自己人，有的县只杀剩下一、两个共产党员。然后就是“6·4”的时候，他住在木樨地20号楼上，站了一通宵，亲眼看见共产党的坦克和机关枪。他和一帮年轻人站在我们家六层阳台，前面还有车库，所以机关枪的仰角扫射不到他们，他们就站起来喊：“法西斯！”“法西斯！”。然后一梭子机关枪就射过来，他们就趴下去，然后机关枪一过去，他们又站起来喊“法西斯！”“法西斯！”。第二天，他一大早就去复兴医院，看到堆着的死尸和地上的血浆。他对这个党是绝望了。2008年我爸爸住院的时候，我陪他，当时我爸爸还相对年轻，思维很敏捷，又是我们俩单独谈，他没有任何的顾忌，我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他后事：你进不进八宝山？你开不开追悼会？你盖不盖党旗呀？他回答的非常明确。他说，黎澍说（黎澍是他的好朋友，去世了），八宝山躺着的人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他们。黎澍就没进八宝山，进的是老百姓的公墓。我爸爸说我跟他一样，不进八宝山，他们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那你开不开追悼会？他说，追悼会悼词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不是很滑稽的事情吗？不开追悼会自然就没有党旗这一说了。当时也没有iPhone，没有手机这一说，当时我也没想到把它录下来。这次2018年的4月病危住院以后，我是存了个心眼。我问：“很多朋友关心你的后事……”当时因为我的继母住在医院陪他了，而且那时候他的思维已经不是非常清晰了，有时清醒有时不清醒，我还是问了他，他想了很长很长时间。《纽约时报》会有我一篇文章，叫做《李锐绝唱》，我会根据他的录音把他当时的话说出来，他没有直接说我不进八宝山，没有当年那些话，但是他说他要回平江老家安葬，这个平江老家安葬，我觉得是能够实现的。因为昨天在追悼会的外面，有朋友帮助张玉珍发了她的感谢信，网上已经传得很厉害了，有的

报纸都已经节录出来了。她说，我生前跟李锐说过，你回平江老家，我跟你一块儿。李锐说：我回平江你跟我一块儿，咱们俩葬在一块。这很简单，这符合组织的意愿，中组部、共产党肯定是不愿意把李锐留在八宝山。这是一个多大的祸害呀，就像赵紫阳，现在还搁在家里。他们就怕在北京的什么地儿，老百姓可以随便去看。所以，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我觉得唯一有争议的就是那面党旗，那个旗子上沾的不仅仅是烈士的鲜血，被国民党杀掉的人远远不如共产党自己杀掉人多。我真的不能容忍这面党旗盖在我的父亲身上，他在天有灵他不能……

04

问：我记得李南央说过，她的父亲是一个看透了共产党的人，那么这个看透了共产党的人和周孝正先生定位李锐是党内民主派是不是有矛盾？在李锐走的那个通知里面，南央说：她不赞成把李锐作为共产党的一个正部级干部进行追悼。我想请李南央解读一下，李锐和共产党是什么关系？他是在共产党体制内反对共产党或者是改良共产党，还是他已经跳出了共产党？

李：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做节目我提到了黎澍说“我们被卖进窑子了”，你记得这话吧？这两天我爸爸的另一个好朋友，李普的女儿也跟我证实说，她听到她爸爸跟我爸爸聊天的时候说过“我们被卖进窑子了”。你要让我说他跟共产党什么关系？别拔那么高，就是被卖进窑子里出不来了，这就是他跟共产党的关系，他心想出来出不来。今天我跟美国之音做节目，章立凡说：“你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你死后也受党控制，这就是我说的我爸爸摆脱不了共产党的钳制。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所以盖党旗是顺理成章，但是我觉得那里透着那么的凄凉和悲哀。黎澍、李普、李锐，就像刚才周（锡瑞）先生说的，这些纯真的、年轻时代跟随共产党的这些人，那么的真诚，晚年……就不要说晚年了，从建国以后就慢慢慢慢觉得共产党不对，到晚年时是彻底跟这个党已经决裂了。李普走的时候是按组织的安排走的，我爸爸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他肯定是要按组织安排走的。但我就是要用我的行动告诉大家，李锐的真实的意愿是什么？李锐最后还是盖着那面党旗走的，不是顺理成章的事，而是李锐的真正的人生悲哀。不光是他的悲哀，是这些认清了共产党的人的悲哀——黎澍伯伯的悲哀、李普伯伯的悲哀。我知道好像是胡继伟先生走的时候没有让党操办，是自己走的，是家里办的。其实我最初的心愿是希望能让我们家人有一个很简单的仪式，真正热爱李锐

的人，在医院里，在洁白的被单覆盖下——但是做不到。没有什么是谁的人不是谁的人的问题，这就是卖进了窑子出不来的李锐，是他人生最大的悲哀。我还想说参加追悼会的人里多一半是老年人，中年人很少，青年人几乎没有。我是比较同意刚才老周的说法，他觉得李锐没了，这个共产党就不再有有良知的人了，他非常悲观。我也是悲观的。比方说我的那个声明上网了以后，被删得很厉害，支持我的人也都被删了。（我得说一下，我特别特别地感谢阎淮，阎淮说跟我共进退，但是他说亲耳听到李锐的这个“三个不”，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撑和证明）。而骂我的话都被留下了。这些人谴责我，用很脏的话来骂我，用美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百善孝为先，说李南央不孝。我在美国之音节目中说了，我这里还想再说一次，这些人柿子找软的捏，如果他们认为百善孝为先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他们最应该谴责的是 xxx，因为 xxx 是一个大逆不道的儿子，他不做习仲勋的儿子，他当毛泽东的孙子。我为什么悲哀，就是说真的认同我们这些话，认同我这样的理念的人本来就少，还被删了，删得一干二净。中国的宪政迟迟不能开张，这就是郑也夫教授说的，这个政权骄横到这个程度，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惯的，我们不跟他说不。所以，李锐和共产党的关系没有那么拔高的，李锐说了，李普说了，黎澍说了，就是“卖进窑子出不来”了。

05

李：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而这种钳制是深入到家庭里的。我觉得有一个人是非常的了不起，我必须要说，就是赵紫阳。赵紫阳的骨灰今天还在家里放着，他们的儿女说，他们为有这个父亲感到自豪。赵紫阳，应该说，有这样的子女，他很幸运，他的骨灰可以搁在家里，党的总书记的安葬仪式，不能按照自己的遗愿去做，孩子们就说，我们不做！我们不进你这个窑子，我们不按你这个窑子给我们的规矩做。我非常敬佩。

06

问：我还有一个问题，你说卖进窑子出不来了，章立凡说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那是指你的组织关系，但是你的灵魂可以在共产党之外，你可以背叛他的意识形态，你可以背叛他的思想学说。你可以完完全全地把共产党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完全抛弃，在这个意义上，你认为李锐有没有脱离共产党？

李：我还是用他自己的话说吧，他说，共产党是培养奴才大黑帮。2006年他就说了，“共产党自高自大，自吹自擂，无法无天，无知无耻”。后来我把他这首诗收在我给他祝寿的《期颐诗集》里。我和我先生做了上百本的小册子把他没有收到《龙胆紫》里的诗收进去给他祝寿，我就收了他日记中写的这首诗。他说：“你这个家伙，你把我这首诗也给放进去了。你也胆子太大了！”但是后来我在他的日记里看到——这本书一开始印了100本，第二年一百岁满岁的时候，他又让我给他印，我给他印了——他的日记里说，每送一个人，他就要翻到这一页：“你们看这首诗”。每送一个人，首先翻到的就是这一页。你说他跟共产党是一条心吗？他不是共产党，为什么他卖进窑子出不来了？他后面有一堆人呢。刚才周孝正说了，有照顾他40年的妻子，还有养儿、养女，如果说一方面是他们不理解，他们跟我父亲心灵是不沟通的，我父亲非常明白；另一方面即便他真正能够做到了，那这些人的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车、房子。他即使可以不顾及自己，他也要照顾40年的老伴儿啊。这个老伴儿，在这儿先不多说，但是将来我要写。我写过“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我已经被别人骂的狗血淋头了，我的继母我也应该写，这样就比较全。为什么？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身在这样一个共产党的家庭里，特别是我的9岁到29岁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可以说是饱受摧残的。这个家庭，我的母亲是一个纯洁的知识少女，在共产党这个大染缸里给染成了一个那么可怕的马列主义老太太，我的继母是让我真正地认清了共产党，因为她是共产党的草根，她是毛泽东创立的共产党的最基本力量——农民，她是那个染缸里的一颗染料。我父亲健康的时候跟我有谈话，我录了音，一个多小时，其中大概有10分钟谈了他对我继母的认识。用周孝正教授刚才的话说，就是宽容，就是感念她照顾我父亲40年，我不愿意把我爸爸的话——如果他们不逼得太狠，在我父亲的档案资料上做手脚的话——我是不会拿出来的，但是我父亲谈了对她的看法，我觉得这是特别大的悲哀。我为什么要写她？真的，我的妈妈和我的继母，真的让我认清了共产党的卑鄙，太坏了！这个共产党。就是我爸爸说的，没有人性，毫无人性。

07

李：我觉得李锐能够存在，他一辈子没有为自己的利益做什么坏事，或者说做过什么妥协。例如上次我讲过，李普说：你说话稍微委婉一点，你就会像宋平

一样进入政治局常委，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我爸拍桌子，我爸就不同意，说：那我是不是李锐？我认为李锐在重大的原则的问题上，从来没有为了个人的利益去妥协，去牺牲。他可以委屈自己，比如他明明是知道，他不愿意开追悼会，他不要进八宝山，不要盖那面党旗，但是他为了维护照顾了他40年的妻子的利益和她的孩子，他可以委屈，但这是委屈他自己，并不是在大的事情上。他也已经不在位了，不会对整个国家的事情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他就委屈了。但是真正有关大的方针政策，对国家有大的影响的事情上，他没有妥协过。比如说庐山会议，比如说“六四”，比如说最后他到了中组部，他等于把习近平上边的那一代红二代生生地给挡下来了。这我觉得他都没有妥协过。

08

李：至于你说李锐是个现象，我觉得他没有形成现象。现象是什么？贪官遍地，这是个现象；县以上的共产党的干部都犬儒化，这是现象。我觉得李锐是一种存在，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独特的存在。你看杜润生啊，李昌啊，于光远啊，这些人跟李锐是一样的，为什么没有像李锐这样非常的突出，我倒愿意单单谈谈李锐这个个案的存在是为什么？是外在的客观因素和内在的主观因素。比如说，建国初期李锐为什么能够存在？因为他的才华，他的才华脱颖而出，但是庐山以后他就不能存在了，文革之后他又重新存在了，他又出来了，为什么？还是他的能力。那时候需要他，那时候国家百废待兴，需要李锐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你知道他收拾电力部的烂摊子有多么多么的不容易！因为文革中水电系统完全被打烂掉了，被钱正英完全打烂掉了。当年成立的勘测设计院等等全都不存在了，他收罗旧部，找人回来，这是他在水电部两年多干的唯一的事情。他刚刚平反回到部里，一进大门一个大影壁，是毛泽东的题词，葛洲坝现在先上了干，不对了就重新论证，重新反悔……反正就是三边政策，边施工，边设计，边修改什么什么的，我爸上来就说：这是什么东西？这简直就是违反科学常识和整个儿的生产程序，给我摘掉！当时的人都呆掉了。那个时候文革刚结束，对毛泽东的崇拜还在那儿，那个7000人大会没开呀，还没有开始批评毛泽东。这个李锐刚出来，就这么说！都觉得李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主观的因素，他总是特立独行、说他自己的话，说那个时候谁都不敢说的话，他想说，他觉得这样对，他就说出来，所以他能够存在。那么客观上，我刚才已经说了。庐山以后他不能存在，文

革以后需要他存在，但是“六四”以后他又不能存在了，对吧，差点把他开除党籍。可是他为什么又能存在下去，这里有客观因素。为什么？那时候党里两个婆婆，邓小平、陈云两个婆婆，不是邓小平一人可以独大的。陈云说：不要开除党籍，我们党这样的错误很多了，现在开除以后还要平反。所以他又出来了，回来了。那么后来紧接着就是江泽民时代。江泽民时代是什么时代？江朱时代，江泽民和朱镕基两个人的时代。江泽民是我爸——没有我爸江泽民到不了那个位置——是因为周建南推荐给我爸，我爸推荐给……当时上海需要人，就推荐给胡耀邦，他到了上海。而江泽民他们的红根不那么正，朱镕基就更不是红二代。江泽民对我爸有所畏惧，有所敬畏。我相信朱镕基的内心对我爸是爱戴的。据说，今天也有他的花圈，我不知道是朱镕基真心送的，还是人家按规格替他写的，但是当时我爸反三峡的最后的上书，是朱镕基亲自打电话到家里，对我爸说：不要说了，顾全大局，这个事情已经定了。说明他对李锐是尊重的。那个时候是江朱时代，李锐的声音还可以发出来，可以存在。接下来就是胡锦涛时代，胡锦涛时代是什么？是胡温时代，是两个人的时代。温家宝是谁？温家宝是我爸爸的好朋友孙大光一手提拔上来的，温家宝曾经陪赵紫阳到过天安门，我觉得温家宝脊梁骨很软，但是温家宝的内心，我觉得他对李锐是尊重和爱戴的。例子就是周有光最后生病住院，只能住在普通病房里，我爸爸就给温家宝写了一封信，说像这样的老知识分子，这样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知识分子，医疗待遇应该改善一些，后来温家宝还亲自到周有光家里去看了，他的医疗待遇也就改了。丁东为了这件事还写了一篇文章的。而胡锦涛，他不是红二代，他和温家宝两人替共产党看这个摊。胡锦涛是我爸爸老水电系统下来的，记得那次他去我们家，那时候还没做第一把手，我也在，我爸就问：你今年多大……，胡锦涛说你应该知道啊，你应该记得我是多大岁数，意思是你找我谈过话。因为他不是正根儿的，我觉得他对我爸爸还是有一份敬畏的，所以我爸爸还能够存在。最后就是到了xxx的时代了，xxx时代是什么？x一个人的时代。不是习李时代了，李克强就是陪衬。xxx是什么？是少东家。少东家是什么？跟自己的父辈说：你甬跟我哩个咯，现在是我的天下！按理说李锐就不能存在了，为什么他又存在了？因为我爸爸将近百年的高龄，下不了手了，李锐进入了最安全的死角，下不了手了。他胆敢把他爸爸的好朋友抓起来，就因为李锐说话？他已经不让他说话了，只能在境外说，《李锐口述往事》这本书我打了五年的官司。最开始法院受理，是因为xxx当时说：让每个老

百姓享受到法治社会的保护和幸福。我觉得法院摸不到他的底牌，所以受理了，后来真正摸准了底牌，那是党在法上，哪有什么法制？是党法，所以就根本不开庭了。他只能做到我把你李锐的话封死了，但是他不敢把李锐再抓起来，李锐相对是比较安全的，进入了一个死角。就是没有说话的自由，但是还有人身自由。得给他应该有的待遇，医疗待遇啊，车子啊，房子啊，他不会都给你没收了。他敢那么做，他自己是不是也就离死差不多了。

09


李：接着刚才周锡瑞教授说的那个话，为什么将来会越来越难？哦，对了，我还要最后说一下，为什么李锐能够存在。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国，我爸爸年轻时候的第一个恋人万国瑞，就是后来的杨纯，当过周恩来的秘书，当过卫生部的副部长。她在家里跟我爸爸聊天，我也在，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杨纯，见到我父亲的第一个恋人。杨纯阿姨就说：“李锐，你好好活着吧，你还说什么呀，没用了，你就好好活着吧，吃点好的，穿点好的，长寿就好。”很多老干部都是这样的，最后就是安度晚年，等着看戏。我爸他不愿意坐那儿等着看戏，他非得指手划脚，说你这戏演得不对，不是我们当时设想的那个剧本，你演得不对。

我问过他，你的思想的彻底转变是不是秦城关了八年，在那儿没事儿干就想啊，想啊，就觉得共产党越想越不对。他说，不是。他说他是平反后一九七九年到了美国，一看，傻了。美国物质极大丰富，老百姓脸上的表情那么的自由，那么的单纯，那么的快乐——这儿是社会主义呀！因为他去过苏联，那时候苏联的物质匮乏大概比中国都要厉害，他就觉得社会主义大概也就是这样，大家艰苦奋斗，慢慢慢慢地就会好的。结果一看到美国，傻了。人家只有200年的历史，走成这个样子。他跟我说：大彻大悟。全错了，我们那些全错了！所以他不是通过什么思想的探究，改变了，反思了，他是眼见为实啊。

当年他为什么跟着共产党跑？因为他是生活在国统区，在国民党统治下，他感觉国民党不抗日，不自由，钳制学生们的民主思想。当然，相对来说，现在……国民党那时已经自由多了，但是你不能把李锐拔到现在，他就是活在当时的历史里头，那是他生活的时代，他觉得不自由。可是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是斯诺的书里的红星照耀的地方，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说，他看了五体投地，他

没有摸着共产党，他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样，那是文学的、文字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爸爸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非常真诚的人，这是他为什么会成为李锐现象，就是他存在那儿，客观环境也给了他条件存在。但是也有很多老干部，甚至级别比他高的老干部，可以比他存在的更好，可是他们选择看戏，不说话，只看戏。我爸爸他不看戏，非要告诉这个剧本没演对，我觉得这是李锐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内在原因。

老周说，特别希望将来还有李锐这样的人。我得说，客观地说，比李锐要难得多得多，如果说这些人还想出来说话，太难了！因为李锐的生存不是靠搞暴力，而是从理性的程序，从法律的程序，学习西方先进的经验，咱们一步一步地走。这一天，我们看不着了，我们是肯定看不着了。

我爸爸留下的这些遗产，它的珍贵之处就是能让人看到共产党里面真实的内幕，真的一部活着的党史，看看共产党错在哪儿了。我们将来愿意搞民主的人，别走共产党的老路，不能走那条老路。所以现在很多人要闹革命，那是共产党走过的路啊，不能再走了，要走美国的……。存在的客观条件了。你看这么多律师被抓，他们的做法其实很多比我爸爸要勇敢得多得多，多难呢！所以我觉得那些律师的家属们、那些妻子们真是挺了不起，所以我认为希望在民间，在民间的勇敢的人，不在共产党里，我同意老周的话，共产党里没有了。咱们现在说，县以上的人，我爸爸在的时候，三一，三一，三一，把人分成三分之一的等级，应该说上面的那三分之一的人在党里头，党里头的人还算是精英分子；到了江泽民胡锦涛，那就是中国人中间的那三分之一在里头呆着了；到了xxx这一代，县以上的都是最差的三分之一，县以上的干部都是这样，都是奴才，不当奴才就当不了官，根本没有什么理念，哪有李锐他们这样的追求？所以我觉得希望在民间。但是我也同意周孝正教授的说法，就是咱们从研究美国的宪法开始，研究美国人家是怎样做的开始，千万不要再搞暴力革命，那是共产党走过的老路，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要不得的。 

【访谈】

李锐的日记是一部共产党党史

法广/李南央

中共元老李锐先生 2019 年 2 月 16 日在北京去世。李锐先生在世时，曾多次担任要职，晚年则因对政治体制直言不讳的批判，而被看作是中共党内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但李锐最有意义的贡献可能更在于他对中共党史的记录。80 年代中期，李锐离开政治前台后，曾主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并陆续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掌握的史料整理成册出版。其中的《庐山会议实录》尤其被看作是了解这段历史真相的必读之作。他的日记、书信等手稿近年来也在其长女李南央的努力下得以出版。李南央女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这些个人手稿从国内转移到国外的曲折过程，以及这些个人记录的历史价值。

法广：李锐先生的日记和其它手稿已经都转到国外。这些资料不可能一天、一次旅行就转走。您和您父亲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将这些手稿转到国外呢？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李南央：“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最开始的时候是……我 9 岁到 29 岁，我父亲倒霉了 20 年，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我和他是划清界线的。后来是我自己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让我认识到了毛泽东的一些问题，我就想让父亲给我讲讲，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找到大别山我父亲被流放的地方。我父亲给我讲了庐山会议的一些事。对我当时这个小工人来说，那真是大开眼界。根本不知道事情会是这样。我父亲平反复出（1979 年）以后，很快就结婚了。继母很容不得我们，我们就走了。我觉得我和我父亲之间是有隔膜的。这种隔膜我不怪他，因为毕竟 20 年之间父女没有生活在一起。而且我曾经要求入团，我也表现得很革命，要做“共产党的好孩子”嘛，所以，我觉得他对我是有一定的疑虑的。我很理解这种疑虑。他不是非常相信我。”

“我觉得是我的那篇文章：《我有这样一个母亲》（1997 年）发表以后，他觉得他和我在心灵上沟通了。而且他看到我一丝一毫没有依靠他，完全靠自己。我只有一个初中生文凭。“六四”以后，我经过德国、瑞士，最后在美国定居。

他对我说……他是这么说的：你这个人那，我最佩服你两点（我当时都挺惊奇的：我爸佩服我？），我最佩服的一个是你自学英语，一个是你自学机械，变成机械工程师。他说：这两件事我都做过，都没做到……。我觉得我爸与我开始有一种心灵的沟通和信任。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爸爸和我妈妈当年通信的原件，从1936年他们恋爱开始，到延安，一直到他们离婚之前的通信，都给我了。而且他有一封委托信：交给我长女全权处理。我们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整理出来，差不多80万多字，上下两册。那个时候在国内找不到出版社，我们就自费在国内印刷。记得当时印了一千套，花了6万多块钱。我和我先生不是做生意的，他在大学计算机专业，我是机械工程师。那时候我女儿还在上学。而且我们来（国外）得很晚。我先生43岁了才开始工作，我是40岁开始工作。所以我们在经济上并不富裕。可是我们觉得这些（信件）很珍贵，就决定印出来。”

“当时帮忙的朋友说，这会是一个很缓慢的散发过程，大概要几年。但其实就两、三个月，就被抢空了！高华（法广注：已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有个学生来告诉我，说高华老师说，要研究共产党的党史，这是一本必读书……这样也就给了我很大信心，也让我爸爸看到了我的能力：我们完全是自己打印出来，自己想办法印刷出来。他就对我有一种信任了。”

“我就对他说：这以后，我来整理你的日记，怎么样？他说，那好。那时候他不肯给我原件，他说是张阿姨（法广注：张玉珍，李锐遗孀）不让，理由是我不是共产党员。他的秘书也反对，因为我爸爸是中组部的干部，这是共产党的最高的机密系统，而我是一个党外人士。所以这些资料，我是不能触碰的，是不应该属于我的。这时候正好有一个契机。当时是2004年，他找了很多很多人帮他整理这些日记。当时，他是想做一些删节，想把一些对他不利的内容删去。我说，那我不想参与，因为我认为日记就是要原汁原味，根本不能删，删了就没意思了。但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一会给这个人，一会给那个人，散得很乱，我就担心原件会被丢失。我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在国家图书馆工作。我就提议把这些日记交给国家图书馆存起来，然后请国家图书馆帮我们扫描。所有整理日记的人，都用扫描件看。我爸爸当时就同意了。图书馆来人把1947到2003年的27本日记拿走了。然后，他们给我爸一套扫描后的装订本，给了我一套光盘。我就利用这套光盘，开始整理他的日记。整理了三册，是从1947年到1980年他平反复出

这段时期的日记。当时也是国内没有地方出版，我就在美国溪流出版社出了。我爸爸就对我有了更进一步的信任。”

“在这之前。我还出版了一本《云天孤雁待春还：李锐 1975-1979 家信集》。这是我父亲 1975 年到 1979 年平反复出之前这段时间的家信，可以了解他是怎么平反复出的。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出来了，但是是怎样的一个程序，没有人知道。我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史料。我就把这些信整理出来，25 万字左右。原来与广西师大出版社都定好合同了，结果没有通过中宣部的政审，就没能在国内出版，耽误了一年。我就又带到美国出版。我爸爸就更信任我了。而且两本书信集的原件，我父亲都给我了。”

“日记也是在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的。”

“做完这些以后，我就觉得我和我父亲越来越有一种心灵上的沟通，他对我有一种绝对的信任，我们之间 20 年的隔膜，我觉得已经完全融化掉了。”

法广：这些日记与手稿的整理与出版经历了不少曲折，也掺杂着家庭的一些猜忌与矛盾。这是这对父女抹消 20 年的隔膜，重建亲情、重建信任的过程，也折射着在一个政治无孔不入的环境下，一个家庭的聚散离合，恩恩怨怨。

“中国没有市场经济，就是人治”

法广：2013 年，一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中国人看到《李锐口述往事》，知道李锐将日记交长女整理，便设法联系到李南央，又介绍给胡佛研究院。胡佛研究院立即表示愿意收藏这些日记和手稿，并计划在 2019 年 4 月份展示这些手稿。这些个人手稿为什么重要？它们的价值何在呢？

李南央：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我觉得我父亲特别了不起的一个地方是这些日记把他真正还原成一个人，还原出他身上的党文化，特别深刻的党文化。所以它是一部共产党的党史。

我们先从最近的历史来说。我们总在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什么的。看了李锐的日记就会知道：没有市场经济。就是人治。谁有权，谁就能拿到钱。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父亲在中组部时候的司机。那时候大家都“下海”，司机觉得钱太少了，就一定要下海。只好让他走了。他去海南岛，好像是北大的

一个博士生在那里开的公司。当时他们好像是一起在做芒果饮料方面的生意。他们后来一起来到北京，因为曾经是我爸的司机的关系，他们就找到家里，写了一份材料，说是公司想上市。我爸就大笔一挥，写了材料，交给朱镕基。猜猜结果怎么着？上市了！这叫市场经济么？我当时看到这个，目瞪口呆。我说：爸，你这是什么呀！……这家公司就这么上市了！就这么简单。但实际上中国当时是有评估公司的，公司在上市前，必须经过评估，进入到一定水平才能……但是，有人，多简单。这是一个例子。

还有一个官司，打了十几年。是一个台湾老板在湖南投资，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就被抓了。老板的女秘书就到北京来，说这是一个冤案。其实老头子他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不知道。我就不知道是怎么样，居然我继母就认这个女秘书做干女儿。但我在湖南的亲戚都说这个女人在湖南非常有名，不是一个好人……我为什么相信这种说法呢？因为我继母连我都不让进家门，她怎么能把一个外人认作干女儿，而且和她睡在一张床上……而且，很快就看到家里就多了一套沙发。按我爸日记里的说法，是这个女人的儿子在北京的家，要搬家，要装修，沙发没地方放……再过些时候，家里又重新买了一套新沙发，这套沙发就进了我继母子们的家……我爸就开始为她批条子，批到一届又一届湖南省的第一把手，挨个都批了。不管用，换一届领导，就批一遍，一直批到高法……老实说，如果周强是贪污犯，要查周强的保险柜的话，那里面不定有多少是我爸给他的批条、让周强办的案子呢！但这个人最后还是就是判了11年……

这不是唯一的例子，还有很多！再举一个例子。（陕西）米脂县是我继母的老家。米脂县说要建一条水渠，需要三千万。就找到北京来，找到我们家。我继母对我爸说：你得帮他办。我爸就批条批给汪恕诚。汪恕诚非常尊重我爸，原来他们都是水利水电系统的。他知道我爸。汪恕诚当时是水利部部长。一批，三千万拿到手了！这笔钱做什么了？真建了水渠么？没人问，不知道。这三千万就凭借人际关系拿到了。我爸很高兴，觉得王恕诚买他的帐，他这么一个下了台的老干部，汪恕诚还看得起……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刚刚开始下海的时候，就是开始有私企的时候，是跑单帮的一批人：长途贩运。那就需要车。当时，车由国家统购统销，私人买不到卡车。我继母的养女的姐姐还在米脂县里当农民，她的儿子想跑单帮，要买辆

卡车。怎么办成的呢？一个条子写给周建南，那时是第一机械工业部长：批了。再拿这个条子去找十堰市沈毓珂市长兼第二汽车厂党委书记沈毓珂，他是和我爸爸在热河一起办报的老朋友，又批了。这辆车就拿到手了。这叫市场经济么？

法广：就是说这些年的经济起飞实际上是官商合作、勾结运作起来的……

李南央：对，权钱交易。这些日记里有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案例……


法广：但是，如果您把这样一些日记公布于世，对于李锐先生个人形象是不是也有影响呢，因为他也参与了这种权钱交易机制的运作？

李南央：当然了！这是我觉得我爸了不起的地方。他说，我这个人，反正是赤裸裸了，只要对历史研究有好处，拿走就拿走吧……他不太在乎他个人的形象，这说明他有历史学家的角度，他懂得历史。所以，他把他所有的日记都给我，他知道这些日记里有很多对他个人不利、对他个人形象非常不好的事情。他曾多少次感叹：我真的是不愿意签这些字，我没有办法，他非常违心，他不愿意签，但他都签了……

日记里有很多的东西，比如土改的时候，他的工作笔记里的记录是，贫下中农不分地主的地，说这是丧天良，不能这样，不能分东家的地……我爸他们这些共产党就说这些农民觉悟低，其实最后起来的都是些流氓、二流子……

还有，高岗亲口告诉他：刘志丹当年离开延安的时候，就是抱着必死的决心走的，他知道自己会死，向高岗说：你留下一个活口儿，证明我的清白……，所以说这些日记是一部活的党史。

还有一点，是我爸爸文笔特别好，就那几笔，栩栩如生，事儿也记了，事儿也活了，特别精炼。他只记事，很少发表感想。

李锐不是异见者，他始终没有脱离他所批判的体制，但几经政治风浪，仍然保持了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的李锐，以他对在体制中的切身体验的冷静记录，给人们一个了解官方言说背后的历史内幕的窗口。

2019. 3. 1. RFI

【访 谈】

宅中对谈录：探底毛泽东

北明/李锐

(2011 年 4 月 24 日)

主持人北明：

……李锐后半生以倡导民主宪政、否定共产党专制体制著称于世。为纪念这位坚持从中国内部坚持倡导自由主义价值的领军人物，中国的良心人物，华盛顿手记这次临时插播一个节目，首次披露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华盛顿手记独家现场采集的李锐在自己宅中与中国民间独立学者王康的谈话录。分上、下两集播出，本集是上部。对谈的主要内容有：

一、李锐陈述中国尚未解决的三个理论问题；

二、李锐借史实谈毛泽东其人、毛泽东研究的未来情况、披露杨开慧对毛泽东的评价，指出毛泽东销毁史料以及中共中央档案馆内部不公开的毛手稿情况；

三、是王康先生强调老一代共产党当事人批判毛泽东的使命的重要性。

这次对谈的时间是 2011 年 4 月 24 日，背景是尚未流亡美国的中国独立学人王康先生在李锐与之长辈有深交的晚辈友人的引荐下前往李锐的北京住宅拜访李锐，于是有了这次对谈和现场的录像……。

李锐：

……经常谈的问题，就是有三大问题，现在我们中国党内党外、老老少少基本上搞不清楚。第一个，人类社会进步依靠什么？整个国家也好，民族也好，社会也好，人类的历史发展，进步到底靠什么东西？第二个，主义是什么东西？理论同主义是什么东西？第三个，共产党是什么东西？这三大问题都搞不清楚。

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抗战，过去采取一种否定的态度，这个是不对的。就是日本投降，他就下山摘桃子……

……拿破仑的传记是 100 多种，毛泽东的传记将来我估计不止一百多种，现在恐怕就有几十种了。我去过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有个大厅，一百多平米，

里面全部是毛泽东的手稿，一万多件。毛泽东这个人很厉害，退出延安的时候，他找到师哲，还有一个人，三个人烧掉一批资料。文革期间他的手稿很少。毛泽东的手迹，我现在还保留着两张。他平常闲空，坐在桌子旁，喜欢拿这个纸写一点唐诗，我有他两首唐诗的稿子。因为田家英了毛泽东很多这样的东西，毛写了以后就丢了，警卫员就把它弄到字纸篓里去毁掉，田家英就全部收起来了。他收了以后，有次给我看，我就挑了两张，李白的一首诗，还有李商隐的一首诗。但是田家英自杀之前，把（他保留的）所有毛泽东的手稿、手迹全部撕掉，在马桶里面冲掉了。他对毛恨死了。


……（毛泽东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这社会进步就得靠知识。我写的18本书里研究毛泽东的有五本。《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四卷，这是一本；《早年毛泽东》（三卷），是一本；《大跃进亲历记》（六卷），一本；《庐山会议实录》（五卷），一本；《毛泽东晚年悲剧》（九卷），一本。我写了五本，我研究毛泽东。在中间我又所谓当过他的什么秘书，就像看油画一样，油画是要到适当的距离看的，远看，中看，近看，近看就一塌糊涂。我对毛泽东呢，曾经远看，抗战初期我读他的书；中看，在延安；（毛）晚年，当他的秘书，所以对这个人就搞得比较清楚。他早年啊，那段话是早年的：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还有一句话，他在笔记上写的：“我只对自己负责”。我在书里写进去了。所以，这个人哪，他的特性，从年轻的时候就培养起来了。他的父亲是个富农，他跟他的父亲也不对。父亲有一次要打他，他就跑。他的父亲原来想要他干什么呢，他的父亲是富农兼商人，帮他卖东西，要他读点书。他就有他自己的想法。

……肖永毅跟我们在一起的，那是一个教授，喜欢写诗，他是杨开慧的亲戚。（主持人北明：这是李锐指着自己对面墙壁挂历上一张他与别人的合影所说的。）他就给我讲过毛泽东、杨开慧的事情，这个事情我是第一次听他讲的。毛泽东不是有个原配吗？没有结婚。这个原配就住在他家里，就变成了他爸爸的小老婆。所以这个人啊，在生活上乱来，很可能继承了一点他的父亲的。

……我还可以讲毛泽东的故事。杨开慧，他的父亲叫杨昌济。杨昌济原来是要把杨开慧嫁给肖子升，就是肖三的哥哥，但是肖子升结婚了。后来在北平，毛泽东慢慢地就跟杨开慧好了，结婚了，生了三个孩子。二八年的时候，杨开慧一

家是在长沙东乡六十里外的板仓。毛泽东两次打长沙经过杨开慧的家，没有理她。为什么呢？他二八年一上井冈山就跟贺子珍……。杨开慧也知道了，因为杨开慧的哥哥当时是地下省委，杨开智，杨开智 28 年到的井冈山，就回来告诉杨开慧。然后这中间出现什么事情呢？我们为什么要谈呢？

大概 80 年代，杨开慧故居修理，拆墙就发现了杨开慧的很多书信、笔记。湖南的党内刊物就搞了一本，印出来了，这个我看到了。张戎不是写了一本书，研究毛泽东吗？那些东西我都给张戎看了。前些年来了一个老同志，女同志，也是为她父亲的事情。她就告诉我，杨开慧的原件有很多人看了，删掉了一些，她告诉我原件里面有八个字删掉了，杨开慧对毛泽东怎么看法呢？八个字：“生活流氓，政治流氓。”这是很准确的，很准确的。所以毛这个人，将来要真正搞清楚，党内那个一万多件没有毁掉，将来允许大家看，现在不让看。延安整风时给任弼时写过七封信，胡乔木当时在延安是看到了的，胡乔木后来再要去看都不让看了。（王康：这是崇拜毛，党内外都有。）西方也有崇拜毛，西方对毛有个评价：这是个有魅力的人。他会写诗，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很好，出口成章。（主持人北明：接下来几秒钟的沉默之后，是王康强调老一代共产党当事人批判毛泽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说：“……邓小平所说的，对毛的评价，留给下一代，这是不负责任的。老一代最了解他，现在年轻的一代完全不管这些……”）

现在的党是保护毛泽东的，他必须保护，不然自己合法性就没有了。 

【怀人】

脊梁骨李锐与《炎黄春秋》

杜导正

2019 年 2 月 18 日，我来到木樨地二十二号楼李锐故居。物是人非，往常我们经常坐的大沙发已经堆满了鲜花，我们也献上了精心挑选的百合花。“当代中国屈原——李锐同志千古”，我写的挽词，贴在李锐照片边。他一生追求真理，是坚定的改革派，是党内的先知先觉者。我是觉醒在晚年，这也是我更尊敬李锐的缘故。他一生大起大落，毛泽东说过“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

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前四项他都经历了。超出常人的经历造就了他一副硬脊梁。

我早年的工作跟李锐没有交集。他在延安，我在晋察冀边区。一九五九年，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锐也因右倾劳改下放到北大荒，所以后来我与李锐最有同感的是，人生最难受的事情是挨饿，李锐在北大荒差一点就被饿死了。了解李锐多一点是读到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时，这是我当时看到的珍贵史料。看后，令我对中央从批左到突然反右的谜团豁然开朗。后来又读了他的《龙胆紫集》，觉得他是硬骨头。

为李锐名字脱敏

“六四”事件后，李锐、于光远、李昌和杜润生在中顾委受到追查，不予党员登记，后被陈云挽回。但是，中宣部严格规定，李锐、于光远、李昌和杜润生这些人的名字一律不许见诸报刊、不许媒体提起，谁做处理谁。

1991年末，杂志编辑拿来一篇李锐写关于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的稿《青年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杂志编委会讨论这稿能不能发，编委会争议非常激烈。因为中宣部有明确规定，李锐的名字不准见报。《炎黄》创刊不久，各个方面都还很弱，为了生存必须非常谨慎。尽量刊登一些以史为鉴的、对人们有启发又安全的稿子。反对的人认为：第一，此文是老生常谈，有毛粉之嫌；其次，让李锐的名字见报，是拿着鸡蛋碰石头，我们碰不起。于是编辑提出，要不跟李锐说，用笔名发表可否？编辑问了李锐，但他不同意，于是编辑就希望由我和方实去找李锐谈，我们就给李锐打了电话。他沉默了一会，说：“用笔名，可以吧。”我又说：“那你想用什么笔名？”他说：就叫“怒吼”吧。

然后，编辑部又讨论很久，分析局势观察动向，最后我们觉得可以试试打个擦边球，因为这篇文章是正面评价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表扬毛总可以吧？用这个理由让李锐名字见报而辩护。尽管讲了毛的好话，但看刊物出现李锐名字，这个政治收益还是大许多。最后，我拍板：“就用李锐的真名发表吧。这也算是一次“以身试法”吧。就如我们刊登实事求是评价陈独秀的文章，国民党抗战贡献文章一样，成功地打了擦边球。果然，此事就这么过去了。后来，其他媒体见我们杂志发了李锐的署名文章，并没有被惩罚，于是也陆续发表李锐的文章，这是杂志同仁引以为豪的事——为李锐的名字脱敏。

我们查了一下，李锐这些年在炎黄发表了五十六篇文章，每年大约有三四篇。《炎黄春秋》的平台，让相当多的人了解了李锐，了解了李锐的思想。

李锐：“我来向上面反映”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炎黄春秋》杂志周围有几十个退下来的正部长，连老国安部长凌云都是《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那时《炎黄春秋》杂志的编委扩大会，常有一大批前正部级老干部和前省委书记参加，有杜润生、曾彦修、凌云、任仲夷、朱厚泽、刘杰（河南省委书记）、项南（福建省委书记）、周惠（内蒙古书记）等，李锐当时算是比较年长的一个，经常带头发言。

李锐多次说，要着力研究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个什么？共产主义是个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个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什么？他秉承其父的宪政思想，希望中国走向宪政。那时，不少老干部听他的话觉得有点刺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内局势的变化，不少人再回想起当年开会时的情形，都不得不佩服李锐的远见卓识。

进入二十世纪，《炎黄春秋》碰过许多坎。有一次，中宣部和上面一些人整肃《炎黄春秋》，用行政手段，不给《炎黄》杂志年检，说要通过年检就必须挂靠到一家部级单位，这就引出一场“挂靠风波”。此事发生在2004年三四月前后（此前还有于光远文章风波，他的文章涉及“三个代表”入宪）。为解决挂靠问题，我亲自去找周惠，想让他疏通刘云山，还找了耀邦夫人和他的老大，希望挂靠到全国工商联。最后，还是炎黄文化研究会的会长费孝通老给我们疏通了，他说服了上面让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作为杂志主管主办单位，杂志得以生存发展。

期间，李锐也参加了我们多次研究对策。后来，杂志多次出现类似的年检风波，无法出刊，在这种关头，总有李锐和其他老同志帮忙。后来，当他们一个个病倒、辞世，杂志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有时候上面来头很大，部分有人脉的同志也觉得棘手。

有一次，面对同类风波，开会时大家都静静的，有点僵在那里。这时李老高声地说：“我来试试！我来向上反映。”不管成功与否，这一句痛快的“我来试试”，就像一剂强心针，它给人力量和鼓舞。就像在前线，“同志们，跟我冲啊！”一样有号召力。

我还记得，老同志帮忙转给中央的信，有一次果然转到当时的总书记胡锦

涛手里，据说胡还批过一段话，大意是《炎黄春秋》是一批老同志办的，他们还是爱护拥护我们党的，有错误可以加强管理和教育。他把中宣部整肃杂志的企图顶了回去。

回想二十五年办刊历程，每一站都有许许多多老部长老省长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拚命为《炎黄春秋》护航，呵护着我们的杂志。我们杂志全体同仁都永远感怀他们每一个人：萧克、张爱萍、费孝通、习仲勋、杜润生、任仲夷、凌云、朱厚泽、周惠、刘杰、曾志、胡启立、田纪云等等。李锐是他们中最长寿的一位，他跟2017年去世的何方一样，跟许许多多老同志一样，为这本呼吁改革的刊物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如果没有这么一大群老部长、老革命、老同志，《炎黄春秋》绝不可能走得这么远，这么久。

“《炎黄》的顾问，我当定了！”

在杂志社的晚期，老人们随着自然规律，一个个驾鹤西去。李锐的作用也更突出了。他在2014年成为杂志社的正式顾问，坚定地跟杂志的全体同仁一起，用最后的力气为炎黄春秋护航。

李锐晚年成为一位卓著的党史专家。他在《如何看待毛泽东》一文中，写道：“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将历史及有关人物的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世。从而使后代人彻底清醒过来，接受教训，以史为鉴，更理性地前进。”

在《八十自寿》诗中他写道：“欲唤人间归正道，学操董笔度余生。”他晚年著书立说，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病，发出了呼唤宪政民主的强音。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和决心，他坚定地没有一丝犹豫地站在《炎黄春秋》一边。二十多年间，他笔耕不辍地为《炎黄春秋》写稿；《炎黄春秋》不论何时开会，不论刮多大的风、下多大的雪，只要他在北京，他总是一大早就来到会场，经常是第一个。

2015年，继《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栏目和《南方周末》等被“和谐”之后，《炎黄》已经是改革开放派唯一的阵地，而李锐就更加珍爱这唯一的阵地了。李锐与何方等老同志和顾问们与杂志同仁频繁见面，共同应对。

2015年春，国内形势急转，更不利改革开放的力量。有的老编委在所属部门党组的要求下被迫退出杂志编委会，杂志社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险，有的副总编、

副社长也被迫退出，我们有几期杂志期刊，在印刷厂被国安截住，要停机换稿才可以重新开机印刷出版。一天，中组部派了三个局长去李锐家谈话，目的很明确，说中组部要求李锐退出炎黄杂志社的顾问的职务，李锐斩钉截铁地回答“你们说完了吗？《炎黄春秋》这个顾问，我当定了。你们就回去如实汇报吧。就说是我说的。”他决心与《炎黄春秋》共存亡。他也这样捍卫过当年被整治的《冰点》，使《冰点》在《中国青年报》得以复刊。李锐的仗义执言，让李大同至今念念不忘。

这一年，大家明显感到了形势急转的诡异动向，李锐更是按捺不住，极力主张《炎黄春秋》重新刊登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编辑部争论很大，认为任何报刊都没有这种先例，但李锐反覆陈述理由，最后说服了大家，总编徐庆全动手编辑了李锐的按语《我为何提议重发邓小平的“八一八”讲话》。在国家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李锐始终站在人民一边，站在推动历史前进的一方。

非同寻常的豁达

记得一次，我们一起去见胡启立，办公室在二楼，但是没有电梯。李锐已经九十好几了，却是一个人赶来。当李锐和我一起爬到二楼楼梯的拐角处时，他脸色发白，嘴唇发青，气喘吁吁，差点倒下了。我们赶紧扶着他。但他很镇定，慢慢靠着墙，从随身带的黑提包里拿出硝酸甘油喷雾剂，往嘴里喷了几下，又过了一会，他才说：“没事了。”我们继续爬上二楼。那天跟胡启立谈了许多。其实，他的身体没有他表现出来的那么好。尽管他快到一百岁时还坚持游泳，还经常在游泳池看见他，他一般游仰泳。但是他心脏安装了起搏器，又有冠心病，肺也不太好。在他看来，与身体以至生命比起来，为宪政民主奋斗才是更重要的。

2016年，《炎黄春秋》也迎来最后的寒冬。那时，我们这帮“老家伙”里，只有李锐、何方和我还健在，还能思考还能走动。《炎黄春秋》顾问小组，还有郭道晖、江平两位法律界顶级人物，和中年骨干陶斯亮、胡德华。

当时我九十三岁了，精力明显衰退，心里非常焦虑，那一段时间因为李锐腿部拉伤，走不了路，我就约何方、宋以敏夫妇经常到李锐家碰头。

2016年春，《炎黄春秋》依惯例举办迎春茶话会，遭到当局阻挠，李锐、何方和我主张坚决抗争，编辑部同人和顾问们都齐心协力。我说：“茶话会非开不

可，我们几个老家伙站在前头，让他们抓，这么冷的天，进去后就死在里头了，这是最好的结局。”李锐、何方都坚决赞同。最终，我们的会转战了几个会场，还是成功地举行了，来盯梢的人挺多，他们就坐在会场边上听。

李锐的晚年，跟我来往就更多了，基本上不到半个月就见一次面，谈谈政局，说说心里话。不是我上他家，就是他来我家。其实他老伴张玉珍跟我说了很多李锐家的苦恼，但是他从不谈这些家常事，每次跟我在一起，都是谈国家大事，即使谈他过去的苦难，也是幽默轻松。

李锐在晚年鼓励杂志社的杨继绳写完记录中国大饥荒的那部力作《墓碑》，李锐多次为他提供资料和指导。杨继绳说，没有李锐和众多老同志们的支持鼓励，没有李锐的著作为基础，他不可能完成。

最后时光——何时宪政

2018年3月，李锐因肺部感染住进医院，脑子清醒的时候，他总是要老伴张玉珍打电话给我：“李锐惦记杜老啊，要我问问老杜身体还好吗？”我在家时也经常接到他夫人的问候电话。当他不发烧了，我们去看他，他在昏睡中听说我来了，果然睁开双眼，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握了很久很久。张大姐说话，他点头。

去年中秋节，我专程到翠微路的华普大超市，给李锐买了盒最好的月饼送到医院。后来，医生为了降低感染风险，不让外人探望，我们也就没有机会再去看他了。之后张玉珍经常受李锐之托来我家，谈他的情况，但我心里是放不下的，知道他前一段日子还在看报纸，也很是欢喜。我心想，硬骨头李锐可以熬过这一关的。


一直到2019年2月12日，突然听李锐夫人说，李锐不太好了，医生让家人通知我去探望。那天，老天降下罕见的鹅毛大雪，我们赶到北京医院八一五病房，李锐带着很大的氧气面罩，脸有些浮肿，他的身躯还是那么伟岸。我轻轻握着李锐的手腕和脉搏，我感觉到他的心跳还是有力的，突然，他的手动了一下。我清楚地感觉到，在即将永别的时刻，他最想对我说的，还是那句他说过不下百次的话：“何时宪政大开张？”

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作主未宽松。

何时宪政施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他就是这样的人，中国的硬脊梁，他笑着走向生命的终点。

李锐老兄在天堂看着我们。 

根据口述整理 此为口述者订正后的定稿 健谭论

【怀 人】

李锐对我恩重如山

阎 淮

1982年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成立，李锐任局长。我作为第一批局员认识了李老。36年来，从部下到小友（近年他赐书皆题“阎淮小友”），与这位父辈良师结下忘年之交。在李老101岁高寿重病之际，我回忆与他的多次接触——

一

中共十二大首次提出“干部四化”，其关键是年轻化和知识化。当时全国县处级以上干部，大学教育程度只占6%，绝大多数50岁以上。李锐指导青干局，提出：“目前省部级50岁以下和大学程度应占三分之一，三年后达到二分之一，八年后新提者都应50岁以下和大学程度。”此方案在中组部阻力极大。李锐以锐不可挡的气势为此方案力排众议保驾护航，使其终于通过。上述“两个三分之一”成为随后调整省委和省政府的硬指标。我们都认为：“李锐很强势，思路开阔，雷厉风行，提出一个想法，能把组织部上下裹挟着走。这很少见！”曾任青干局副局长的任小彬，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如是说。

二

1982年底中央决定调整全国各省级班子。湖南试点，李锐派我代表中组部参加工作组。我斗胆建议在所有的地厅级以上干部中民意测验，作为新省级领导

人选的基础。”李锐竟欣然批准、全力支持！我们十余人的中央工作组在湖南工作50天，先后让200现任和卸任的省级领导、600厅局长、600地市长不记名投票建议新省级领导。事后中央转发文件，以湖南经验指导各省市的调整。李锐在省级干部的选拔中，开了民主化的先河！

三

1983年5月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培养锻炼的通知》，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干局长的李锐很重视，工作雷厉风行。6月初他派我在北大召集北大、清华等六所重点院校的组织部长会议，了解“选调”的进度和问题。6月底又让我到北京市召开北京各高校党委书记会，交流选拔工作经验，解决具体困难。随后，李锐把北京经验向全国推广。在各省的努力下，7月毕业分配前，全国共选拔了两千余名优秀毕业生到城乡工农业最基层锻炼。我秉承李锐对青年的关怀，对各省青干处说：“我们应该是‘选调生’之家，他们基本是60年代生人，与我们40年代的差一代，又是我们催生的，象我们亲生的孩子，我们要当好家长！一直负责到底，直到他们走上领导岗位。”

当年秋天我到东北三省和华北三省区考察省级后备干部时，都按李锐的指示看望当地的首批选调生；此后几年我到各地去调整领导班子和考察第三梯队时，都尽可能看望当地历届选调生，送去温情、解决困难。截止1985年，全国选调生共达1.27万。本世纪初选调生中，6800名担任县处级，420名任地厅级，7名任省部级。

四

1983年10月，中组部颁发《关于建立省级后备干部制度的意见》。文件称：“中央最近提出，必须从现在开始抓紧第三梯队的建设。省部级后备干部，是指省委正副书记和常委，省政府的正副省长和中央国家机关正副部长的后备对象。每个省20名，共600名；每个部委5名，共400名；全国共1000名。”

八十年代喊得震天价响而又无比神秘的“第三梯队”，作为中央的一项重要决策成为中组部的中心工作，而具体负责的则是青干局。因此它是分管青干局的李锐在中组部的重要政绩。拙作《进出中组部》（明镜出版社，香港，2017年）中有万余字的详细记述。青干局的同事崔武年这次又撰文《李锐和“第三梯队”

建设》回忆这项工作。因此不再重复，只说明我在李锐指示下，建立第三梯队前考察过习近平、张德江、李长春、吴仪、李铁映等，直接参与考察建立北京和天津的市级第三梯队。

五

1984年，已不再兼任青干局长的李锐派我参加在浙江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讨论会”。我设计一张《代表调查表》，其中除了基本情况外，专设了“困难阻力”、“要求希望”和“今后计划”三项。向百余与会代表分发。根据对“调查表”的分析，我写了近万字的《一代新人在崛起》的调查报告交李锐。他的日记记载：“阎淮来谈莫干山会议情况，人才不少。让阎去接触，了解内情真像！”（李老向我披露了日记中关于我的部分）随后李锐在新华社的《瞭望》周刊发表文章，介绍我的上文。由此，我与经济学界建立了良好关系，被推选为鲍彤为会长的“北京青年经济学会”理事，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组建和内部研讨。同年我还参加了被夏衍誉为“文学史的遵义会议”的作协四大，并与文艺界开始交往。——这一切都源于李锐对我工作上的信任！

六

而李锐对我的恩重如山则体现在如下事例。在整党的“个人检查”中我说：“真正的危险不是三种人，而是缺少民主！”可见我的激进和异端。中组部上层以我婚变为由，不定我为处级。李锐则为我力争，他1983.4.13日记说：“下午参加职称评定会。幸亏来了，补上阎淮处级调研员。”时任政协主席的邓颖超与我岳父母是半世纪的战友，得知我欲离婚。在政治局会议上对中组部长说：“这样的思想腐化份子，要清除出中组部！”陈部长回部里传达了邓颖超指示。我对李锐说：“我要求调离中组部。不能再给您添麻烦啦！”李：“不能因为一个糊涂老太太的一句话，就断送一个优秀青年干部的一生！随后，在部长办公会议上，他说了上述同样的“四个一”的名言，并且强调邓颖超不分管组织工作，她的“气话”不是上级指示。根据潜规则，某位上级力保你，同级官员不会为事不关己的你，反驳得罪同僚。“邓老太太指示”就这样被降温了。李锐在我危难的关键时刻，再次保护了我。

七

1984年夏，邓力群、李伯宁等人先后向陈云递交“声讨”李锐的告状信。9月，陈云批示：“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就调离组织部吧。”李锐认为自己没有犯错误，坚决不离开组织部。9月27日时任中组部长乔石做正式结论：“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年龄过线，自己要求退下来。”既执行了陈云批示，又给了李锐台阶。国庆节我走冷门，到离休的李锐家拜节。这是继83年青干局成立后第一个春节，全局五六人集体去李锐家拜年之后，我首次单独蹬李府。李锐让我帮助了解陈云批示缘由。我立即先后到哥们刘泽彭和陈元家，随后向“前首长”汇报。李锐1984.10.4日记：“阎淮来谈，与刘陈接触后，了解到陈云的‘将李锐调离组织部’的批示是批在李伯宁状纸上，此是借刀之法，欲盖弥彰。”我为能报答李锐恩情之万一而欣慰！

八

再次单独去李锐家则是十年后了。1984—89年，我们分别忙着自己的事，我只是偶尔与青干局同事集体为李锐拜年。1989—94年我离开中国，李锐仍关心我。听熟人说，他非常了解我的情况，仅在日记就有两处提到我：1989.8.16：“与来客谈阎淮从香港跑法国之事，令人浩叹。这是当年陈云给我青干局人选名单中第一位也。”1990.4.15：“与刘某某同车，漫谈人事。阎淮在主持‘民阵’巴黎支部。”

1994年底，“风波”我后首次返国，第一时间拜访老长官。劫后重逢格外亲切，我们聊了五六个小时并送我他的两本新作。李锐说：“胡耀邦跟我说，原以为我是陈云的人，一直与我保持距离，后来发现我是一个按自己的思想做事的人，不是一个‘跟线’的人。”他诚恳地对我说：“我象耀邦看我那样看你。当年陈云处交来十余人名单，说‘你考察了解，满意的就要。只是第一名阎淮，不必考察必须要！’我心里有气，认为你是陈云和陈元的人，后来才逐渐认识了你。”


李锐日记1994.12.12：“上午阎淮来，长谈他在国外五年经历，为何出国。6.3夜在南池子南口亲眼目睹，时在康华有出国护照。在法国参加民阵活动一年，太不成话而退出。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文研究所）二年，因一篇谈中国权力结构文被各方赏识，最后落脚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实为新加坡政府当咨询。同江泽民

很熟（他在国外不谈人，只谈制度），对杨尚昆、杨白冰下台事件有分析（邓不能再换班）。江在电子部时，曾拟调他去任干部司付司长。留午餐，二点始离去。”

九

此后我每年都回国，经常看望李锐。他90岁后，怕影响他健康，我就只与青干局朋友为他寿宴了。2014年《中国新闻周刊》杨记者为撰写第三梯队的文章欲采访我，被我婉拒。杨后来说：“李锐也让我采访你，并想见你。”8月23日我去李家，97岁的李锐精神矍铄、记忆非凡、十分健谈。我们侃大山一下午，张阿姨又要留饭，我要开车载他们下馆子，最后双方皆未得逞。我也没空手而归，李锐又题字赠我两本新作《李锐口述往事》和《我的父亲李锐》。李锐在中组部只工作两年多，担任青干局长和分管青干局各一年多，青干局多数同事只在他间接领导约一年。但是，他们大都与李部长感情深厚。仅以近年我们为他祝寿为例，2015李老虚岁99，“过九不过十”，办寿宴！2016虚岁百岁，祝寿！去年李老行走不便，各方寿宴不断，青干同事不宜独办，便到家庭寿宴去争席位。2017那4月13日李老百岁正日子，李家人真照顾我们，其三桌家宴青干们就占领大半桌！

十

在去年的寿宴上，我犹豫再三，终于在饭后厚着脸皮向李老提出：可否为题《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我的回忆录作序？孰料他竟欣然答允，让我一个月后取序稿。我呈上书稿，静待佳音、敬待嘉音。5月10日，我应约去李老家取《李序》。序中说：“阎淮这样的‘红二代’，认同我们‘两头真’的理念，要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使祖国走上民主、法治、宪政、富民、强国普世价值的道路！”他还赠我近作《李锐期颐集》，问我：“题写什么？”我答：“阎淮老部下。”李老边说：“你老什么？”边提笔写下“阎淮小友存览”。我诚恐：“友？是不敢当！”李老指着序说：“你认同我们‘两头真’老人的理念，就是‘两头真’的后生，就是我的小友！”《变革远未成功，后人更需努力》是百岁老人为我作序的标题，作为李老大小友和政治后人，我愿为远未成功的变革，更加努力！三十多年前，六十多岁的李部长在中组部保护了我；现在，百岁李老又为我作序，使拙作增光添彩、身价倍增。说李锐对我恩重如山，恰如其分毫不夸张！

【怀人】

李锐和“第三梯队”建设

崔武年

我调到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的时候，是1983年11月，李锐已经是中央组织部排名第一的副部长了——当时，陈野萍是部长，是十二届中顾委委员，李锐是十二届中央委员，而且是中央组织部唯一的中央委员。李锐分管青年干部局。

那时，“第三梯队”的工作已经开始部署。最早提出“第三梯队”这个概念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1983年5月，在中央为召开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座谈会上，胡耀邦说：老同志是第一梯队，运筹帷幄，制定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现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是第二梯队，但也不年轻了。所以，要下决心搞第三梯队，选拔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过了一些日子，到6月末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第三梯队”的提法得到了陈云的肯定和强调——陈云要求：“趁我们还在的时候”，把“第三梯队”建立起来。差不多同时吧，邓小平也赞同了这个形象的提法。在随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第三梯队的建设”就成了中央组织部的“第一重要的工作”；但是，在部里，这个工作则是由分管副部长李锐直接主持、组织进行的。

—

在李锐的主持下，部里专门组织作了调查研究，制定了有关文件，确定了选拔标准和上报程序。程序很严，最主要的一道是：所有名单，必须要由所在省部级党委常委（党组）会上集体讨论通过后上报中组部，再由中央考察组考察，经中组部审定之后上报中央。并且明确提出，这个最后确定的“第三梯队”名单要求在1984年七一以前上报中央。所以，按这个要求，各省部的预选名单应该在1983年年底之前报到中央组织部。

实际的工作进程却不大理想：到12月了，报送的寥寥无几，大部分省部都表示要到次年开春以后可报——但是上面却等不及了！于是，在陈野萍、李锐等部领导汇报之后，就有了当时中央分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宋任穷亲临中组部做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催收催种”！

我记的很清楚,12月10日,宋任穷到部里听取第三梯队建设工作情况汇报,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和部办公厅、经济干部局、党政干部局的主要领导参加,青年干部局局长李志民、副局长刘泽彭并张洁瑜、刘广祥等参加,我亦恭临其末——附带说一句,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锐。

李志民为主汇报,李锐时有插话补充。宋任穷在整个汇报中间讲了很多意见。他说:耀邦同志最近几次指示要抓紧第三梯队建设,前两天又问我,这一千个人的名单什么时候能拿得出来?你们要作为第一件大事来抓!当李志民说到十三个省年底可报,十个省年底只能报一部分,还有四个省得到明年一、二月份以后才能报时,宋任穷说:这个不行。你们要抓紧催,告诉他们,对这个事,中央很重视,非常重视!选好的名单,一部分也要,一个也要!当大家议到年龄情况时,宋任穷说:年龄上可注明一下,特别是对五十岁以上准备就用的,八五年要开一次党代会,所以,实际上八五年就要用。耀邦讲八五年中央委员要更新一批,更新的来源主要就在这里面。当李志民说到为便于中央了解,这一千个人每人搞个四百字的小传时,宋任穷说:四百个字?这些人是要报给小平、陈云同志看的,一人四百个字加起来就是四十万字!怎么看得过来?要搞个简本!耀邦同志讲,可以一批批地给,分开来,有计划地给,成熟的先给。当大家议到部委工作基础比省市差,没“腿”的部又比有“腿”的部差时,宋任穷说:没“腿”的部委确实困难多一些,可以放后一点。将来这一千人是“全民所有制”,可以统一调整,现在提倡干部交流,就从这些干部开始,等等。会开了一个下午,大家夹叙夹议,气氛挺活跃。

当时李锐很少以“部领导”的身份说“指示性”的意见——我最初的感觉,老听说李锐说话“有锐气”,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嘛。

这次汇报会的直接结果有三项:其一,决定第三梯队建设工作列为中组部1984年的第一项的重要工作,动员全部的力量,抓紧组织考察;其二,决定专门就第三梯队建设问题出一个时期的简报,以推动和指导工作;其三,就是紧接着在这个月尽快召开一个全国的电话会议,各省区市的第一书记、分管副书记和组织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部长、主任和人事司长参加,把第三梯队建设切切实实地变成全党都必须重视的一项一刻也不得懈怠的实际工作。

说干就干,雷厉风行!1983年12月16日晚上,就在中组部简陋的礼堂里,这个全国性的电话会议就召开了!陈野苹主持,李锐讲话——他的讲话语言形

象，口风犀利，要求明确，责任到位，毫不拖泥带水，“第三梯队建设工作”一下子就提上了最重要的工作日程！

这一次，我对李锐的风格算是初有领教。

二

中组部的发条一下子就上足了！并且在整个1984年的上半年把第三梯队建设当作了全部的第一项中心工作！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分管副部长的李锐，更是亲力亲为，亲自抓，亲自参加工作！

1983年年末，部办公会连着三天开会——

12月27日听取黑龙江省的汇报，李锐主持；

12月28日听取江苏省的汇报，李锐主持；

12月29日听取北京市的汇报，李锐主持。

1984年初始，按照李锐的要求，赴黑龙江、江苏、北京三个考察组1月2日就出发了。与此同时，部办公会又连续开会——

1月13日听取中国科学院、核工业部、航空工业部和卫生部的第三梯队建设工作汇报，李锐主持；

1月18日听取陕西省和广西自治区的汇报，李锐主持；

1月23日听取内蒙古自治区的汇报，李锐主持；

1月26日听取山西省的汇报，李锐主持。

到了2月以后，部办公会又分别听取了冶金部、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城乡建设部、国家体委、国家科委、经贸部、轻工部、公安部、民政部、林业部、商业部、铁道部、邮电部、船舶总公司、中联部、统战部、旅游局、气象局、工商局等部委的第三梯队人选的汇报。这些会议都是李锐主持的。

作为具体的工作人员，这些会我都参加了，当然只有听和记的资格——但是，对李锐主持会议的风格，我倒是渐多感悟，并且耳目一新了！

那时，这些会上较多涉及的是被选干部的“文革表现”问题。一方面，这个问题挺奇特——所谓“文革表现好”，其概念恰恰是在当时如何抵制毛主席的号召，或者“逍遥”，或者反对，总之是如何表现出不理解、不积极，最好是想办法的抵制；而“文革表现不好”，则意味着如何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或有过激言论，或有过激行为，总之是多么积极、多么紧跟，甚至是花样百出的批斗老干

部。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大家：文革十年，总要分个前期、后期吧，说到“文革表现”，相当多的考察材料都是着重叙述某某人文革初期不理解、有抵制、反对批斗老干部；而对文革后期，在“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表现则常常是一笔带过。很多人觉得这种处理实际上是不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会伤害很多真心跟共产党走的人。李锐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常常是只听不说，让大家争论，在关键时他会打断，让回去进一步考察；但是在“前期、后期”的问题上他说都应该重视，而更应该“重后期”。这一点我记忆很深——因为这和我们局内好多人的意见一致。后来我们议论，这确实也难为了老爷子！整个文革，他被关了八年，正所谓“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当时，我直接负责，或者说是直接参与的是两件事情。

其一是选编《人物小传参考资料》。听李志民说，搞这个“资料”是李锐的意见。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针对当时的干部考察材料刻板、干瘪、不生动、不形象、千人一面、没有特点的问题，想有所借鉴，有所改变。这个资料我具体操办时可是费了好大劲！主要是无所遵循。后来还是李锐说“像《范滂传》就不错嘛”算是开了窍。最后，在李志民的具体指导下，完成了这个“资料”的选编。编入“资料”的“小传”共十四篇，分别取自斯诺的《西行漫记》及《史记》、《资治通鉴》、《后汉书》、《古代散文选注》等书。计有：李大钊小传、徐特立小传、李达小传、汪精卫小传，贾谊评介、曹操评介、嵇康评介、文天祥评介，司马迁评李斯、司马迁评韩信、司马迁评李广以及李世民谈诸臣、范滂传、种树郭橐驼传。这个“资料”经过李锐的审定，铅印以后以“中组部青干局”的名义正式发给了各考察组。在选编说明中，我们做了这样一番交代：“这些资料，有现代人物小传，有古代人物评介，有史家论赞，有人物传记，总之都是写人、评论人的。它们体裁不一，风格各异，着眼点各有不同，但都文字简练，语言生动，特点突出，褒贬鲜明，塑造人物准确，可供写干部小传参考。”这个“资料”引起了众多组织干部们的稀罕和议论，很多人说“考察材料还能这样写，真是闻所未闻！”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要为之一书！这个“资料”在中组部堂而皇之的出现，就是在现在也是不可想象的。可谓中共组织史上短暂一现的昙花。

其二是编写《省部级第三梯队建设工作简报》。这个“简报”当时被确定为“机密”级，只送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即一把手），出了一年多，一共出了十几期。这十几期有一半左右是我“写”的——这个“写”

字打引号是因为最后刊出的东西与我最初写的原始东西距离很大，有的甚至面目全非。因为编写这个“简报”，我和李锐有了几次直接接触：记得去他的办公室三次，都是他叫我去的——第一次是我到他的办公室，他一边批着文件，一边头都不抬地跟我说：你这个“简报”太罗嗦，人家是抓特点带一般，你倒好，反过来，是扔特点留一般！特点全扔了，光剩下一般！这样不行，重写去吧！第二次是我到他的办公室，“简报”的文字不长，他跟我“耳提面命”地重新搞了一遍。第三次我去时他那里正好有人谈话，看见我，很简单地说：这个我改了一下，你拿回去再顺一顺。还有一次是李锐在走廊里碰到我，毫不客气地说：你们局的“秀才”都是些“小知识分子”，搞个“简报”象中学生作文！这是给小平、耀邦同志看的，用你们说那么多道理！唉，我起草的这些“简报”都是按程序经李志民或刘泽彭审核后报出去，到了研究室、到了办公厅反复改过，有的甚至给改的“体无完肤”以后才送到他那里的，但是他还是不满意！那时他官居中组部副部长，年近七十岁的年纪，还是这样“举轻若重”，这种负责精神，现在想来，真是令人感叹！

三

在第二批考察组回来的时候，已经是6月了。这时，部办公会议听取考察结果的汇报，确定第三梯队名单，又成了相对集中的工作。这些会议，都是李锐主持的。比如：6月7日的辽宁、安徽考察组的汇报；6月9日的四川、陕西考察组的汇报；6月13日的广东、河南、山东考察组的汇报。我算了一下，加在一起，这七个省总共报了272人，经考察，确定了195人。要是算个百分比的话，那就是淘汰率近28%。

到6月下旬以后，部办公会议讨论名单的会议，开得就更多了。从汇报中可以看出，这次的第三梯队考察，普遍非常重视非常认真，而且采用了一些新的考察方法，象面试、笔试、“请开列一个自己读过的书目”、“即时写一个简短的自我评价”，还有上海、浙江搞过的“德才测评”等——可别小看这些简单的“新”方法，在当时的中组部，这都带有一定的“革命”的性质！我是去内蒙考察的，在内蒙我还开了一个“记者座谈会”——因为记者接触面广，所以请他们推荐“内蒙的出类拔萃之辈”——这个方式还是我出发以前碰到李锐，他随口和我说的。顺带说一下，那次座谈会，还真发现了一位原来自治区没有报的干部，

几十年以后，他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与此同时，部领导还采用召开座谈会的形式，与在京的第三梯队名单上的干部见面。这样的座谈会在6月里连续开了五次，也都是李锐主持的——

6月20日的北京市青年干部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田成平、陆道浚、汪统、李其炎、陆宇澄、陈元、李志坚、张福森、颜昌远；

6月22日、27日、29日连续三次的中央党校学员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苏德宜、张连珍、王培知、阙连春、王永多、张宗亮、孙守钦、南国柱、谢计达；欧进钢、张凯、李明贵、林兆枢、查世煜、王秀柔、周时昌、张寿山；李金华、兰友仁、陈德玉、赵世华、刘志鹏、李长春、高延青等；

6月25日的中央部委青年干部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王可立、李纪周、廖晓村、徐文伯、林炎志、覃志刚。这些座谈会共有39位名单上的干部参加，在家的部领导能参加的也都尽量参加了。

7月中旬，我还随李锐去了一次天津，与天津市的第三梯队干部开了两个座谈会。一次参加范围都是做经济工作的，共七个人，有凌兆元、张立昌、叶迪生、李慧芬、潘义清、王述祖、梁肃；一次都是从事社会管理工作的，共八个人，有邱允盛、张崇智、刘淑贞、张玮、陈钟槐、梁国庆、叶厚荣、杨戊辰。座谈的题目十分广泛，有时有一定的针对性，比如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在开创工作局面时在人事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对组织部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等；有时则比较宽松，完全是漫谈式的，比如新时期的党政干部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就我们党各个历史时期干部队伍的特点谈谈自己的分析和看法等。

当时，为了把考察工作做的更细更好，部领导还召开了考察组的工作座谈会。在6月12日和13日用了两个半天的时间开了两次，李锐、王照华、曹志三位部领导主持，各考察组的组长、副组长参加。这种专门探讨考察工作经验教训的座谈会，后来还开了两次。有意思的是，各考察组的组长副组长都是组织部各局的局长副局长或刚刚退下来的局长副局长，在会上议论考察工作本身不多，议论青年干部的困难、苦衷，议论如何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岗位工作倒成了主要的话题——这里面包括一些平时对这项工作颇有“微词”的“老组织部”——可见，当时选拔有知识有学历的年轻干部，并且尽可能的把他们推上领导岗位，一时间成了“大势所趋”！

四

接下来的更多的就是综合工作了，包括对已经确定的第三梯队名单进行初步的统计和分析，对考察材料、小传做最后的整理和修订，更重要的，就是就这项工作起草给中央的总结报告，等等。在这个期间，我和李锐也时有接触，但是那主要都是在部里的会议上了。到了9月，我的日记上还记得——

9月4日，参加大中型企业座谈会，李锐出席并讲话。

9月6日，根据李锐的指示，拉了一个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提供宣传线索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

9月12日，上午，按李志民的交代，把总结初稿送到李锐处，没说什么话。下午，参加李锐主持的部办公会，讨论云南、江西的名单。

后来的几天都没有提到李锐了，好像也没有谁告诉我有什么变动——直到9月18日，我的日记里写着：“下午参加部办公会，讨论甘肃、青海两省的第三梯队名单。尉健行、王照华、曹志、白治民等部领导参加——”没有李锐。这时候，我才确认李锐已经不是副部长了。

9月30日，我写了这样一段日记——

“李锐同志已经免职。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得以提高到实际上与领导干部等同样的位置，中央组织部的观念和工作得以开拓前进到今天这个程度，应该说，李锐是有‘杀开血路’之功的。李锐是第一任青年干部局局长。我以为，青年干部局现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风格实际上代表了中央组织部工作改革的方向——承认这一点非常困难，承认这一点需要时间，但是承认这一点是早晚的事。”等等。

五

前面说，我是1983年12月10日第一次见到李锐的。但是我能调到中央组织部青年干部局，却是因为我给李锐的一封信。那也是1983年的事。那年年初，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胡昭衡被委派为派驻新疆的“中央机构改革工作组组长”，我被派为他的代理秘书，从而，在新疆工作了将近四个月。当时，每个省的工作组都有一个中组部的干部，新疆组的是胡光伟。后来，我和老胡就熟悉了，经常一起聊天，有一次说到七六年的“四五事件”，说了感觉又说看法，再后来就说到了各自的经历，居然观点差不多完全一样！我说我因“四五事件”被“隔离审查”，天天在单位里面大会批，小会斗，和“专案组”

斗智斗勇，交代“问题”，折腾了三个多月！幸亏地震了，都忙着“抗震救灾”了，我才“解放”了，等等。我又说了很多我对“四五运动”的看法，老胡听了都挺赞成！老胡告诉我，中央组织部成立了青年干部局，局长是李锐，思想挺解放的，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跟他谈谈。中央组织部有个青年干部局，我是早就听人说过的；局长是李锐却是刚刚知道。对李锐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我看过他写的《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也听说他在庐山会议上被开除党籍了！我一下子就动心了。到了5月下旬吧，就在乌鲁木齐的延安宾馆，我给李锐写了一封信，那天是5月22日。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找出来了那年的日记本，翻到了那天的日记：

5月22日

昨天一天大风，今天一天下尘。白天都是杂事，不太忙，可也没闲着。

晚上就是自己的时间了，我思之再三，给李锐同志写了一封一直想写的信。是的，我愈发地认为：在当前大批地选拔年轻干部的时候，对天安门事件的那批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应该给以集体的重视！对他们应该专列名单，重点考察！从1976年到现在，已经七年过去了。七年中，有些人可能会有分化，但是大部分人一定是更加成熟了。特别是其中的“老三届”，他们本来已经成为各单位的骨干，前几年很多人又考上了大学，这两年正好毕业，补上了缺少学历的遗憾！他们是经受过严酷的政治考验的一批人，是真正反对‘四人帮’、坚决拥护三中全会决议的一批人！这批人是不应该被埋没的，否则真是我们党的损失，是我们民族的损失。已经2:00多了，该睡觉了。我自己当然是天安门事件的参加者，但是写这封信我是心地坦然的。

第二天，这封信我就交机要交通发出去了，连原稿都没有留。


6月份，我回北京以后，就听说有中组部的人来了解我的情况。到了8月吧，中组部青年干部局的一男一女两位同志到我们单位找我谈话。10月，中组部的调令发到了我们单位。11月初，我怀揣着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大印的“中组部（83）干调字299号”调令，迈进了西单商场北边那座不挂牌子的灰色大楼——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个刮风天的上午。

报到的时候，我才知道，到我们单位找我谈话的是青年干部局局长李志民和综合处处长张洁瑜。在我调出中组部以后，有一年一起吃饭，李锐喝了两杯酒，

跟我说：我是先看到你的信，后认识了你这个人。

六

真是时光如梭，转眼就是百年！三十多年过去，李锐和他当年在组织部门工作的同事们选拔的“第三梯队”干部到2017年十九大的时候也基本上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今年的4月13日，李锐老也是101岁高龄啦！我在网上看到，现在仍然健在的原中顾委委员尚有八位，即刘杰、李锐、林乎加、苏毅然、袁宝华、焦若愚和万海峰、李力安。这几位革命老人，除后两位之外，都是年过期颐，人望祥瑞了——我希望他们都能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描绘的第一个“百年”，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重生，看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也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政大开张”！这是他们奋斗了一生的事业，不管中间经过了多少挫折、坎坷、失败和流血牺牲！他们是那一代人的所存不多的硕果的代表。我们应该珍惜他们，爱护他们，尊重他们。我们还能再要求他们什么呢？我们还能再指责他们什么呢？我们还能再希望他们什么呢？剩下的事情应该是我们自己的了——包括那些没有做好的，没有做对的，没有做到的，没有做的尽如人意的。仅此而已。

也为李锐老101岁寿辰贺。

【怀人】

李锐是谁？

吴思

一 李锐不是谁？

在李锐先生追问“何时宪政大开张”的时候，他已经跳出了马列主义的圈子。真正的马列主义者，真理在胸笔在手，掌握了历史规律，代表了美好的未来，怎会被“宪政”捆住手脚？

二 历史K线图

从偏离宪政的角度看历史，似乎可以像股市K线图一样，以权力的一元化程度为纵轴，以时间为横轴，在中国的一个半世纪内数出六大浪。

第一浪向上：洋务运动。

一百四五十年前，以中体西用之道，我官僚帝国开始应对西方新文明的冲击。中学为体就是坚持儒家的三纲五常，西学为用就是引进西方科技、造船造炮。这是官家集团奋发向上的第一浪。

第二浪向下：辛亥革命。

洋务运动失败，帝制衰落，君主立宪没有守住，进入民国。这段时间，民虽弱，官家集团也不强，四分五裂，跌跌撞撞走向宪政，这是官家权力衰落向下的第二浪。

第三浪向上：党国威权。

国民党引进苏俄的党国体制，西征北伐，统一中国，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官家集团再度奋发，这是上行第三浪。

第四浪向下：国共合作。

奈何外遭强寇，内逢强敌，党国有意走向联合政府，结束训政，这是下行第四浪。

第五浪向上：党国极权。

国共中途换手，以马列主义武装的具有更高组织水平的共产党，打天下坐江山，建立了极权体制，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文革，这是上行第五浪。

走到文革，一元化大一统也走到了人世间的最高峰。为人类探寻新路、开辟新纪元的努力达到极致，结果却内外交困，一塌糊涂。官家集团试验新知识新主义新体制失败了，被迫掉头，放权让利，改革开放开始。

第六浪向下：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开启了六浪下行之路，这是回归人类文明主流之路。经济方面是多元化的市场经济，政治方面是多元化的权力制衡。我们部分接受了经济多元化，拒绝了政治思想多元化。官家集团坚持政权垄断，视其为根本原则。在这方面，第六浪本身也是起起伏伏，一波三折。

三 官家之道

折腾了一百多年，我们才看明白：原来，中体西用的那个“体”，并不是儒学，也不是三民主义，不是马列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体”，就是我们老大帝国两千多年不变的体制，官家主义体制。官家主导，官家本位，

官家取舍，官家说了算。

中体西用之道，就是官家集团坚持政权垄断并学习赶超之道，这就是官家集团应对西方新文明即现代化冲击之道。一百多年来，在官家的领导下，我们始终走在这条路上。

四 李锐这一辈子

在李锐先生生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坐了一趟过山车。先是凭借深厚的官家主义文化传统，凭借官家精英的优势和雄心，在偏离宪政的一元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到顶了，走不动了，才一步三回头地走向多元化。

李锐属于“一二·九运动”那一代。他是在下行第四浪中加入中共的。许多被称为“两头真”的中共老人，加入中共的时段和初衷，都和李锐先生近似。中共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在外人看来，就是独立自由和宪政民主的旗帜。当时，中共确实一再催促国民党结束训政走向宪政。

在上行第五浪的半途，1959年庐山会议，李锐批评毛泽东。毛泽东继续攀登高峰，李锐进了秦城监狱。

改革开放第六浪，李锐热情参与。第六浪途中有两次较大的反弹，重新走向一元化，他都是反对者和受害者。在官家集团认为自己还能凭借垄断权力和大国家底开辟新天地的时候，李锐一再呼吁脱胎换骨，实施宪政，回归人类文明主流。

2004年，李锐先生过88岁生日那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李锐先生为什么能够存在》。文章的大意是，李锐们资格老，地位高，讲道理，敢说话，又不患得患失，官方拿他们没办法，于是他们就享有了某种“贵族自由”，在大一统格局中为平民撑出了自由的缺口。这些体制内的老先生，两头真，他们自身就是走向宪政的力量，他们也支持民间走向宪政的努力。

2004年至今，14年过去，李老先生和中国有什么变化？

在生命的尽头，李老仍旧追求民主宪政，仍旧不肯附和当权者，也仍旧享受高干待遇。同时，中国的宪政仍旧没有开张，民主仍旧没有进展，党国体制仍旧。

在这个体制下，李锐仍旧可以直言不讳，但李锐们越来越少。他的声音的传播空间也被压缩了。他本人成了敏感作家，他兼任顾问和作者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名存实亡。管理的网眼越来越细密，他在网络上的存在感也不如当年了。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又上了几个台阶。民营企业和民间活力大大增强，国家富强和民众小康已经不在话下。但宪政民主仍显得遥遥无期。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看，李锐的一生，大体是失败的一生。他想要的宪政民主始终得不到。不过，历史学家通常不会简单地把政治目标是否达到作为评价尺度。


五 李锐是谁

在历史学家看来，任何时代的到来，都有先驱和准备者。李锐就是党国体制下的宪政民主的准备者和先驱之一。

历史上各国的宪政转型，大体有三条道路，执政党主导的叫改良，体制外力量主导的叫革命，第三条路是体制内外协商谈判。各种转型，官方和民间都有温和派和强硬派。双方的温和派互动，就有改良，有协商谈判。这是双赢的顺利转型之路。强硬对强硬，只能单赢，单赢的后果其实对双方都不好。

在这个意义上，李锐们就是通往双赢转型之路的备用车。时机未到，李锐就是作家，就是鼓吹者。时机合适，李锐们就是现实转型的载重车。

德先生连绵百余年的道统，作为备用车存在的辛亥革命连绵百余年的法统，李锐就是这两种传统在当代体制内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存在，就是这两种传统在体制内尚未彻底消失的证明。他的兴衰荣辱，也是这两种传统在体制内强弱起伏的象征。

李锐先生不死！

【怀人】

告别李锐：中共民主派的谢幕

章立凡

二〇一九年的初春二月，中共党史学界痛失两座重镇，一位是哈佛大学教授、《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作者麦克法夸尔（马若德）先生；另一位就是中共党内著名的异议者、《庐山会议实录》作者李锐先生。随着李锐的逝世，以《炎黄春秋》杂志为代表的中共民主派，已日渐凋零，进入谢幕时段（我认为此文中还是用“民

主派“比较切题，下同）。

老成凋谢：民主派后继乏人

李锐先生逝世的次日，有关部门来电话，指责我昨天接受外媒的访问，要求我不出席李锐的追悼会。我说，我是李锐的朋友，他逝世了，为什么不能去悼念？请说出不能去的理由。对方无言以对。

我回想了一下对外媒的发言，大意是：一位中共老干部，敢于公开地表明自己对中共现任领导人的批评，这是前所未有的。接下来要看的就是，领导人会不会给李锐送花圈，或者出席他的遗体告别。观察气量和态度的时候到了。我还提及，李锐说过死后不盖党旗。

李锐虽然在病榻上批评过领导人，但领导人也说过“要容得下尖锐批评”，追悼逝者，展示“雅量”，此其时也——我这提示亦不为过。既然有关部门给不出缺席的理由，那么我就有理由去追悼。

二月二十日上午，我按预定时间去了八宝山殡仪馆。想去看看有没有关键的花圈，遗体是否覆盖党旗——我要见证历史时刻。

一路上碰到的熟人，都提醒我警察在盘查。离八宝山越近，警察就越多，我偕夫人坦然前行，未受阻拦。

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官民通用的东礼堂举行。中共党内等级森严，李锐先生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却未安排在高官专用的大礼堂（原第一告别室），也没按惯例悬挂悼念逝者的黑布横幅。

迎面遇上蒋彦永大夫。他是赶在第一拨进去告别的，未被允许拍照。礼堂目前暂停入内，门外的高台上排起了长队。门口立着“谢绝拍照”的牌子，没有发放逝者生平的文字，一些外媒和港媒记者，被便衣精确地清出队伍。排了半小时队进入礼堂，颇感气氛诡异。门内有工作人员收缴吊客自带的鲜花，礼堂内没有奏哀乐。鞠躬后凝视逝者，李锐先生安卧在鲜花中，遗体还是被覆盖了中共党旗。仔细扫视众多花圈，仅看到刘云山、贺国强、田纪云等人的名字。

李锐先生表达过“不开追悼会，不进八宝山，不盖党旗”的遗愿，但“党是领导一切的”，既然无法占有其灵魂，也只好掌控其躯壳了。所谓“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与李锐先生同辈的朱厚泽、于光远、何方等人，虽在不同程度上被认为是党内异议者，只要逝者还有党籍，遗体都毫无例外地被覆盖党旗。逝者

意愿得不到尊重现象，体制内也颇为常见，最著名的先例就是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曾亲自在火葬倡议书上签字，表明身后火葬的意愿。如今签字人中唯一还躺在水晶棺里的，就是毛自己。

慰问家属后走出礼堂，有不少熟人在交谈，得知习近平、李克强、朱镕基等也送了花圈，可能是被工作人员遮挡起来了，搞不清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送别者中包括《炎黄春秋》杂志的作者、编辑和读者群，郭道晖、杜光、姚监复等老先生均有出席，还有些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受难者，皆垂垂老矣，更多则的是体制内退休者及红二代，与我年龄相仿，鲜见有年轻面孔。据港媒估算，约一千五百人出席了今天的告别。我的总体感觉是——这个群体年龄偏大。

李锐之锐：性格决定命运

李锐先生是我认识的前辈中，性格最为特殊的一位。

第一次见到李锐先生，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在《世界经济导报》和《新观察》杂志联合举办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上。李锐谈及自己与耀邦的交往和友谊，也不讳言工作中的分歧（如关于某人的工作安排和三峡工程）以及耀邦的大度，认为“他是我在几十年党内生活中第二个可以交心的人”。李锐提到的一个细节引起我的注意：胡耀邦逝世前两天，摄影师（杜修贤）经秦川安排，到耀邦家为他拍照时，按惯例要他笑一笑，耀邦说“我怎么笑得起来”。其中一张“苦笑”遗照，很快成为胡耀邦追悼大会上的标准像。稍后，我将李锐所述轶闻核对翔实，写进一篇悼文发表。

我们这些与会者的全部发言，《世界经济导报》曾以五个版面发表，导致该报被永久停刊。

本世纪初，我成为《炎黄春秋》杂志的作者之一，与李锐先生和其他前辈作者，不时在一些联谊活动和座谈会中相遇。

李锐口才极好，出口成章，他这一代学运出身的人物，与当下那批脱稿说不了话的官僚，不可同日而语。就我记忆所及，他在一些公开场合，对一些事件、人物的评论，总是直截了当，态度鲜明不留情面。

例如二〇〇四年七月，李锐出席《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书的座谈会，他批评一九四九年之后向苏联“一边倒”以及左的影响，导致中国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他说：“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

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我觉得他就是中国水利界的马寅初、陈寅恪。”

李锐先生指名道姓地谈到：八十年代力主三峡工程上马的，除了钱正英、张光斗一对老“搭档”，还有两位姓王的前封疆大吏对此最为积极，一是王震，一是王任重。方案报到陈云那里，陈没有明说反对，批示要求水电部调研。当时李鹏代表水电部，提出水库移民问题难办，算是说了一句明白话。“主上派”又跑去游说邓小平，称完工以后，万吨轮船可直达重庆，把邓说动了。但工程上马以后，他们就改口说“万吨船队”了。这后半段的发言，在发表时被“和谐”了。

记得我发言时引用的数据不准确，李锐快人快语、当面提出纠正。会后他私下对我提及：“一九三八年在武汉，我与令尊见过面，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聚餐时，我注意到，李锐不大掩饰个人好恶。他耳朵有点背，即便坐得远，只要他想听你说话，会用手掌拢起耳朵听；某人就坐在他身边缠着问话，他却毫无反应。

李锐一生的命运，与他这种锋芒毕露、剖切透辟的个性密不可分。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他与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的林一山，就三峡工程当着毛泽东面折廷诤，过后又受命撰文各抒己见。当时毛氏“高峡出平湖”的狂想几成定局，由此被搁置了三十四年。设若这项好大喜功的方案，乘着“大跃进”的东风大干快上，后面的那场“人祸”（大饥荒），为害之烈不知还要翻上几番。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李锐以其口才文笔，推迟了一场经济和生态的双重灾难，由是获得毛泽东的青睐，成为御用“兼职秘书”；但“伴君如伴虎”，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李锐以批评“大跃进”及议论“斯大林晚年”贾祸，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公职下放改造，“文革”入狱八年，直至一九七九年复出，二十年间遍尝盛衰荣辱，皆因以天下奉一人。

李锐之真：秉笔直书党史秘辛

在我的经历中，亲见二人衰年变法，“破门而出”成为史学家。一位是《墓碑》的作者杨继绳先生，由新闻记者变“旧闻记者”，以翔实的数据和记录，将共和国史上惨烈的大饥荒展现给世人。另一位就是《庐山会议实录》作者李锐先生，他以亲历者的现场实录，首次披露了中共高层围绕“大跃进”的斗争和决策过程，成为研究中共党史的必读书，同时也是解析大饥荒成因的一把钥匙。《庐山会议实录》与李志绥大夫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从政治层面，一从

生活层面，以不同角度立体解读了毛泽东其人，是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贡献。

李锐先生能够完成这部力作，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除了毛泽东兼职秘书的身份外，他既是庐山会议的亲历者，又被指定做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常委会的现场记录人。

二、复出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离职后又主管《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编纂工作，有搜集查阅资料的便利。

三、八十年代的体制内外政治氛围及党内高层的支持推动。

说到第三点，就不能不重提胡乔木。这位与李锐两度共事的毛泽东“文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主持者，一生有其多面性，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九九二年增订版后记中，证实了胡的幕后推手角色及其在资料上提供的支持。这也令我对这位被称为“左王”的人物，有了较为立体的认识。当然，胡乔木支持李锐写书的用意，除了信史存真，还包括总结历史教训、维护中共执政地位的长远考量。胡乔木懂得“春秋大义”的利害，借机留下自己在庐山上的正面形象，不失为一种精明的投注。反观当下以禁言禁书为能事的文宣主管，若有胡乔木一半的见识和精明，也不至于如此讳疾忌医。

李锐的庐山会议笔记本，曾一度被陈伯达掠走，从另一角度证明当时的中共高层，懂得历史档案的重要性。记得有一次《炎黄春秋》座谈，李锐先生谈及他在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任内，亲历的一次销毁周恩来档案事件。当时邓颖超找到杨尚昆，说是恩来有一批档案，必须销毁。杨推说需要请示邓小平，邓颖超说那你马上请示，我就坐在这里等。杨只好电话请示小平，获准把档案运过来，当场销毁。李锐作为组织部门负责人，被召到现场监督销档。他说自己曾拿起一份卷宗看，是某某某（章注：名字我忘记了）的专档。

我立时想起：曾有纪念文章提到，周恩来临终前与邓颖超有一段对话。周说，我知道很多事，但我不说。邓说，我也知道很多事，我也不说。李锐所述，印证了这一说法。小超（邓颖超）履行了与恩来的约定，将很多见不得光的党史秘密，付之一炬。

理想主义：“两头真”寻觅初心

关于中共一批老干部的“两头真”，我宁可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希望它变成一种社会现象，因为毕竟中间有一段失真了。不幸的是，当下体制内外“两

面人”比比皆是，“双重人格”已成社会常态。

以《炎黄春秋》为旗帜的中共党内民主派，被认为是“两头真”的群体，李锐先生亦为其中翘楚。这批人中多数是在“一二·九”运动前后加入中共，确曾怀有救国救民和自由民主的理想，且对国民党的腐败和对日政策感到失望。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是一个全世界知识分子趋向左倾的时代。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共为摆脱困境，大力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吸引了大批学生和知识青年投奔中共，这些人与在“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召唤下加入中共队伍的农民，素质完全不一样。整个抗战时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很多场合大讲新民主主义宪政，主张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承诺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美国式的民主国家。那一时期《新华日报》等中共媒体宣传自由民主和普世价值的文章，相当一部分出自这批知识分子之手。

然而这批人的命运，与历史上加入农民起义队伍的知识分子们雷同。要么成为新王朝的辅佐，要么成为被祭坛上的牺牲。李锐经历延安整风，遭受过政治和家庭生活的双重打击。中共建政后，李锐作为中共革命干部，参与过建政时期的左倾，写文章宣传过土改。但作为体制内的文化人，他保护了曾国藩故居，发现了重要史料《唐纵日记》；他在一九五二年就开始搜集整理毛泽东的史料，并于一九五七年出版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尽管有参与“造神”的成分，但也成为李锐研究毛泽东的开端。

如果没有庐山会议，李锐也会成为“两头真”人物中的一员，但中期的迷失在所不免。亲历“大跃进”和庐山会议，使他看到中共体制的弊端和阴暗面，醒悟得比别人早；近二十年的流放和监禁，更积累了深刻的认识。这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幸运。

这批“两头真”在改革开放之初，确实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党主立宪”，使中共在宪法和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推动国家走上宪政之路。不过，这种主张既有早年自由民主的理想，也有维护中共执政地位的考量。李锐在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青年干部局局长任内，主抓“第三梯队”建设，考察推送了两位后来担任总书记的人物。八十年代中期，中共实行干部新老交替，李锐等“一二·九”群体因年龄原因退居二线，而大佬仍在掌握实际权力，中国的改革形成“爸爸已经退休，爷爷还在管事”的局面。李锐这段工作的功过是非，只好留待后人评说了。

炎黄春秋：一代人其鸣也哀

一九八九年学潮期间，李锐、李昌、于光远和杜润生四位中顾委委员联名，“呼吁学生与部队双方无条件撤退”。

“六四”事件后，政治体制改革停摆。杜导正先生创办了《炎黄春秋》杂志，成为党内民主派的要发声平台。李锐作为中坚人物，呼吁民主宪政不遗余力。他的历史贡献有目共睹，我就不一一详述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权贵利益集团形成，政治氛围日趋保守，言论空间收窄，《炎黄春秋》的老人们在体制内处境日艰，却仍坚守话语权。李锐的书也无法在大陆出版了，他曾抗议道：“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自由，我李锐就没有言论自由。”因海关扣留海外版李锐回忆录引发的维权公案，现已进入第七个年头。

不时有人质疑李锐：为什么不退党？他对女儿李南央的解释是“留在党内说话更有份量”。我记得李锐曾谈到：二〇〇七年十月，中共召开十七大，九十岁的他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分组讨论时跟李源潮一个组。李锐发了一次言，李源潮过来对他说，从现在起到会期结束你都不要发言了。李锐觉得深受侮辱，真想拂袖而去。考虑到自己留在党内的价值并守住话语权，才强忍着继续与会，直到十七大结束。

2012年中共十八大，列席代表李锐在书面发言中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主张从党内民主和差额选举做起，实现党政分开；党组织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不得干预司法；允许党内公开表达不同意见和批评领导人及党的政策；领导人离职后取消特殊待遇、不得干政；他质疑中国模式，重申“宪政大开张”和普世价值，清算苏俄模式，反对一党专政。这恐怕是他在党内会议上最后一次公开表达。

十八大闭幕后，炎黄春秋杂志社和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联合在京举办了“改革共识论坛”。李锐与会，介绍了自己在十八大的小组会发言，指出：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政法委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主张尽快废止各级党组织的政法委。何方、高放、杜光、郭道晖、江平、陈光中、资中筠、宋以敏、高锴等前辈也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最后提出一份《改革共识倡议书》，有71

位与会者联署。

此时我对政治改革已不抱希望，在发言中有明确的表达：“我想重新解释三个名词：什么是旧中国？宪政中国出现以前的中国是旧中国。什么是旧社会？公民社会出现以前的社会就是旧社会。什么是改革开放？改革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开放应该开放党禁、报禁。”

“可能很多人跟我没共识，我也不追求这种共识，因为在座很多老同志的心情我也理解，你们怀着革命理想风风雨雨几十年走过来，走到今天，可以说，你们的理想已经破灭了，但不愿意承认，还希望救党，我相信你们的真诚。”我坦承自己的心情是“死马当作活马医”，能救就救，救不了就算了。

此后的剧情发展，一如我所预感，李锐先生和“炎黄春秋”老人们的期盼，不仅没有实现，而且朝着相反的方向倒退。甚至《炎黄春秋》杂志自身，也在风刀霜剑下被劫夺，被迫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两头真”老人们最难实现的，莫过于超越自己。

“哀莫大于心死”，深刻反思之后，李锐先生真正大彻大悟。被“恩赐”予特邀代表的他，没有出席二〇一八年的中共十九大。其病榻遗言掷地有声，成为这位世纪老人的绝响。

李锐先生逝世后，我曾作小诗二首送别。兹录于此为奠：

一

空将遗蜕裹红旗，心路云泥哪得知。
七十年来一台戏，剧终谁是好男儿？

二

回首尘寰事不空，百年大愿众心同。
中华宪政开张日，俎豆馨香告锐翁。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 增订

【怀人】

述往思来寻史迹

韦弦佩

—

我有幸读到《李锐口述往事》（大山文化出版社，2013年7月版），这是一本承《史记》之宏旨，述往思来寻史迹的大书。李锐《自序》。仅五行字。百年人生，前八十年，分四个阶段，每二十年一个阶段：一、读书、革命；二、革命工作；三、当贱民、坐牢；四、离休，继续工作。

朱正序。认为此书最大的特点和优点，不仅自述往事，也思考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怎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也就是（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彻底改变个人说了算的专制体制，完全堵死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赠李锐寿联一幅：“立德、立功、立言，备矣三不朽；不淫、不移、不屈，大哉一丈夫。”

丁东序。介绍此书编纂过程，从2002年始，至2013年成书的艰难性。穿越遮蔽，寻找真相，从中可感受到历史深处真实脉搏的跳动。从李锐一生，读者可见中共党史的缩影和中华民族百年沧桑的缩影。实质上，浓缩了追求民主宪政的几代中国人执着努力的心路历程。

付出最多心血的，是李锐女儿李南央。在《编者说明》中，她说：“口述的整理难度，比起书信和日记不是倍数而是指数关系。”确是“天大的功夫”！类似一次宇航探索。她说：“我开始整理‘口述’时，父亲已是九十二岁高龄，他执拗地坚持所有的整理稿要经他审阅后方可使用。”李南央希望，这本书，作为二十世纪百年历史的一页，“对史家有所帮助，对后人有所警醒”。

老共产党员李锐十二万分严肃、认真的著述，当然不会害怕和逃避，而是竭诚欢迎、甘愿经受万千读者神圣的批判武器考验的。

二

《李锐口述往事》，最后一部分《臧否人物》，特别吸引眼球。我先读为快。李锐臧否了十九位人物，依次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高岗、陈云、胡乔

木、陆定一、薄一波、余秋里、赵紫阳、胡耀邦、钱正英、李鹏、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加上三任中组部部长（贺国强、曾庆红、李源潮）。

李锐臧否人物，有根有据，见仁见智，无所顾忌。但我不敢说没有一丝一毫不偏不倚，无所倾斜，也不敢说无一字一句不符合历史天平。

李锐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出版《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介绍和评价毛泽东，他对毛泽东或臧或否，是随历史发展而有所变化的。在延安，李锐在《解放日报》管过社论，那时对毛泽东的文章非常佩服。“毛写文章是厉害的，确实写得好，一遍稿子。”李锐说，“毛泽东有他的长处，否则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威信。”（414页）

李锐对毛泽东的总体评价，主要有几句话。“毛这个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属于一种很极端的个人，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做。”（410页）“没有这种性格的人领导，共产党不可能胜利。”（411页）“说到底，毛还是个农民，心胸极其狭隘，生活上保留了很多农民的习惯。”（414页）杨开慧故居发现的杨开慧藏匿的日记，记载着杨开慧对毛泽东爱恨交进的评语。（411页）李锐诗云：“贤妻早识太心伤。”（414页）

李锐所评人物真切可信。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无不是偶然机遇的必然归宿。《臧否人物》中，李锐将胡耀邦和赵紫阳合在一起述评，篇幅较长，兹摘其要：

文革结束时，共产党内文化高的官员大多在中、低层，高层中，文化低的多，有的甚至基本是文盲。这同毛泽东轻视知识分子直到轻视知识有关……在中国历史上，耀邦和紫阳这样的人不多。

耀邦去世前十天，跟我有一次六个小时的长谈，主要谈了十大问题，都是同邓小平的某些分歧，根本没有提他跟赵紫阳有什么矛盾，以前的多次闲谈中也从没有提起过。

我最后一次见赵紫阳是二〇〇四年的十二月廿九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的911号病房，是他去世前二十天。（李锐写了《紫阳同志永别了》，刊于香港《明报》第二版）

共产党总书记里面有两个人下台时不作检讨：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赵紫阳，……陈独秀一九四〇年就写文章反对斯大林专制……紫阳为了维护真理，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一直被软禁到死。

我当过高岗的政治秘书，当过陈云的政治秘书，当过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他们都各有各的本事，尤其是毛泽东。但是他们跟赵紫阳、胡耀邦没法比。……我认为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领导人里头最清醒，最能干，最能够按人民意愿做事的两位总书记。”（435-442页）

耀邦去世十六周年，紫阳去世两周年时，李锐均写有纪念文章。书中有引录，足见中肯和公允。

权力不等于修养。子贡问孔子，是否有一言可以终身实践的？孔子回答说，大概是“恕”字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前提是将心比心，与人平等，待人宽恕、宽容、宽厚。被李锐“臧否”的十九位高层人士，并非都谦让知礼。势利者、倨傲者有之，前恭后倨者亦有之。李锐的述评，形神兼备，典型白描，栩栩毕肖其人，过目难忘。

三

书再从头读起。

李锐祖籍湖南平江，祖居平江长寿街。父亲李积芳，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回国任民国总议院议员。母亲李张淑，别号存真。

李锐1917年4月13日出生于北平，有两个姐姐。李锐原名李厚生，小名明伢子。父亲1922年去世后，李锐由母亲和大姐（体育教师）负担生活、读书。李锐1938年在徐州为《救国青年》写稿时，第一次使用“李锐”笔名，亦作常用名至今。

李锐入学时，由母亲苦教，已识得千字。1923年入长沙私立楚怡小学就读，连跳两级，五年毕业，入楚怡中学。因指出国文老师授课错误，受老师诬辱，母亲向校方告状未果，就转考私立名校岳云中学读书。1934年秋，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李锐诗云：“路从无路走而出，鲁迅文章是我师。”（56页、65页）

李锐读小学、中学，品学兼优，全面发展，天真活泼，广受师生欢迎。进入武大后，1937年离开。“说实话，在大学的那两三年，我没有好好读书，净闹革命了。”李锐这样说。（56页）热衷于抗日救亡，广交朋友，寻找、宣传真理，积极参与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书中记载甚详。

李锐进武大不久，就在校刊《珞珈月刊》发表一生唯一的小说《走》。1936

年冬，参加武汉秘密学联工作，结识中学生代表万国瑞（杨纯）、范元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武大青年救国团发起全校追悼鲁迅大会，李锐创作了鲁迅大幅画像和幻灯片。文学院讲师苏雪林在《人世间》诋毁鲁迅，遭到进步学生在课堂上愤怒质问。第二次全国木刻展，在武汉难以展出，李锐受孔罗荪请托，就在武大文学院大教室布展，把鲁迅木刻像挂在墙上正中。文学院院长陈源一见鲁迅像，慌忙退出。学校图书馆将鲁迅著作全部封存，足见“现代评论派”对鲁迅嫉恨之深。（84页）

1937年2月，李锐、谢文耀、陈约珥、万国瑞、习东光等八人，在谢文耀家（武昌贡院街三十号），成立自发党组织（武汉临时支部），举行宣誓仪式。后来方知，陈约珥、习东光都已是正式党员。除了从反省院出来的二人，其余人员都被中共北平市委接受为正式党员。

因进步刊物被查户口的警察发现，6月6日李锐在北平被捕，以“张训之”化名关押一周，交“保证书”获释。此后，张训之这个使用一次的名字，在延安抢救运动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均受审查。直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得以洗清。

在延安时，钱瑛和陶铸同志对李锐说过，李锐他们这个自发支部，对抗战前后武汉的救亡运动和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92~93页）大海上一只无舵的航船，终于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在北平接上组织关系期间，李锐与万国瑞（杨纯）同居，转入山东平津流亡同学会工作，与万国瑞失去联系。

李锐的学生时代结束，成为职业革命家。

四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李锐、文立征和万国瑞三人，随天津流亡同学会学生离开北平，到天津，坐船抵烟台，转至济南，参加韩复榘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学员受训后，派赴山东各县打游击。男女学员分开，不可随便交往。倒有点像太平天国规制。李锐因事到女生宿舍找万国瑞，被女队教官撞见，惹了大事。训练班头头召集全体学员，把李锐押到广场台上，当众廷杖。鲜血染红了裤子，李锐不吭一声，台下很多女生哽咽、流泪。李锐被送医院治疗，伤愈可行走后，离开了训练班，仍到平津流亡同学会工作。形势日趋危急。万国瑞转至济宁，继续受训，李锐撤至泰安，遂与万国瑞断了音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锐才在北京与万国瑞见面，方知抗战期间，万国瑞一直在山东、苏北一带战斗，改名杨纯，与张爱萍将军有过一段短暂婚姻，后与张彦结婚（华东局副秘书长）。晚年与李锐成为隔楼近邻，常有来往，她已去世。（97页）

1938年11月12日午夜，日军逼近长沙。国民党实施“焦土政策”，因误译电文，放火提前，长沙烧了五日五夜，三千多人丧生，城里百分之九十以上房屋烧毁。因误译电报代码为“文”，故称“长沙文夕大火”。

一天傍晚，李锐在大街上巧遇范元甄。她是随郭沫若政治部第三厅到长沙参加大火善后工作的。范元甄后来被派到重庆《新华日报》当记者。李锐与范元甄开始热烈通信。（112~113页）

1939年8月，李锐到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9月13日晚，李锐与范元甄结婚，邀请一些朋友，吃了一顿饭。（119页）博古将李、范调往延安，同车有胡乔木、吕振羽、周立波、何思敏等人。12月31日，到达延安。李、范1938年相恋至1949年前的通信，由他们的大女儿李南央编为一书《父母昨日书》（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得知李、范离渝去了延安，很有意见。周恩来、邓颖超给范元甄去信，邓问要什么东西，范要了一个搪瓷缸子，可喝水、漱口、热饭、热菜多用。解放后，范元甄用“万全”笔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写了一篇散文《搪瓷茶缸》。（141页）

李锐于1941年9月到《解放日报》工作。1943年4月初，被老同学魏泽同咬为特务，抓进保安处；1944年6月放出，回到报社；1945年10月初，离开延安。在报社工作，不到三年，用了六个笔名，发表文章（包括社论）约40篇，有若干作用大，影响好的得意之作。（134页）

书中有专章，谈他们在“延安的夫妻生活”。

1940年上半年，范早产，婴儿死，后又两次打胎，范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国际组工作，身体、生活均受影响。李锐总觉亏心，很对不起她。整风开始以后，思想虽有分歧，关系还不算坏。李锐用毛笔写了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诗，范挂在她住的窑洞墙上。李锐被“抢救”，审查期间，范元甄与邓力群同居。李释放前，博古对范说：你和邓之事，绝不能跟李锐说。李锐被抓，党有责任，李锐受了冤枉，刚放出来，不能再出问题。可是，范还是对李锐说了她和邓力群的关

系，说他们俩感情如何好。于是，李与范分手。正值抗战七周年，李锐赶写了几篇大块文章，疲惫悲痛，突发高烧，四十天不退烧。几位同志为李锐输血，烧才渐退，转危为安。由于夏英喆、蔡畅等人做工作，1945年下半年，中央政治研究室对范、邓问题作了组织结论。范将杨尚昆做的结论，用工整毛笔字抄了一份给李，表示接受党的决定。李、范复婚。博古把范调到了《解放日报》。

李锐说：“我二十二岁进延安，二十八岁出延安，延安六年的生活和工作，应当讲对我这一生有着根本性的影响。……特别是保安处的那一年多，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没有那一段经历，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在秦城监狱呆的那个八年，不会那样理智、头脑健全地熬过来。”（144页）

人生看来偶然的前因，蕴藏着难以避免的似乎必然的后果。

五

延安的整风、抢救运动，是占较长篇幅的重大历史事件。延安那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毛泽东很好，顶呱呱。”运动目的，是“确立自己在党内的正确路线和领袖地位”。其始，“同反右派运动开始时一样，就是号召群众给领导提意见”。（147页）

我注意到，李锐未在正文中提及洛甫（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实际领导职务，只在为61人叛徒案平反一条注释中，似不经意提了一下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明确指出：“毛搞的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康生都是他的一把刀子。”（149页）

运动的荒诞性，在于说谎自诬，颠倒是非、荣辱，大搞逼供信，混淆敌我友，祸莫大焉！把坑害善良，乱杀无辜，美为“治病救人”。王实味之死，是一典型。李锐将希特勒与斯大林作了比较，虽然没有将毛泽东与希、斯作比，但读者自会比较他们的高低。（163页）只要看，苏区肃反，杀人十万（164页）；只要看，“在延安地区共打了一万五千个特务，其中没有一个是真的。”（177页）怎么不个个战栗，人人自危？

1950年，李锐在湖南，读到国民党大特务所写《唐纵日记》（1942年8月23日）写着：“现在延安的情况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大吃一惊，才恍悟延安“特务如麻”，其实一个也没有！（188页、411页）

李锐认为，否定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利大于弊。（178页）不然，年长月

久、根深蒂固的形左实右，必难纠正。“否定”，既然“利大于弊”，又何来对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182页）欲“否”而还“是”啊！矛盾；悖论。整肃知识分子，“毛比列宁、斯大林更厉害。”（184页）李锐论此，仿佛余悸犹存。时至于今，很难说思想已经彻底解放。

因此，李锐恳切希望，对影响极坏、极大的延安整风、抢救运动，应该有一个历史决议。（188～190页）延安整风、抢救，确立了“一把手”说了算的领导体制；开始了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进一步发展了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形式；打造出让知识分子服服贴贴的紧箍咒，党员都变成驯服工具。（192页）年仅五旬而逝的杰出史学家高华，其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可以为李锐的论说佐证。

另外，“农村包围城市”（181页），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展品中，有一封恽代英的信，创议农村包围城市而最后夺取城市。据此，应认定，恽代英才是这一革命策略的首创者。“文革”之初，我参观时所见，深祈专家核实。

六

从延安出来，李锐在热河办《冀热辽日报》。然后进东北，先后担任高岗、陈云的政治秘书。随陈云接管沈阳的经验，由李锐帮助起草成报告，报中央，都收集在《陈云文选》之中。

“那个时候，陈云还有过一个和平土改的思想，所以后来中央分工没有让他管农村。”李锐说。跟随陈云参观了一大圈，李锐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迅速改变了岗位选择的意向，想离开宣传岗位。陈云告诉李锐，他是想回上海工作。南下时，陈云很想留李锐，但李锐不愿留在中央。李锐说，“延安时在中央呆了六年，呆腻了。”李锐不想坐而论道，想干点实际工作。（250-254页）

经采访者丁东再三追问，李锐才深入回忆，补充说了下面一席话。他深感觉党内人事关系复杂；对土改的“左”的看法，却同高岗合拍；接管沈阳，对旧社会的政策，许多方面跟陈云一致。1950年，陈云给黄克诚写信，要黄放李锐调北京。1952年，李锐调到了北京，陈云让周太和找李锐，要李锐到陈云那里去。李锐回答说：“你告诉老板，让我做点事情吧。”（255页）李锐离休后，到中组部组建青年干部局，也是陈云特意安排的。（405～406页）

李锐回忆到，1949年回到长沙，没有下过乡，“对土改那种批斗、杀人看不惯……”（278页）这都是大可研究的国史议题。

李锐认为，缺乏监督的“党国体制”，是极难改善的。这种异见，其实是关键点晴之笔。党政分层、双重指挥，叠床架屋，以致“政令不出中南海”（温家宝卸任时在记者会上讲话）。中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势所不免。李锐又说逆耳忠言。（405页）社会环境污染，伪革命化，数十年未改善，而日趋恶化，普遍权力至上，关系第一。

七

中国水电事业的开创，李锐建有功勋。事实雄辩地证明，李锐是将帅之才。他肯学习，重实干，思想开明，具有哲学思维和科学精神。一上手，他就探索地质与水电工程的关系，自培地质人员，胆大心细，悟性甚高，善于抓典型经验，把握住长远价值，很快入其门，外行变内行。他是事业心极强的实干家，他永远不会做官僚。他的远见、预见和灼见，处处闪光。知胜知败，尤其重视失败教训！

他为什么始终坚决反对修建长江三峡？从“动能经济”概念出发，他首先想到，必须有消耗电力的工业及地区经济与之配套，要有可行的全盘计划。否则，水电站只是摆设。浩大工程，岂可只为防洪，不思发电？动能经济同河流综合利用，加上生态环境的合理保护和积极改善，乃千年、万年大计。三门峡的教训，一之为甚，岂可再乎？所以，三峡工程，“陈云从来反对，坚决反对”。（326页）

1958年1月，中央召开南宁会议。会议中心内容，是批判周恩来和陈云，毛说周、陈反对他的“冒进”，离开右派只有五十公尺了。毛写了“高峡出平湖”的诗，报上鼓吹三峡工程上马，热气腾腾。

薄一波委婉告诉毛：“主席，三峡有个反对派叫李锐。”毛泽东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林一山是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到了南宁，知道了会议情况，朋友们无不替李锐捏一把汗。

李锐和林一山，坐在毛泽东的正对面。

毛泽东问：“林一山，你要谈多久？”

林一山说，他要谈两个小时。

毛又问李锐，要谈多长时间。

李锐答：“半个小时。”李锐请林一山先讲。

林一山从汉元帝谈起，历代皇帝怎样防洪，把原定坝高235米改成200米，也谈到了水电。讲了两个小时。

李锐讲，修大水库，专门防洪是不行的，应该主要是发电。装机容量至少是一千七八百万千瓦，甚至两千万千瓦。全国当时电站装机总容量，才五百万千瓦。中国何时需要三峡这么大个电站？现在说不清楚。根据苏联经验，全国不能只有一个电网。好比一个城市，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公司，全国更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一个电厂的投资假如是一万元，那么消耗这些电力的耗电经济项目，投资至少要五万元，不是由防洪需要来决定，没有三峡修坝，照旧可以防洪。而且，长江不是黄河，它从来不是害河。最后讲到技术问题，三峡工程，最困难是地质勘察问题。单是选坝址，没三、五年，不能完成。其他如环保、航运、移民，李锐都没有讲。深入浅出，尽量简单，大家都听懂了。

毛泽东说：“好，讲得很好。但讲了还不算数，每人再写一篇文章来，不怕长，三天交卷。”布置了作业，两人分头去完成。

毛泽东看了他们的文章，当面褒李贬林。毛说：“我们要培养李锐这样的秀才。”关于发电，毛定下“水主火辅”方针。会议快要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着李锐说：“李锐，你来当我的秘书。”（328～331页）

李锐心里害怕到毛泽东身边去工作。他心想，文章好坏不是决定因素，你过去能听信林一山的话，是因为你没有经济观点，也缺乏科学知识，水平同林一山差不多。

李锐诗云：

案前摆战场，亦似叙家常。

诸公心落石，朝日雾飞光。

但说文章好，未言经济长。

已非涂抹手，斩水劈山忙。（332页）

李锐为什么反对三峡到底？他从防洪、发电、航运、投资、移民、地质问题、生态环境影响等方面，讲了理由。（348～353页）

世界上有两个大坝会议，其中一个排列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大坝，三峡是第一名。毛泽东那样自认为无法无天的人，至死都没有再提三峡。三峡工程，一个最鲜明的例子；黄万里的命运，一个最具体的例子。是非混淆，好坏颠倒；黄钟毁弃，瓦釜雷鸣。（353～355页）

大跃进时，讨论超英赶美，订计划、指标，讲要翻番。李锐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1958年6月），说有些事情霸蛮可以解决，有些事情霸蛮没有用处，比如电就不能霸蛮。不是波浪式前进，炼钢炼铁，都一哄而上，这样下去不行。北戴河会议，毛不找李锐。直到1958年11月21日武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找李锐去，还同他谈了话。毛从看不进这封信，到看进去，时隔五个月，毛说，你这封信的态度，还不够明朗。（374页）

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李锐未参加，给毛泽东写了第二封信，谈一些基本经济理论问题。写好信，给陈云看过，给李富春留下复件。三月上海会议，毛把李锐找去，一进房门，毛指着李锐说：“李锐，你这个人是不能当强盗的。”闻者莫名其妙。毛作报告，有一段题目就是《李锐怕鬼》。毛的意思是说，给他写信，李锐还把信先给别人看。李锐猜度，这样毛就不能把李的东西变成毛的东西，有了旁证，毛不好利用。（375页）

会议期间，李锐给毛泽东写了第三封信。毛说：“李锐，你只把骨头给我吃，不把肉给我啊！”非要李锐坐到前面去，他向李锐鞠躬，说：“李锐我感谢你呀，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把李锐恭维得不得了。（375页）

周恩来总理在工业会议上，也大大表扬李锐，说他给主席写信，起了好作用。在人们眼里，李锐焉得不红得发紫？

李锐给毛泽东三封信，是他人生的一次高潮。

1959年7月，中共八届八中庐山会议，毛泽东通知李锐参加。彭德怀事发。最后大会时，周小舟说出田家英关于毛泽东的三句话：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后被人议论。会场内，田家英、胡乔木面无人色，全场紧张。会议主持人刘少奇问：“李锐，怎么回事？”李锐镇静起答：“小舟听错了，这是我的意见，他误会了，以为是田家英说的。”刘少奇反应极快，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不在这里谈。”掩饰得无影无踪，毫无痕迹。但在人们心中，刻下了忠奸贤愚的密码。（379页）

《庐山会议实录》，是李锐接受胡乔木建议，写的一本重要著作，可参阅。

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头子的彭、黄、张、周，撤职没有开除党籍，只有李锐一人，被一撸到底，送北大荒劳改。

李锐为会上无一人站起来为彭德怀讲半句公道话，而深感绝望。

安子文派人到北大荒找李锐谈话，希望他讲一点要求留在党内的请求话，李

锐无以应。(380页)

几乎饿毙的李锐，挣扎在死亡线上，得到田家英、李富春等人及时的救助，活了下来。由于陈伯达的加害，“文革”中，李锐关押秦城八年。李锐得以彻底平反，是安子文、胡耀邦伸出了援手。

李锐说，共产党这样的错误，人类历史没有过。(382页)

九

李锐从流放、劳改地北大荒回京，无法再与范元甄继续生活，两人离婚。

李锐推测，范元甄揭发李锐的两本材料，可能是她同李锐离婚后写的，内容一定会有夫妻私下议论毛泽东的一些话。刘澜波看过这份材料，告诉李锐，材料到刘手里时，“已布满烟蒂烧痕”。材料邓小平看过，即下令烧掉。邓说：“太恶劣了！烧掉！”(385页)

在那饿死几千万人的岁月，范元甄也曾在生活上，照顾和接济过饥寒交迫的李锐。李锐没有忘记，范元甄托故宫博物院的“右派”于善浦，带一箱饼干给北大荒的李锐。“文革”中，也就是离婚之后，上面要李锐写范元甄的材料，李锐从来没有讲过她半个不字。将心比心，李锐说：“范元甄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她要跟着党走嘛，又带着三个孩子。”(381页)

李锐被提名进中央委员会，有几人反对。其中两位，一是邓力群，一是范元甄。李锐的“政敌”里，竟夹杂了旧日“情敌”。(406页)

书中附录一，是44岁的李锐，给范元甄的一封家书(1960年7月25日，写于北大荒)，有血有肉，笔下尽是泪。日常干奴隶般的苦力活，“头部包扎如修女”，面部被多至七八种的小飞虫咬伤，“红白斑斑”，“思想也有顷刻的波动”。“但经常的状态是好的，是你之所谓‘单纯’”。(390页)李锐的“单纯”，纯然是纯真的童心。范元甄不是不知其珍贵。离异远去的故人，毕竟曾经是知音！此种细节，司马迁最是熟稔。

十

李锐何人哉？

1991年，在敦促三峡工程上马的会议上，王震骂李锐，“这是一个反动分子”！有人告诉了李锐。李锐说：“怎么会是反动分子呢？大概说我是反对分子吧？”

传话者又去核实。王震确实骂的是：“李锐是个反动分子。”王震当面对李锐也说过：“李锐，你是我的死对头。”（346页）辱骂与恐吓，无损他人尊严，历史习惯于付之一笑。

读罢《李锐口述往事》，我心目中的李锐，货真价实是中共优秀党员，铁骨铮铮，光明磊落。可能过于“单纯”了一点。他是民族精英，国家栋梁。他两次自标“成熟”，其实是耄耋老人的天真自诩，不无可爱的意趣。站立风口浪尖，他砥柱中流。

李锐“成熟”与否，“反动”与否，不妨让黄河说，让长江说，让人民说！

疾风劲草；炼狱煎熬。这部“口述往事”，是李锐《史记》。述往思来寻史迹，光风霁月现人物。谁害怕、容不得这本书，谁就是见不得阳光，害怕真理，害怕真实历史饱含着的真理。

敌视此书，仇视李锐，有可能心窄胸狭，却殊途同归，譬如因三峡工程的分歧而爱深恨切者，有待历史实践，作出公正的检验和严正的品评。此外，则必是罪错累累，怙恶不悛，终被万众痛恨、唾弃的城狐社鼠、魑魅魍魉。卷帙浩繁的历史巨著，内容也许只容一纸。出生入死，百年奋斗，李锐只为中华时代列车，添加民主、科学之两轮，尚未完功毕役。借此读书札记，谨向挥着诗笔琢车轮的战士——李锐同志致谢、致敬。📖

【诗 词】

只为神州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明天

李 乾

仿佛是来自雪山的一股清泉，


即令融入大海，

留给世界的，

还是那最醇厚的甘甜。

仿佛是来自亘古的一双慧眼，
即令风沙蔽日，
告诉人间的，
仍是那穿透迷雾的洞见。

仿佛是来自上天的一个使者，
面对权势的谬误，
展示给人民的，
永是那掷地有声的规劝。

仿佛是来自未来的精灵，
匆匆此行，
一次又一次泣血的呐喊，
只为神州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明天。 

【诗词】

素描：2019年2月20日

王晓林

他的遗体上
盖着镰刀、斧头交叉的
血红的大纛

门楣上没有横幅


门柱上没有挽联
连死者的名字也没有
和隔壁的灵堂格格不入
按照尊卑摆放的花圈
来自
至高的主席
至高的總理
至高的部長
退休的前中紀委書記
退休的前副總理
退休的前前總理（这一只令人动容和遐想）

最显赫的花圈前
没规没矩地站一大汉
宽大的身体遮盖着
最显赫的挽幛

沒有生平介紹
沒有訃告
没有致悼词的人
也就没有悼词

已死之人
让活人结舌
让“组织”失语
出了格的李锐
出了格的葬礼

2019年2月20日的“红色基因”传承

乱了章法，没了规矩 

【李锐著述】

李锐文集目录

第1集

第一卷

窑洞杂述

百炼成钢的晋察冀边区
晋察冀边区的政治攻势
晋察冀的民兵
晋察冀人民投军热潮
敌后的秋收
新山东的成长
山东捷报
山东去年的军事胜利
新四军的胜利出击与中国的救国事业
加强伪军工作
解放区战场三个月来的胜利攻势
解放区收复城市概况
迎接新局面

介绍晋察冀的劳动互助合作社
晋察冀对敌市场斗争
关于同意累进税在晋察冀的实施
开展吴满有运动
敌后解放区的水利事业
防旱与水利
晋西北三年来的生产总结
冀鲁豫边区的剿蝗斗争

关于大后方的大学教月
国立师范学院的教育和学生
鄂西联中的“整顿学风”
中央大学学生生活一瞥
重为大后方青年呼吁

“百年树人”的大危机——谈大后方学生程度低劣的原因

为大后方大学教授呼吁

綦江大惨案

加强我们的通讯工作

敌寇统治地区农村破产实况

人性的毁灭（敌后报导辑钞）

敌伪之间（敌后报导辑钞）

敌寇“五次治强运动”

农民在解放中——解放区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

林伯渠谈辛亥革命

张曙时回忆京陵

杨松同志传略

我国铁路建设之今昔

湖南地形物产概述

英国的远东前哨——香港

附“早年作品”

走

胡论“学生运动”

北平学生运动的经过

表

第二卷

热河烟云录

作者的话

坚决保卫热河

迎接和平 保持清醒

党坝协定必须执行

收复鞍山

美国应改变政策

辽东起义

人民的义愤

记邯郸战役

热河局势
“以不变应万变”
不足为奇
杜隶明的阴谋
古山的教训
一刻也不要松懈
一种姿态
边打边谈
美军应赶快撤退
依靠人民 迎接胜利
如何彻底肃清匪患
一切为了前线
光荣参军 准备反攻
庆祝围场大捷
蒋军石觉部战斗力大大减弱
消灭十三军
歌谣中的蒋军
热河战局进入新阶段
挖尽匪根
我军稳步走向反攻
朝阳光复后
敢于胜利就一定胜利
谣言与烟幕
长城部纪律严明善于攻防
一三五部初上大阵能攻能守
祝贺辽西大捷
祝贺辽西再捷
不久便可分晓
挑起更重大的担子
北宁破击战的意义
学习白庙子战斗
向民兵担架队员致敬
【附】数万远征民兵出入火线救护伤员
军队必须做自我批评

把拥政爱民工作做得更好些
群众发动迟缓的原因何在？
向丰宁学习
热河土地关系概况
向丰宁支队学习
不要“二满洲”
一个培养干部的范例
孙、李、徐三逆之死
热河近况
提倡向吴满有方向发展
密切联合中农
派大批干部到收复区去
大胆提拔新干部
一个区长的反省
新区快快组织抢粮
平庄、古山等地抢粮逃亡地主撂荒地
建中新区三家村分类抢粮
乃林群众大会决心复仇抢粮
清算扣押坏地主
南霸天发家史
叶柏寿新区发动群众生气勃勃
组织工人力量下乡发动群众
马海富到了叶柏寿
建昌群众领袖王宽
群众快板翻身歌
凌源区小队的教训
【附】凌源县二区小队麻痹轻敌受损失
锦西县坚持根据地的经验
【附】锦西概况
重视妇女的作用
【附】热东妇女在土改中发挥很大作用
肃清官僚主义 鼠疫能防治
关于挖财宝
加强土地政策教育

把新土地法交给群众
办区农民训练班
宁城教训
谈交穷朋友
凌源城坚决处理干部贪污问题
消灭假农会
快快整顿队伍
反贪污腐化
由点到面的关键
开展戒烟运动
彻底改变领导作风

立即解散国民党特务组织
又一对照
严重抗议
“一块石头嚇不倒人”
两种文化
封闭不了的！
老百姓怎样活下去
湖南灾荒纪实
南京血案
郝贵林之死
【附】谁逼死了他？
蒋管区的反内战运动
第二条战线
长春的“隐隐哭声”
吴市长的“威风”

又是血案
韩梅村将军入党有感
【附】韩梅村同志略历
“五不了碑”
《冀热辽日报》及冀热辽新华分社概况
【附】《民声报》情况
关于加强新闻业务工作的意见
拥护“短”

全党努力办好报纸
谈土改报道
读者来信：关于围北土改消息
【附一】编辑部的自我批评
【附二】围北土改消息

第2集

第三卷

新湖南的诞生

庆祝新湖南的诞生
湖南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
庆祝湖南党的会师
将热情变为力量
大家认清今年征收公粮的意义
完成征粮的关键
首恶必办
我们今年要作些什么
加强农村调查工作
混农村的状况和特点
地主胡桂五一门发家史
从一个地主的家信看地主阶级的真面目
发动群众，掌握政策，完成三大任务
全面减租，度过春荒
坚决镇压反动分子的捣乱
把眼光放远一点
大家利用报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我们有信心战胜旱灾
伟大变化的一年
进一步联系群众
反对命令主义
对帝国主义的几个严重打击
太“刺激”美国了吗？
中国人民决不害怕挑衅

恶狗必须用粗棍打
看重自己 蔑视敌人
关于朝鲜战争的形势
有伟大意义的战绩
加强时事教育
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问题
人民民主力量为什么比帝国主义力量强大
关于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因素
伟大的檄文
论朝鲜战场的伟大胜利
向英雄的人民志愿军致敬！

加强学习 加强师生团结
加强团结 力求进步
克服困难做好教育工作
教育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
宣传生产发家勤劳致富的思想
论必须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
李四喜思想讨论给我们的教训

马日事变二十三周年
一九二三年长沙“六一”惨案经过
没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蒋介石为什么参加抗战？
从卢沟桥退到独山

第四卷

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
《三字经》和《幼学琼林》
四书五经
读《水浒传》
读《三国演义》
读《西游记》
读《红楼梦》
读《盛世危言》

从《纲鉴易知录》到第一篇史论
《新民丛报》和梁启超的影响
康有为的《大同书》
读严译名著
读《群学肆言》
一个用心听课的学生
熟读韩文
芋园问学及对留学的态度
印象最深的老师——杨昌济
“独服曾文正”
以文会友
忧国忧民的“时事通”
“略通国学”与评说孔子
爱好诗词
《新青年》的影响
读社会这一本大书
《伦理学原理》批注
新民学会
“一时楷模”陈独秀
新闻研究会和邵飘萍、蔡元培的影响
同胡适的一段交往
文化书社与自修大学
三本入门书
后记
【附录】向新民学会的先辈学习

第3集

第五卷

早年毛泽东

前记
新版前记
三版前记
二十岁以前

韶山岁月

到长沙

湖南第一师范

学校和教师

一本笔记和一本书的批语

“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野蛮其体魄”

“通身是胆”

学友会和工人夜学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思想方向与新民学会

思想方向

战友们

留法勤工俭学

建党基础

五四运动前后

第一次到北京

“洞庭湖的闸门开了”

《湘江评论》

驱张运动

第二次到北京

党的建设

湖南自治运动

文化书社和新文化运动

学习马克思主义

建团、建党

自修大学与《新时代》

工人运动

从何著手？

争取无政府主义者黄爱、庞人铨

闻名全国的安源大罢工

长沙泥木工人争取营业自由的胜利

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水口山工人大罢工
教训一位“长衣先生”
长沙各行业工人的罢工
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成立 同赵恒惕作当面说理斗争

结束语“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

【附录】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

在毛泽东领导下，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
北伐战争前夜的湖南形势
轰轰烈烈的农村革命运动
毛泽东出席全省农、工代表大会
在农民问题上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湖南农民运动的新阶段
“马日事变”及其教训

第4集

第六卷

大跃进亲历记（上）

前记
讨论三峡问题
辨别上述，是非分明
“大跃进”的序幕南宁会议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水利、电力两部合并
水主火辅问题
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水利化运动
周恩来带队查勘三峡
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
全面发动“大跃进”的八大二次会议
华东区计划会议
徐水的共产主义天堂
农业卫星满天飞

第七卷

大跃进亲历记（下）

北戴河滩上浪尖

人民公社好

公共食堂始末

全民炼钢翻一番

水利化运动及其灾难

全民办电与昙花一现的：“水主火辅”

教科文大跃进

第一次郑州会议

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第二次郑州会议

陈云抓设备成套工作

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

上庐山开会前形势

“大跃进”失败的惨痛教训

【附】“信阳事件”及其教训——《信阳事件》序言

第5集

第八卷

庐山会议实录

前言

引论——庐山会议的由来

上庐山开会（关于我的记录本）

神仙会

十八个问题

中南组的讨论

会外漫谈

干部反应与社会舆论

李云仲的一封信

七月十日讲话与毛泽东第一次召见

会议形势与毛泽东第二次召见

《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

彭德怀的信

彭德怀的信的反应与形势的变化
张闻天的发言
毛泽东七月二十三日的讲话
批评与检讨
对事，也要对人
决定召开中央全会与毛泽东第三次召见
七月三十一日常委会
八月一日常委会
两天常委会的传达
中央全会召开时的讲话与文件批语
揭发批判“军事俱乐部”（上）
揭发批判“军事俱乐部”（下）
关于“斯大林晚年”问题
毛泽东八月十一日讲话
大会批判
毛泽东八月十六日讲话与五个文件
全会后的工作会议
结束语——庐山会议的教训
【附录】请吴冷西给一个“说法”
增订版后记
日译《庐山会议实录》序
增订三版后记

第九卷

毛泽东的晚年悲剧

序言
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
讨论《历史决议（草案）》的摘记
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与实践
毛泽东与“总路线”的形成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中国革命的回顾
【附录】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

关于“党国”的几点看法
关于中国革命的若干看法
毛泽东晚年悲剧及其原因
“大跃进”期间我给毛泽东的三次上述
如何看待毛泽东（一）
如何看待毛泽东（二）

第6集

第十卷

论水利发电与河流规划

必须优先发展水电
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水电建设的几点意见
关于必须抓紧多上水电的意见
同美国政府水电代表团会谈发言
水电概况与存在的问题
关于我国电力工业的长期建设方针
关于水电与火电问题的讨论
中国的水利资源和建设水电站的优越条件
关于水利资源普查与河流综合利用的问题
关于水利发电建设所必须遵从的客观规律
必须重视勘测工作
加强水电地址勘察工作
介绍《一个伟大建设的开端》
狮子滩水电站发电的建设
同青年技术干部谈技术工作
提拔青年干部和老干部学技术问题
干部一定要学习自然科学
关于改进施工管理和勘测设计工作
学习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的经验
关于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的几个基本问题
黄河的治理与开发
谈谈防洪问题
学习苏联水利发电的建设的经验

苏联水利发电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经验

苏联发展水电的几个问题

参观巴西和美国水电的简要汇报

【附录】我国水电为何难以优先开发

【附件】致中央常委诸同志的信

后记

第十一卷

论三峡工程

初版的序言

再版前记

再版前记附记

三峡工程二十一世纪再定

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

三峡工程定案后答记者问

关于三峡工程建设听一次反面意见

【附】对三峡工程持不同意见者名单（不完全）

建议三峡工程暂缓上马，重新论证有关要害问题

【附件一】三峡工程泥沙并不清楚，问题很难解决

【附件二】加快宜宾以西干支流的开发以代替三峡工程

【附件三】《荆江北岸分洪》为解决长江防洪最理想方案

【附件四】长江防洪与三峡工程

再次建议三峡工程应继续论证

建议再次研究解决三峡工程存在的问题

【附件】重新论证三峡工程蓄水位方案

三峡工程问题简述

关于长江规划问题

关于长江规划的几点原则意见

关于长江防洪方案和三峡工程的意见

【附件】美国人萨凡奇提出的“长江三峡水利开发计划”概要

关于长江规划的几个问题

查勘三峡后的几点意见

关于长江三峡问题的意见

谈一九九八年长江洪水问题

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

略谈三峡问题

【附】感慨万千读三峡旧文

克服主观主义才能做好长江规划工作

大鱼网主义

会议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

周恩来带队查勘三峡记

水电与河流开发之间的有关问题

【附件】三峡工程能否很快上马及有关的重要问题

再谈三峡问题

关于三峡问题的几点补充意见

关于三峡工程低坝方案建设的意见

如何正确解决三峡工程问题

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

再谈关于三峡工程的意见

关于三峡工程答记者问

【附录一】长江流域及三峡工程有关基本资料

【附录二】对水利工作的意见

对历史负责到底：回忆三峡工程上马的始末

第7集

第十二卷

起用一代新人

前记

起用跨世纪新人

起用一代新人

尽快起用一代新人

改革贵在用人

选拔中青年干部问题

为优秀专业人才走上领导岗位开路

清除“左”的影响和克服派性

关于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情况和意见

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选拔干部的问题

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问题
坚决实行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
奋发有为、锐意革新
干部“四化”与组织部门的工作
当前干部工作的几个问题
新时期需要新型人才
现代化管理与领导班子问题
新形势与干部工作
新形势下的用人之道
雏凤清于老凤声
青年当立志，振兴我中华
实行机构改革是推进社会战局一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项战略决策
机构调整和起用知识分子
关于清理“三种人”的工作（一）
关于清理“三种人”的工作（二）
省部级第三梯队建设问题
加强企业领导班子的“四化”建设
关于编制工作问题
关于厂长负责制及有关问题
介绍朱正同志的一封来信
【附录】朱正同志的信
干部一定要学习自然科学
提拔青年干部和老干部学技术问题
同青年技术干部谈技术工作
漫谈改革与党建问题
关于领导科学的断想
人才的活水带来改革的生机
《新闻启示录》的启示
再谈新闻干预生活的问题
《梓人传》的启示
从企业领导素质谈开
无愧于党员的称号
下基层办实事
读《河北经济文章选编》有感

这是一个新启蒙

【附】关于党史与组织史资料

用科学态度、严禁作风做好征编工作

切实解决好认识和实践中的问题

秉笔直书，求实存真

要重视文字叙述问题

在中共组织史资料编撰业务研讨会上的讲话

这是党史工作的一部分

深入研究一些问题

中共组织史资料（上报本）编撰工作总结

第十三卷

往事杂忆

童年琐忆

一二九运动前后在武汉

投笔从戎的三天

清凉山上的文字生涯

回忆热河办报

接管沈阳记事

初创时期的《新湖南报》

转业前后的日记

我与钱宗仁

我还是越活越年轻

第8集

第十四卷

出访日记

序言

电力代表团访问苏联

率水电代表团访问苏联

【附录】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工程

随能源代表团访问巴西和美国

【附录】中国能源代表团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发表的访问巴西的“联合新闻公报”

几内亚之行

应邀赴美国讲学

应邀附澳大利亚讲学

再次应邀赴美国讲学

第十五卷

我心中的人物

前记

记郭亮

记胡筠

悼念涂正坤

纪念何斌

想念你啊，文立徵

文立徵烈士二题

忆谢文耀

读《彭德怀自述》

学习彭德怀，做真正的人

一辈子讲真话的人

重读张闻天的《庐山发言》

实事求是，何惜乌纱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总理在我心中

活在人心便永生：悼念耀邦

同耀邦的诗交

怀念田家英

忆六如老伯

忆吴觉

忆郭子化

一个在晚年大放光芒的人

怀丁玲

最后一天的书案

黎澍十年祭

记甘祖昌将军
记沈毓珂
纪念宋教仁
我的父亲
纪念齐白石
怀念范寿康先生
纪念何炳麟先生
一个献身教育事业的人
一位敢讲真话的老专家
缅怀张昌龄总工程师
项南，真不忍言别啊
为帅大姐祝寿（二篇）
怀念帅大姐
记住温济泽的最后留言
感怀赵朴老的厚爱
继承欧远方遗志
施嘉炆老前辈百岁大庆
哭慎之
【附】慎之来信两封
劳动英雄吴满有真的叛变投敌了吗
《怀念甘篇》序言
《怀念甘篇》后记

第9集

第十六卷

苦瓜的味道

前记
苦瓜的味道
谈白菜
胡同有缘实无缘
同于刚的诗缘
赠钟伯熙
想起钱宗仁

读《将饮茶》
让旧籍“从火中而新生”
祝贺黄乃的文集出版
同诗词的不解之缘
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札记
谈进谏纳谏
“阿拉宁波人”
谈尊师
脱贫·读书·直言
“靠纸型吃饭”
为一个大发现而呼吁
一个期望
一篇惊心动魄的报告
由机场大厅红布标语想起
“言多必失”小议
旧事新谈（八则）
 不要盲目追求高速度
 谈浮夸风
 再谈浮夸风
 慎提口号
 再谈慎提口号
 允许讨论
 重读《不要害怕反对意见》
 要习惯听反面意见
想起《旧事新谈》风波
定要广开言路
从“对话”想起孔夫子
安定小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一代新人的呼声
“竹解虚心是我师”
一句真话
小议老马识途
谁人不仰原前老

停车坐爱枫林晚
从钱宗仁之死想起的
介绍钱宗仁的诗词
干部三题
他们希望生活得有声有色
谈穷
大鱼网主义
配角万岁
从苏东坡谈起
《何功伟烈士诗文笺注》序言
《陆兰秀传》序
《教育家陈润霖生平事略》序
《胡杨泪尽》序
《平江人民革命史》序
《不要忘记钱宗仁》序
《李冰封散文随笔初集》序
《腐败论》序言
《一二九运动在武汉》序
《平江县志》序
《程学敏水电论文选集》序
《栽花插柳堂杂草》序
《天岳山馆诗存》序
《百年树人》序
序《刘清文集》
《自珍诗稿》序
《陆钦侃江河与水电规划文集》序言
《刘顺元传》序言
《历史的评说》序
《孙大光文选》序言
《冯兰瑞传记》序言
《赵师梅先生传略》序言
《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序
《李锐诗文选集》自序
《李锐论说文集》自序

《王伊復水电论文集》序言

《湘滨往事》序言

《古时期名篇诵读》序

《道奇随笔》序

《IDF之父——黄孝宗的人生时代》大陆版序

《莫让江河空自流》序言

罗西北的水电生涯

《逸漏经济学》序言

《黎澍集外集》序言

关于黎澍几篇诗稿的解释

从一个案例看一段历史

《田夫之子》序言

第十七卷

龙胆紫集

初版序言

出版后记

新版序言

三版序言

水电行

地北天南

狱中吟

偶成

三十年间

温书

读报

景仰与怀念

重来磨子潭

【附】《龙胆紫集》外编

第10集

第十八卷

世纪留言

序言

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

要认真总结这二十年的经验教训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

访谈录：“我的建议，老中青三代普遍赞成”

访谈录：中国的中心问题是民主政治问题

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附】关于《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文的大便

小风波与大悲哀

应大力支持理论方面的新探索

谈陈独秀、马寅初、王若水

胡耀邦去世前的谈话

【附】“耀邦同志活在我们心中”座谈会发言记

读王若水的《新发现的毛泽东》

《观海楼读书笔记》序言

《毛泽东执政春秋》序言

迎接新世纪要四讲

世纪之交的感言：还是要防“左”

对“左”的东西决不可掉以轻心

封建遗毒和“左”的顽固

根深蒂固的还是“左”

如何不再扭秧歌

到底受到哪些束缚

权力能给人智慧吗

做人与当党员

又谈德先生

民营经济与中国

温故而知新

《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世纪思索》序言

《世纪悲歌》序

《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

《乌“昼”啼》序

《走过五十年》序言

《一九五七：新湖南报人》序

《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序言

忧虑三峡

【附】钱正英应负的责任是推卸不了的

【附】关于三峡工程之行先按初期蓄水位

一百五十六米运行的紧急建议

第十九卷

何时宪政大开张

何时宪政大开张

关于党本身改革的几点建议

中国向何处去（提纲）

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乘风破浪又一年

发扬“五四”精神，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访谈：但望宪政大开张

访谈：中国该变成什么样子

访谈：总起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出版《上书集》有感

对改革开放的一种回顾

关于克服经济困难开创改革新局面的建议

毛泽东与反右斗争

《反右资料数据库》序

《千秋功罪毛泽东》序

《翻云覆雨毛泽东》序

《毛泽东怎样操弄政治运动》序

与英国记者肖特谈毛泽东

访谈：毛泽东比什么皇帝都厉害

《关于“文革”发动的政治体制原因分析》序

《伴君如伴虎系列丛书》序

关于唐纵日记的回忆

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民粹主义

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

不朽的丰碑

珍视胡耀邦的思想遗产——《胡耀邦思想年谱》序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序

不幸与大幸

永别了，紫阳同志

怀念同赵紫阳的交往

【附录一】杨尚昆谈邓力群问题

【附录二】致赵紫阳邓小平信

珍贵的记录——《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序

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录

《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序

《毛简青》序

李昌和“一二·九”那代

在胡绩伟与狄莎结婚十五周年聚会上的发言

《李慎之文集》（英文版）序

老来随心所欲之一——《李普自选集》序

同龄老幼告别了——怀念密加凡

《人在山水中》序

《田夫之子》序

《潘基磬诗文集》序

《边鼓与印痕——周倜选集》序

怀念朱纯，叔河节哀

《陈永贵本事》序

《怀念与思考》序

《仿佛有风》序

《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序

《综合哲学随笔》再版序

《文革诗词钩沉》序

《李锐书法集》自序

《我的一生》序

一座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读牟宜之诗

在姜夔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

中国水电何以未能优先发展——《中国水力发电史》序

访谈：总结经验教训是为了更好地向前

访谈：中国水电发展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本刊聲明】

本 刊 聲 明

《記憶》創設於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間，面向業餘，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記憶》非慈善、非公益。編者盡義務，作者無稿酬。凡認同《記憶》宗旨，成為本刊會員，遵守本刊規定者，皆可獲得本刊。

《記憶》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宗旨，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刊訓。遵奉眾生平等，百家爭鳴之精神，凡擺事實，講道理的文字，無論何門何派，皆可刊發。除特殊情況，本刊要求首發。所發文章，不代表編者觀點。

本刊所載的文字、照片、圖表等內容，均受國家法律和對中國適用之國際公約中有關著作權規定的保護。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任何人不得改編、轉載、複製或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獲得合法授權的，應在授權範圍內使用，必須為作者署名，注明“來源：《記憶》第 xx 期”字樣，並按有關國際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費用。

違反上述聲明者，本刊將依法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聯繫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選摘、引用本刊文章，請注明出處

本期編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鄒 行

